

炎

典

春

秋



陈诚军旅沧桑录

陈立夫惠书大陆丹阳

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聂绀弩 李英儒 文海沉浮
萧 乾 王方名

“五·四”英雄匡互生

石达开出走

淞沪抗战前后

中国空军空袭日本



1992 · 5

总第 5 期

邓小平在深圳、 珠海



- ①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植树
- ②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一些县
进行了为期11天的考察，图为邓小平于深圳
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领导人在一起
- ③邓小平同广东省、珠海市领导人交谈
- ④邓小平和珠海亚洲仿真厂的科技人员交谈
- ⑤邓小平在深圳先科公司专注地听取该公司的
产品介绍

（紫荆） 供稿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四大传统之一。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十七世纪以后，西方突飞猛进，相比之下，中国落后了，于是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凌辱与屈辱。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刻苦奋斗，终于站立起来，正在创造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所以历久不衰、虽衰复振，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这一优秀传统始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炎帝发明了农业、商业和医药。黄帝发明了车、服、屋宇以及文字等等。炎、黄二帝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历代人民尊崇炎、黄二帝，就是尊崇他们的发明创造精神。炎帝、黄帝都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神农氏尝百草，从而发明了医药。有些草是有毒的，但他不怕，而努力尝试，这是何等的勇敢精神？黄帝征服北方平原，史称他“居无宁日”，表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礼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炎、黄二帝都是伟大的作者，开创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这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后来的思想家概括为“自强不息”。《周易大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简要表述。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的志士仁人、学者巨匠，或勇于探求真理，或坚决维护正义，或者敢于对不良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力图保卫民族的独立，抵抗外来的侵略，都表现了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坚强的生命力。

十七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迟缓，逐渐落后了。这主要是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对于文化发展严重危害所致。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压抑了人民的创造性，扼制了思想学术的正常发展。

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专制主义，并且力求消灭专制主义的影响和遗毒，从而可以轻装前进了。

二十年代以来，在文化讨论中，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以为中国“万

事不如人”，必须全部否定自己的传统，全面移植西方近代文化。这是一部分人失去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全盘西化论者都对于传统文化没有认真研究，对于中国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成就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只看到中国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守旧落后的一面，没有看到爱国志士、广大人民奋发图强的一面，更不了解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现在，应明确了解，只有站在本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坚固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吸取外国文化先进成就。

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必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

1992. 1. 6

谈传统文化

张岱年



顾问: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刘家驹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印刷: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 5 号

邮编:100037

封面设计:陈飞燕

专 稿

- 1 谈传统文化 / 张岱年
4 在闽台文化学术讨论
会上的讲话 / 萧克

奥 迹 谱

- 6 毛泽东结交绿林
落脚井冈山记 / 黄允升
10 邓小平与
和平解放
西藏 / 阴法唐
16 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 / 李新
21 “五·四”英雄匡互生 / 大申
95 李立三轶事 / 王榕

殒 星 篇

- 47 杂文大家聂绀弩
的坎坷路 / 姚锡佩
54 我的父亲李英儒 / 李家平
60 欧战风云中的萧乾 / 傅光明

春秋笔

- 25 淞沪抗战前后 / 温济泽
- 28 秦城监狱的
6601号
犯人 / 师哲
- 35 中国空军空袭日本 / 徐伟剑
- 37 “文革”中秘密拍摄
传统戏始末 / 齐英才

同根结

- 70 陈诚军旅
沧桑录 / 宅巍 德英
- 79 陈立夫惠书大陆 / 朱亮

赤子心

- 67 流浪画家姚迪雄 / 沈泓
- 85 大陆记游诗抄 / 张渊量

古镜台

- 88 俯仰从容的留侯
张良 / 徐庆全
- 92 石达开出走 / 苏双碧

人海浪

- 65 郭凤莲和
她的先辈 / 杨永革
- 40 画坛“玄奘”西域行 / 刘东平
- 63 我和书 / 新风霞

神州光

- 82 “国宝”和它
的保护者 / 李青松
- 81 温州三灯 / 叶大宾
- 86 在阿古登巴的故乡
听阿古登巴
的故事 / 段宝林

文荟园

- 56 邓拓诞辰 80 周年
(诗三篇) / 冯其庸
- 15 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
在厦门举行 / 文茂
- 91 外国幽默漫画 / 芳菲 辑
- 64 题词 / 江树峰
- 44 应该留下历史真实
——师秋朗来函
- 69 我的更正
——郑超麟来函

萧克

在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是农历壬申年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团圆佳节——元宵节。我们在这里召开“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既得天时，又得地利，更有人和。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参加开幕式的各位来宾，向参加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台湾的学者、同胞，表示热烈欢迎！



任时燮(台湾)接受记者采访

举办“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海峡两岸同宗同祖同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生息繁衍在闽台地区的人民，开创了带地区特点的闽台文化。研究讨论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促进祖国统一，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文化很早就具有民族的、时代的和地区的特点。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文化层次、风俗习惯不完全一样；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其文化特征亦不尽相同。例如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东南地区的青莲岗文

化、良渚文化不尽相同，台湾地区的长滨文化、大坌坑文化尽管与大陆东南地区有历史渊源，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至于此后的仰韶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这就构成了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是向中原内向汇聚溶合转而向四周辐射的特点，形成博大精深、分布区域宽广和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因此，研究区域文化的特征及其不同时期的源流关系，研究这些文化在同一时期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对于从宏观上研究中国文化史是十分必要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应充分估计到文化要受到特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只注意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特点，不注意地区文化特点就会造成研究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同样，不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文化，那么，各门类的文化现象无法沟通，从而整个文化史亦无法描述。就闽台文化而言，闽台地区在远古时期曾为一体，后因地层变动，由海峡隔开，但台湾从来就是祖国的领土，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台湾的同胞在文化上就与福建以至整个大陆相同、相通或相近。今天，台湾文化仍然是闽台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处处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在研究闽台文化时，需要注意到这几方面的情况。

研究民族文化，固然是为弘扬其精华，但也要注意其糟粕部分。事实上，任何文化都包括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人类文化进步同整个历史一样，走着曲折的道路，有反复，也有倒退。

上的讲话



萧克发言

不作综合性考察,就不能找出其中的规律。不懂得中华文化有精华与糟粕,就不能知道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诚然,精华的概念也具有历史时代的特性,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进谏与纳谏,在封建时代确有意义,然而它毕竟是君主专制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生产方式已经变化的社会所倡导的民主观念并不相同。封建社会的清官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如勤政、廉政等,也可借鉴,但把它作为今天对人民公仆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对此,需以科学的方法和求实的态度做出历史的分析。

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要十分注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战国时代诗人屈原是一位杰出代表,他的诗歌对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有深刻影响。国

民党元老
于石
任先生

的《返大陆》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些诗句,再次说明中华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的巨大力量。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中都有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的正义精神都应该加以肯定和发扬。综观历史,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华民族,越是危急关头便越加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今天,一小撮“台独分子”,数典忘祖,分裂祖国,不仅遭到海峡两岸人民的唾弃,也被台湾当局所反对。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全民族的事业,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其主张、信仰如何,都有责任、有义务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专家、学者,在讨论研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文化时,从这个大局出发。

我相信,闽台文化讨论会的每一位参加者,都会为此而努力。

最后,希望大家在讨论中畅所欲言,深入研究和探讨各种学术观点,把闽台文化讨论会开成一个生动活泼友好团结的会议。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研究是有成绩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著述,呈现兴旺气象。通过这次闽台文化研究,我们还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借此机会,我建议海峡两岸携手编一部《中华文化通志》。从现在开始,大家团结互助,分工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系统概括与总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愿意为编好这部鸿篇巨著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刘伏宝 摄影)



毛泽东结交绿林落脚井冈山记

黄允升



王佐



袁文才

绿林军，源自西汉末年，王匡、王凤领导农民起义军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东北）而得名，以后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封建统治、诛锄恶霸土豪的武装结合，这是一股反对封建统治的力量。官府衙门、土豪劣绅把绿林看成死敌，除武力“进剿”外，还诬蔑为凶残、下贱的“土匪”，以蒙骗群众，孤立绿林。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也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诬蔑为“共匪”。可见，同被敌人诬蔑为“匪”的人，是应当交朋友的。

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博览群书，读过《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和历史故事，曾经为书中不写农民主角而“耐闷了两年”，也为当时长沙官府衙门镇压饥民暴动而“深感不平”。他参加革命后，对于绿林的来历和习性作了新的研究。

把绿林当弟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放弃攻打长沙城市的原定计划，转兵农村、山区。途中得到消息，说是井冈山有一支绿林武装在活动。打下莲花县城后，又从当地党组织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井冈山确有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武装，一支在山顶，一支在山脚，各有一百多人，上下呼应，据守井冈山。袁文才、王佐情同手足，结为同庚兄弟。这两位老庚各树

一帜，专与官府、豪绅作对；“杀富济贫”很讲策略，采取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办法，获得井冈山周围群众的拥护。

1927年9月底，工农革命军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一面部署整编部队，一面设法同井冈山绿林武装取得联系。他想：要想在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落脚，得不到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武装的合作，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于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他给袁文才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来三湾，共商革命联合暴动的事。

工农革命军进三湾村的当天，在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就得到了消息，怀疑这是假冒的国民党军队。袁文才立即派探眼进三湾摸清底细，以便采取对策。那个探眼把从三湾偷偷揭下工农革命军贴的宣传标语，连夜送到袁文才驻地茅坪。大小头领们伸着脖子看着“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便纷纷议论起来，都觉得不象国民党伪装的队伍。为稳妥起见，又派一名小头领袁丁珠到三湾探明虚实，山上也作些应急准备，如果袁丁珠被抓，那么就率部队下山打他们。

小头领袁丁珠来到三湾，东看看、西望望，很快被工农革命军当做敌探抓住。工农革命军营长伍中豪问他：“谁派你来的，来干什么？”袁丁珠心里慌张，表面却很蛮横，回答说：“你别

问,我什么也不会讲的,料你们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这位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伍营长,对付这类人也缺乏办法,见他如此强硬,准备报告毛委员后枪毙。

毛委员一听汇报,急忙地说:“唉,不能枪毙,把人带到我这里来,待问清情况后处置也不迟。”小头领被带进来,毛泽东先叫他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同他攀谈起来,并风趣地问:“我们昨天贴出标语,过了一夜,有好多不翼而飞了,不知飞到哪个小山头上去了?”小头领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大概是一阵秋风把它吹到山上去了!弟兄们对于‘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很感兴趣,特地叫我再来一趟,弄明究竟。”毛泽东也仰头大笑起来,说:“听你这么说来,我们的标语是你们揭去的,那么,你大概就是井冈山下来的弟兄啊!”袁丁珠不动声色地“嗯”声。毛泽东最后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你回去告诉袁大头领,咱们后期会有期!”

正当袁文才等头领们急切地等待袁丁珠的消息时,岗哨突然带进两个陌生人来,说是从三湾村专门给袁大哥送信来的。袁文才接过信,果然是给自己和龙超清的,看完信,一块悬着的石头算落了地,下山的袁丁珠不会有什么事了。于是立即召集大小头领开会,讨论这封信。其中有位司书叫陈慕平,曾经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过学员,看到信是毛泽东署名的,很是高兴,脱口说:“这下可好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几个头领几乎同时问他怎么一回事?陈慕平笑着说:“毛泽东是我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老师,他的到来,我能不兴奋吗?”接着,头领们讨论该怎么办的问题,众说不一。陈慕平说:“这是送信上门来请袁大哥的,当然得去了。”有的提议袁大哥亲自去,有的却不同意,说留个回旋余地好。于是有几人提议:“最好由陈慕平代表袁大哥去接头,一来可以见上老师,二来师生之间好说话,也方便些。”陈慕平即刻表示:“那好,我同龙超清去三湾走一趟,摸一摸情况。”正在这个时候,袁丁珠从三湾赶回茅坪,向头领们报告在三湾的所见所闻。

中午时分,龙超清到了茅坪,读了毛泽东的信,兴奋地说:“这一回有办法了。”转而问袁文才:“怎么打算?”袁把先派陈慕平去接头的事说了一下。

龙超说:“这很好,吃过饭就动身。”袁文才说:“今天你已走累了,去后怎么个说法咱们还得商量一下,还是明天一早去好。”

毛泽东得知茅坪来人时,他立即出门迎接。见一陌生人老远就向他挥手,并喊道:“毛老师!”走前几步仔细打量后问他:“你是哪一个,怎么称呼我老师呢?”“我叫陈慕平,是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毛泽东猛然想起来了:“噢,是你呀!你不会游泳,大家还叫你旱鸭子,对吗?”陈慕平连连点头说:“是呀!是呀!”并转过身将龙超清介绍给毛老师。毛泽东请他们进屋叙谈。

陈慕平先说:“本来袁大哥自己要来,只是有点伤风感冒不能来,要我代表向大家问候,欢迎你们到宁冈去。”接着,龙超清简单地介绍了宁冈县的情况,并说:“你们来,我们很高兴,袁文才那里估计不会有问题,他是刚加入共产党的党内同志嘛!”毛泽东听了他们的表示和介绍,也很兴奋,随即介绍了秋收起义受挫,转兵到这里来的情况,然后说道:“在莲花县境内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我们到宁冈、井冈山找你们的部队。”双方谈得投机,互相又介绍了一些情况。毛泽东发现他们两位没有带枪,就问其原因。龙超清回答:“我们山里的枪很贵重,有钱买不到,带出来怕丢失,外出一般都不带枪。”毛泽东说:“如今是武装暴动时期,出门还是应该带枪的,你们回去每人带一枝枪走。”并问:“我们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开进宁冈呢?”龙超清痛快地说:“明天就可以开到宁冈古城去,离这里三十里,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赠枪开创联合局面

枪比人还宝贵,人可以少一个,但枪不能丢失一枝。龙超清、陈慕平背着枪返回走,精神抖擞。到古城,龙超清就留下安排工农革命军的驻地,让陈慕平先回茅坪向袁大哥汇报。陈慕平到茅坪,立即向头领们汇报龙超清与毛泽东会面的情况,说工农革命军好,人多,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官也不少;他们希望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闹革命。众头领们议论说,看样子好象不是来吞并我们的,而是来与我们合作的。袁文才说:“枪是好东西,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能寻吃,第二可以防身,第三

可以报仇。”另一个头领伸手摸着陈慕平的枪说:“好枪呀!汉阳造。”另外几个头领也过来摸枪,有的干脆拿起来瞄一瞄,过过瘾,并说:“真家伙,可惜有钱买不到呀!”一个头领说:“这是老师给学生的见面礼嘛!”陈慕平说:“不只是给我枪,也给龙超清枪,这表示一种联合的愿望。”袁文才却想得很多:工农革命军上山来,说不定大批追兵就会跟上来;他们来了,我这个司令还能当吗?于是,他最后说:联合起来当然好,人多势众,枪好兵强,能对付白狗子和豪绅;大家想过没有,井冈山村寨小,田地少,产粮不多,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吗?我想还得派人去古城回个话,他们给养困难,我们暂时帮助解决一部分,不过还是请他们另找高山吧!

毛泽东同团长陈浩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进驻宁冈古城。部队安顿好,毛泽东就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落脚井冈山的问题。会议刚刚开始,袁文才的代表向毛泽东转达了袁大哥的意见:资助一部分给养,请另找高山。毛泽东听后表示感谢,又同他谈了团结起来、共同革命的愿望,还请他留下参加会。在讨论时,除原师长余洒度和原三团团长沙先俊仍坚持中央和湖南省委攻打中心城市外,大多数同志从伤员多、武器重、疲乏等实际出发,要求尽快安顿下来。毛泽东在总结会上,特别提到袁文才是反对土豪劣绅的,是革命的好同志。袁文才的代表听了毛泽东的诚挚话语和大家的讨论,深受感动,在向毛泽东辞行时说,我一定转达工农革命军的诚意,恳求袁大哥再考虑联合事宜。毛泽东想:袁文才的代表虽表示回去做工作,但毕竟还没有得到袁文才本人的点头,更没有得到他的老庚王佐的同意;认为做通袁文才的工作是关键,决定直接同袁文才会面,请龙超清到茅坪走一趟,同袁文才商量会面的地点。

拿什么作见面礼呢?毛泽东在三湾同龙超清、陈慕平接触中得知,枪是他们最需要的,而自己部队的枪恰恰有多余,还雇夫子挑,就在“送枪”上作文章。枪少了,不解决问题。他以战略家的胸怀,决心送枪一百枝,比袁文才现有六十支枪的一倍半还多,几乎将他们全部人员都可以武装起来。团

部里的干部们，一听毛泽东这个提议，都大为惊讶，说：“一百枝枪，要占我们全部家当的1/7，以后自身发展，扩大怎么办？”毛泽东说明做袁文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一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关系到能否在井冈山“安家”的大问题。袁文才他们把枪看成是贾宝玉脖子上带的那块玉，只有狠下决心送一百枝枪，才能得到他们的相信。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团里干部们也基本同意了。

龙超清到茅坪找到袁文才，转告毛泽东要来会见他的事。在他们选定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会会后，龙超清又立即回古城通报情况。团长陈浩提议带一排兵去保护。毛泽东说：“此议不妥，只你、我、警卫员去，人多反而会起他们的疑虑。”陈浩担心地问道：“三个人去行吗？这帮绿林好汉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毛泽东说：“要相信人家，尊重他们，更何况袁文才已经加入共产党了？”第二天上午，由龙超清带路，毛泽东等三人按时赴约。

话说袁文才这一边，待龙超清走后，立即召集头领们开会商议会面事宜。多数人提出：“热忱款待，准备全鸡、全鸭、全鱼。”少数人还是顾虑重重，认为会面之事凶吉未卜，应当在军事上作些防备为好。袁文才认为此议有失礼节，很是不妥。一位头领献策说：“可以将武装人员隐蔽在大仓村后面树林里，不露蛛丝马迹。”袁文才只是皱皱眉头，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清早，袁文才就带着头领们到大仓村村口等候了。当看清毛泽东只带两个随员时，立即示意撤去武装埋伏。陈慕平指着前方说，那个头发长长的就是毛委员。袁文才向前紧走几步，热情欢迎。

袁文才等把毛委员等迎进屋里，说道：“毛委员，咱们久居深山，孤陋寡闻，给我们讲讲当前的时势好吗？”毛泽东礼让说：“还是请你们先讲一讲。”经过一番谦让，毛泽东先向众头领讲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党中央纠正了陈独秀左倾投降主义错误，“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以及秋收起义受挫和艰苦转战到这里的情况。他话头一转，问道：“听说你们这里也闹得很欢呀？”袁文才接着说：“这里只红火了一阵子，后来时局逆转，就退回山里来了；如今你

们来宁冈，革命暴动又可以闹腾起来了。”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我们来到这里，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联合起来一起闹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广大群众，两者相结合，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反动统治。”转问袁文才：“你们这里有多少枪、有多少人？”袁文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有一百六十多人，六十条枪，有的还不能用。”毛泽东接着赞许道：“你们在大革命失败的逆境中，能够保存这么多枪，很不容易哩！但这些还不够，还应扩大武装，发展革命。这样吧，工农革命军赠送你们一百条枪。”袁文才听到这里不禁一愣，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似信非信地看着毛泽东。其他头领也半信半疑，你看他，他看你，互相面面相觑。毛泽东见此情景，又加重语气说：“明天你们派人到蓉市去挑一百条枪来。”这一下，众头领们听的清清楚楚，个个兴奋不已。袁文才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也不含糊，当即说：“听说工农革命军眼下给养有些困难，我们准备了一点款子（七百块光洋），先送上略作补充，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毛泽东、陈浩听着也十分高兴。陈浩向毛泽东递过去一个眼神，毛泽东会意地点一点头。陈浩朝袁文才说：“文才同志，还有一件事要与你们商量，我们有些伤病员要安顿，想把医院和留守处设在茅坪，尊意如何？”众头领对此思想准备不足，把目光一齐投向袁文才，待他表态。袁文才深明大义，环顾一下爽快地说：“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同意留守处和医院建在茅坪。”毛泽东、陈浩听罢，不胜感激。正要表示谢意时，屋外来“酒菜上桌”的呼喊声。

袁文才等头领请毛委员等用饭。宴席间，头领们喝大碗酒，吃大块肉，端起大碗敬酒。酒宴上毛委员又同袁文才谈了一阵子，袁文才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毛泽东等三人回古城。因为第三营伤亡较大，有一百多枝枪无人扛，只得出钱雇夫子挑，决定调三营多余的枪枝。谁能料到，团长陈浩到三营去调枪，竟然碰了个钉子。三营营长苏先俊根本不同意毛泽东不打中心城市而上山结交绿林，现在又来盘三营枪枝，更

为恼火，冲着团长说：“你们凭什么要把一百枝枪送给‘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我不答应！”陈浩见调枪不成，气冲冲地往团部走。毛泽东听陈浩一讲，也觉得棘手，两只手交叉在背后踱来踱去，想了好一阵子，才对陈浩说：“你再去一趟，说我代表湖南省委从三营调枪，若苏先俊再阻拦，以违抗军令论处。”在三营那边，营里干部也觉得营长有些过份。当陈浩第二次到三营，苏先俊又表示执行团部的命令了。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受到袁文才部和村里群众的热烈欢迎，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两个屠夫当即宰了一猪一羊，将热血洒在路上，这是山区人民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在袁文才部的积极帮助下，工农革命军的粮、油、菜得到了解决，也很快办起简陋的留守处和医院，使一百多名伤病员得到安置，使军需物资得以存放。这样，工农革命军就初步落脚茅坪了。

工农革命军出发打游击后，毛泽东找袁文才商量，请他代管留在茅坪的军官队、留守处和医院，还再次托他做王佐的工作。袁文才表示了本人才疏学浅，恐怕代管不好，你们为此器重我，也只好尽力而为了。同时，他提出：现在枪多了，希望革命军留下训练干部，帮助训练我的队伍。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可以先招收青年农民，训练教官随后就派来。”袁文才十分信赖毛泽东，工农革命军主力出发后，对头领们交代：“有了毛委员，湘赣边界革命就有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毛委员的安全。”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进驻湖南酃县水口——井冈山南麓，工作开展起来后，立即挑选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三名党员干部，派到袁文才部当教官，帮助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还专门找他们谈话，强调要尊重袁文才的领导，要相信战士，只能教育，不许训斥。

据侦察，茶陵敌军向酃县追来。毛泽东派出一路去抄茶陵敌人老窝，自己率一路到遂川活动，然后经井冈山南麓——黄坳上井冈山。山上的王佐，经过老庚袁文才的工作，同意工农革命军上山，并派朱斯柳下山迎接工农革命军。朱斯柳南路下山，正好遇到工农革命军，他说：“我代表王佐大哥欢迎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这样，毛泽

东要求大家同山上的王佐部队和群众搞好关系,为此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然后,由朱斯柳带路上山,同王佐部会合。毛泽东登门拜访王佐,感谢他派人下山迎接工农革命军上山,当面宣布赠枪七十枝,帮助他扩大武装力量。王佐爽直地说:“谢谢工农革命军帮助扩大武装,我们有五百担稻谷拨给你们,先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有什么要我办的,尽管说。”他提出要工农革命军派干部帮助训练部队。毛泽东当即答应王佐的请求。

改造绿林军创立根据地

毛泽东坐镇井冈山,团结、改造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武装;部署工农革命军下山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帮助群众建政权;召开周围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他们回去恢复党组织活动,组织农民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他从山顶茨坪到山脚茅坪,积极做王佐、袁文才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一面,又指出他们目标不明、力量单薄、纪律松弛等弱点。经过多次诚挚交谈,循循善诱,逐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认识到:“劫富济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绿林生涯不是长久之计,跟共产党干革命才是正道。袁文才对其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王佐也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毛泽东又派何长工去改造王佐这支绿林军,要求他不能慢,又不能急,既要坦诚,又讲策略。何长工到了王佐部队,受到热情接待。开始,王佐仍怀戒心,怕何长工拆台,把他安排在与战士相隔的地方休息。何长工先接近王佐母亲,再做小头领家属工作,从几面影响王佐,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他的疑

虑。王佐想收拾多年宿敌尹道一,同何长工商量解决办法。何长工问清尹道一的活动规律,帮助王佐制定引蛇出洞、埋伏歼敌的计划,同时向毛委员提出派一连兵支援的请求。

一切安排就绪,王佐率一支小部队凌晨到拿山臭骂尹道一,用激将法将他诱出村外。尹道一从来不把王佐部队放在眼里,经常穷追不舍,今天受到如此的辱骂,岂能容忍,气急败坏地纠集二百多人,指挥追击,并喊道:“不抓住王佐,血洗茨坪,誓不罢休!”王佐见尹贼上钩,边打边退,提前回茨坪了。尹道一指挥二百多人追到旗罗坳,已是饥俄人乏了,决定吃饱饭后再追。这正好进入王佐部一百多人和工农革命军一个连伏击圈。他们经过隐蔽活动,集中火力狠打尹道一的团丁们,枪弹、手榴弹一起在团丁们中开花。待尹道一知道中埋伏就迟了,团丁们乱成一团糟,死的死,逃的逃,连尹道一也很快倒在血泊里了。一个小头领认出是尹道一,立即砍下他的首级,用衣服包好背回茨坪。

王佐大摆宴席,庆贺胜利。在宴会上,王佐大讲何长工的谋略,大讲工农革命军的真诚支援,大讲毛委员宏才大略。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王佐等头领们,为进一步改造这支绿林武装打下了基础。过了一段时间,王佐对党代表表示:愿将自家的田产拿出来分给贫苦农民。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王佐的入党申请和一段考察,到1928年春批准他为中共党员。

毛泽东在做王佐、袁文才工作的同时,十分关心这两支绿林武装的训练工作。去训练场鼓励战士们学好本领,多杀敌人。利用战士们操练空隙,对战士们幽默地说:“《封神榜》上有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那样的本事呀!”还安排这两支绿林武装到工农革命军参观学习,提高他们对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的自觉性。袁文

才、王佐在这两支武装中,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吸取一批青年农民,送走一批不能坚持的老“油条”;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两支武装经过训练,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大为提高,军民关系得到根本改善。

应袁文才、王佐扩大武装的请求,中共前敌委员会于1928年2月中旬将袁、王两支武装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命袁文才为二团团团长兼一营营长,任命王佐为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任命何长工为该团党代表。为了加强党对第二团的领导,又从第一团派出20余名政工干部到第二团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基本上完成了对两支绿林武装的改造工作,不仅扩大了工农革命军,而且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奠定基础。

毛泽东依据敌军第一次“进剿”形势,召集第一团、第二团干部的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战斗,制定三面围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歼敌人的方针。率部队夜间进入阵地,次日晨在袁丁珠剪断从永新通往宁冈的电话线后,趁敌军做徒手体操时,指挥第一、第二团突然发起猛攻,激战半天,全歼“进剿”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500多人,打死敌营长,活捉伪县长,捣毁县衙门,救出被关的无辜群众三四十人,取得新城战斗大捷。王佐、袁文才大开眼界,认识到官府大军也是可以打败的,毛泽东一套办法比自己高明得多,更加佩服毛泽东。

新城战斗后,在箬市举行宁冈县军民万人大会,经过审判处死罪恶多端的国民党县长,宣告成立宁冈县工农政府。加上在这以前,工农革命军摧毁茶陵、遂川两县国民党政权,帮助茶陵、遂川两县人民建起工农政权。这些,就标志着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责任编辑:卢弘)

邓小平与 小平解放西藏

阴法唐

1983年夏天，我携带着雪域高原的风尘，来到风景秀丽的疗养胜地北戴河。一天上午，我来到了小平同志下榻的海滨寓所，正碰上小平同志要下海游泳，作为一个30多年前在他的麾下战斗过的老兵，我毫不拘谨，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他汇报西藏的情况。

早在1958年8、9月，小平同志就两次提出修筑拉萨至黑河（那曲）的铁路路基。1979年还批示了西藏修筑铁路的路线。这次他又提出了修路的问题。开始我还以为是指青藏公路铺沥青路面的情况，后经他提示，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铁路，并问走哪里。我回答说：“还是走青藏线。”他又问：“盐湖怎么办？”我说：“盐湖已经过去，修到格尔木了。”他又问：“还有啥问题？”我说：“还有水冻层问题，不过一些专家们认为可以解决。”

“从格尔木修到拉萨要多少钱？”
“我们与国家计委预算过，原来要28个亿，现在看可能要三四十个亿。”我回答说。

“距离多远？”

“1100多公里。”

他扳着指头算了算说：“用不了。”

他想了想接着说，“还是走青藏路吧！”接着我汇报了经济、统战、宗教等方面工作。当我汇报到西藏逃荒的回来了，要饭的基本没有，农牧民的人均收入由140余元增加到220元，出现了安居乐业的新局面时，他连声说“好！”在汇报宗教统战工作时，他表示：只要认识问题解决，方针政策对头，西藏工作是完全可以搞好。我怕耽误小平同志游泳，顾不得喝水，除答复小平同志问题外，几乎一气说完，才向小平同志告辞。小平同志说：“你说的我听明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

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径直游向大海。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涌动的大海深处，我的心头也涌起了一股感奋的浪涛。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都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他在担任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到总书记期间，呕心沥血，精心谋划，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的往事，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样向我涌来……

二

当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西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毛主席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

号召,并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当时主持西北局的彭德怀同志回电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1950年1月2日,毛主席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肩上,一场伟大的进军西藏壮举由此揭开了序幕。

西南局、西南军区首先考虑的是确定进藏干部和部队。邓政委、刘司令员毅然决定让年仅36岁的18军军长张国华同志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在豫皖苏军区当司令时,国华同志对开辟新区工作颇有建树,此时,他已出任川南地区行署主任。邓政委、刘司令员考虑到18军的目前状况,授权国华同志在二野的范围内先调最强的干部和人员组成进藏部队,要谁给谁,要哪支部队就给哪支部队。但是,国华同志感到对18军干部和部队比较熟悉,与其临时抽人组建部队,不如就带18军部队进藏。邓政委和刘司令员同意了他的想法。1月8日,刘、邓首长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电,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报告由18军担任进藏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1月10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1月15日,刘、邓首长向18军军、师领导传达了中央及毛主席关于进藏问题的指示,并研究了工作部署。1月18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1月24日,批准了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吕炳柱、陈明义、刘振国、天宝(后又补充平措旺阶)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

从此,18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在风雪高原这一生命的禁区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谱写了一曲藏、汉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历史诗篇。



三

中国古代兵家常说:“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可是,在邓政委的心中,进军西藏,不仅粮秣要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大政治家。这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当我们二野部队还在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他就说,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着重考虑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可专门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以利于他们的发展。

邓政委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

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1951年1月15日,邓政委和刘司令员在重庆曾家岩召见18军张军长、谭政委和师以上主要领导。我们52师是政委刘振国同志去受领任务的。开会时,刘司令员先讲话,他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邓政委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



△建国之初的邓小平和刘伯承

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我们需要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18军干，主要由于干部问题。

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的讲话在18军部队传达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官兵对党和祖国赋予的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感感到无上光荣，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及早踏上征程。也有极少数干部战士考虑个人问题多，尤其是一些年岁大的同志，想在富庶的天府之国成家立业，而进军西藏这会使得他们的希望落空。小平同志及时预见到了这种情绪，1950年2月6日，他专门为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光荣。”在同日召开的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对18军进藏前部队的士气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月15日，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进军西藏的重大政治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提出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并要求进藏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支援配合18军进藏，刘司令员、邓政委运筹帷幄（贺龙同志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后也是这样），从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于1月22日决定组成规模大、等级高的支援司令部（简称支司），昌炳任司令员，晋光义任政治委员。5月13日又决定支司与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成立统一的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统一修路和运输的指挥。军区又电示第4兵团：“在14军进驻滇西北后，应即准备一个精干团，经德钦、科麦溯雅鲁藏布江西进，策应与支援第18军解决西藏问题。”为了适应高原进军作战和长期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调查与进军有关政治军事情况，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保证主力作好进军准备，18军52师派出154团，由师长吴忠率领进驻西康省的甘孜；53师派出157团，由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进驻西康

省的巴安（现巴塘）。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组成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先遣部队。这样，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就逐步走上了正轨。

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交错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

1950年1月，他和刘司令员向18军传达毛主席关于进藏问题的指示时就非常重视从政策上来解决问题。他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大力加强为西藏政策制定工作所需的调查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进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为了使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小平同志指示起草进军守则，并要求部队学习藏语。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小平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全面贯彻落实，紧紧扭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不放。5月11日，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4条方针，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即：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

来。实行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央复电，认为西南局所提的4条较好，但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于是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起草了10项政策：“(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策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小平同志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就是以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10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西南局的这个10条，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还觉得这10条太宽了些。小平同志说，我们对西藏的10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低估。”“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

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

根据中央关于物色适当人员赴拉萨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指示，西北局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一批遭到扣押。西南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在物色赴藏劝和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员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小平同志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佳，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比较复杂，因此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总司令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有尊重他的意愿。小平同志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十分遗憾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痛不已。在他召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首首都送了挽联和花圈，小平同志和贺龙司令员送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现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为世世代代纪念格达活佛，加强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藏区稳定发展，正在修建朱总司令和格达活佛友谊塑像。

然而，尽管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和西南局、西北局都为此作出积极的努力，我18军全体指战员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和远见。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之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

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妄图用战刀来阻挡和平之盾。他们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个代本（相当于团）和民兵3000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在此情况下，一场以打促和的仗非打不可了。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全面拉开了序幕。我18军52师全部，53师、54师、军直各一部，在青海骑兵部队驻云南14军126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师先遣连的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9个代本起义。战斗历时20天，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

五

昌都解放后，我们不但以胜利者自居，还仍然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一贯方针。中央督促西藏当局，周总理直接通过印度给西藏地方政府做工作，我进驻昌都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统战宣传工作，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继续争取和谈。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在我党我军影响下也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平谈判。在政策的感召和从各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之后，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抛弃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方面的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同志和贺司令员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19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小平同志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10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并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西藏“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方针，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向进藏部队提出了具体



△阴法唐在易堆拉检查工作

的要求。如为了防止进藏部队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看不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犯急性病，违犯政策，他就提出遇到这类问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就使干部战士很易理解，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提高了遵守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早在我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重要方针，西南局、西南军区对此极为重视。部队进至拉萨和其他国防要地后，在供应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从内地运输和就地开荒生产，辅之以必要的采购等办法解决。就是断粮断顿，也坚持不向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寺庙索取。

在邓政委的严格要求之下，我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进军途中，我们始终坚持住帐篷而不进寺庙，不经同意不住民房。许多干部战士断粮，也不吃群众地里的一把青稞。记得在行军途中，一位战士对横在路上的老鹰踢了一脚，即因不尊重藏族风俗违犯政策纪律而被罚以警告处分。对部队这种严格要求，认真执行纪律，在西藏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西藏的高层官员、僧侣、贵族到一般的群众，都热情称赞我进藏部队是“新汉人”、“菩萨兵”。

在宗教这个在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上，邓政委更是多次教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增

进汉、藏民族的团结。1951年9月，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同志率领的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城前，邓政委专门交待，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来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

六

1952年，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尽管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辛苦，但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研究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对张国华同志说，西藏自治区的组织形式要力求简便，机关要精干，下层工作方式应多为口头，少用公文；西藏各级机关吸收藏族干部参加工作；派去的汉族干部主要求精，每县至多派五六名去培养藏族干部，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西藏工委一方面从一些苦大仇深的农奴之中物色干部苗子就地锻炼培养，一方面在陕西的咸阳成立了西藏公学，另一方面保送优秀藏族青年到成都、北京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现在西藏自治区及地、县各级绝大多数都由藏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里面深深渗透着小平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

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一直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敏感、关系大局稳定的大问题。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主

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多次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分析，感到西藏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当1956年9月中央确定6年不改后，他专门指示张经武同志：“西藏今后6年不改是肯定的，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下马，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调越快越好。”针对西藏干部围绕改革出现的争论和思想认识分歧，1958年3月2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党内的整风等问题，他严肃地指出：“工委内部整风，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摆开，大胆地放，硬着头皮听两个礼拜，自己要引火烧身，都搞自我批评，听取意见，准备检查。”

尽管党中央、毛主席充分考虑照顾到了西藏地方政府不愿改变现状的愿望，进藏部队表现出了极大克制和忍让，西藏工委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工作，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劝说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涅 滞留印度的达赖回国，但一场叛乱还是发生了。针对西藏一些地区发生的局部叛乱，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藏叛乱武装来西藏，除噶厦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

对西藏局势出现的暂时逆转，党中央、毛主席采取非常明智的政策，坚持6年之内不改革，我进藏部队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但由于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谋划，西藏境内的叛乱不断升级，从局部叛乱迅速演变成一场全局性的武装叛乱。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始终采取了冷静、理智的态度进行处理。1958年8月9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召见张国华同志谈话，明确指出了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交通要保护起来，双管齐下，先从交通要道把自己的命保住。6年不改，但出了乱子由他们负责。

时隔10天之后，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同志准备回藏从军事上进行具体部署时，邓小平总书记又一次向张国华、邓少东同志亲自交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

部队拿上去,还有4年多时间,长的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

接着,小平同志又对西藏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六年不改,收缩方针没有变化,收是对头的,他的统治者要变是另一回事,与我无关,他们要变,我们就发动群众。和平改革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但完全用和平的方法是不会的,我们要作准备。”

西藏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叛乱武装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我们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我们才于1959年3月20日起,从拉萨开始进行全面的平叛斗争。平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在广大西藏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平息了叛乱,满足了农奴群众的改革要求。一场改革的春雷,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砸碎了束缚在百万农奴身上的枷锁,摧毁了封建奴制度,推翻了农奴主的反动统治,使千百年来深受压迫的百万农奴重见了光明,翻身解放,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到1962年3月,西藏境内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一个僧侣贵族专制的时代在西藏高原永远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岁月已远,沧桑巨变,许多历史的往事正渐被淡忘。但是小平同志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完成民主改革等,所建立的功勋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屋脊上。

(责任编辑:刘家驹)

炎黄文化浸润闽台 两岸同仁盍兴乎来

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 在厦门举行

本刊记者 文茂

今年元宵佳节,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在鹭城厦门,开始了为期5天的闽台文化学术文化讨论会。这次会议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福建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程思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萧克高度评价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创造的带地区特点的闽台文化,指出研究讨论它的重大意义(全文另发)。程思远说,台湾同胞多来自闽、粤两省。台湾人民一直把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奉为生活、处事的准则,并一直延续至今。闽、台两省人民同宗共祖,血脉相连。这种联系在历史上曾几度遭受外国列强的割裂,但始终未能割断。最近几年,“台独”势力无视大陆与台湾的骨肉联系,提出所谓“台湾新文化”,企图割断台湾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关系,这是数典忘祖,不仅遭到11亿多大陆人民的唾弃,也遭到两千多万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践踏中华文化的行径,必将以彻底惨败而告终。

大会共收到论文50多篇,30位学者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家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各抒己见,对闽台文化的渊源、特点及其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学者们以大量的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资料,分别从移民、考古、语言、地名、习俗、戏剧、文学、宗教等方面,论证了闽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大家在最基本的方面取得了共识: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结合地区特点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伍洪祥在闭幕词中说:闽台文化学术研究,以铁的事实揭示,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神圣责任。与会者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特别是在双向交流方面有新的发展。

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

● 李新



从1934年认识王方名起，直到他1985年去世，我们之间友谊从无芥蒂，至死不渝。1974年国庆节前夕，我曾写了一首诗赠他：

风雨巴山四十秋，
长江不改向东流，
凶终隙末寻常事，
惟我与君到白头。

他步韵和了一首，全诗已记不起来了，最后两句是：

江山易改人常在，
风雨同舟到白头。

人常在，他在哪里呢？他是搞哲学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顺着潮流走，有益于人世，就属永恒之列，可以不朽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是还鲜明地活在我的心中吗？

我是在重庆川东师范认识王方名的。他比我大两岁，原在川北嘉陵高中读书，因发表同情苏区和中共的言论被学校开除，幸有人帮助，得以转学到川师。

1935年春，我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性质的团体“众志学会”，我被推为会长。办了一个《众志》壁报，报头是王方名写的，编辑工作也由他主持。他是写文章的里手，不论哪一类文章，他都可以按需要即刻写成。壁报很受欢迎，轰动于校内外。正准备铅印，因得罪了训育主任，被学校当局取缔了，但我们仍组成了“众志球队”之类的文体组织继续活动。王方名一直负责学联的宣传工作，无论川师或学联的宣言、通电以及重要的传单等宣传品，大部分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字写得不错，还会刻蜡板、刻图章。重庆学联的图章也是他刻的，这颗图章还一直由他掌管。因为图章上有暗记，学联被反动当局取缔后，这颗图章却照样有用，能把各校的有关人员召集起来。他在1935年—1936年的重庆学运中，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在川东师范上学期间，王方名因为婚姻问题与他父亲彻底闹翻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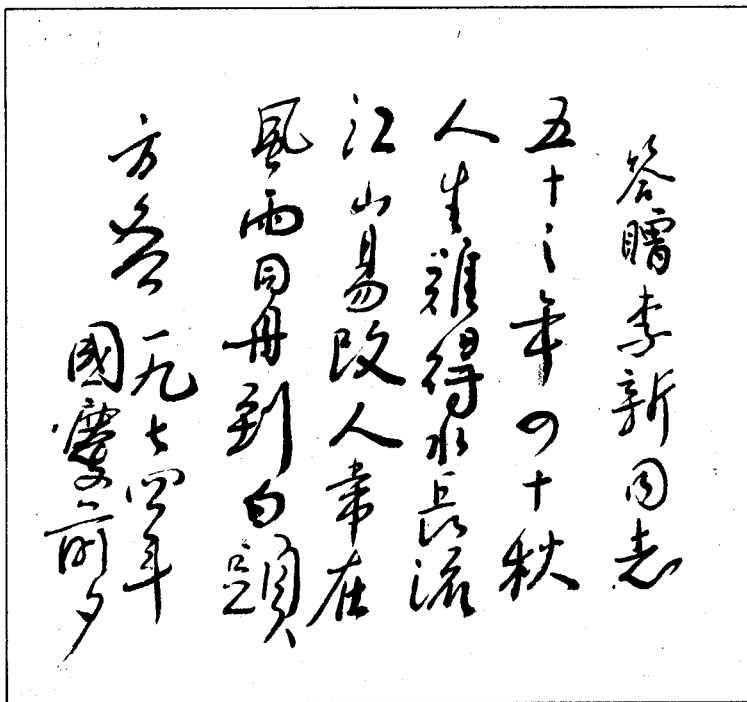
绝了父子关系，但王方名并未屈服，在我们支援下，他在川东师范一直读到毕业。

这时，抗战已经爆发，我们正考虑如何先到陕北入“抗大”或“陕北公学”，然后到华北参加抗战。于是，我邀请王方名来到万县，帮助我在民众教育馆办民众学校，并积极筹备北上之行。为了赴陕北顺利，我们由抗敌后援会出面组成了“华北川军慰问团”。到了渠县，正值春节前，到处都很热闹，正是展开抗日宣传的时机。我们练熟了许多救亡歌曲，把《放下你的鞭子》也重新演练了一番，并开始排练我和王方名合作编写的短剧《两弟兄》。在抗敌后援会的主持下，我们在渠县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效果很好。

由于在渠县的演出成功，我们随即沿嘉陵江北上，一路都找抗敌后援会接待，既便于宣传，又节省路费。

到延安后，王方名和我都进了陕北公学，而且编在同一个队、同一个班。很快我就被调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毕业后则分配到旬邑陕公分校。1938年10月，我从西安回到陕公分校。这时王方名在队上任指导员，我在组织科工作，我们工作关系密切，见面的时候很多。1939年初，我调回延安；他则在这年春天东渡黄河，到敌后去办抗大分校，先在晋东南，以后又到了山东。我虽然也在这年秋天也到了晋东南，但他早已离开了。从此我们各自西东，直到1953年见面时，他已蒙受了极大的冤屈而无法挽回了！

那是1953年的初夏，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一号的小礼堂召开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会。这个会由我主持，各系及附属工农中学都有代表参加。等到附中代表发言时，全场的人都很注意，因为这位代表讲得很精辟，而且手舞足蹈，神采飞扬。我一看，这不是王方名吗？但再一想：他怎么能在哪儿呢？可再仔细一看，分明是这位老兄无疑。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你是王方名吗？如是，讲完后请坐到我这里来。”他讲完后，果然来到我身边，散会后便到了我的家。在我家里，当我问起他的近况时，尽管当着我家人的面，他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大哭一场。他告



诉我：他到敌后，先是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任指导员，随后到胶东任胶东公学副校长，全国解放后，高教部把他调到北京任政治教育专员。

王方名把他受冤屈的经过和我讲得很详细。1952年“三反”时，王方名给高教部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引起了许多领导对他的极度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高教部领导如获至宝，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按党章规定，开除党员要经过支部，但“三反”期间谁还顾到什么党章呢？由党组书记钱俊瑞签名呈报，经“三反”运动副主任刘景范批示，再送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准，这个铁案就铸成了。在处理王方名的问题时，钱俊瑞完全是感情用事，他不仅不按手续，甚至连王方名的档案也没有查阅。因为王方名的履历表上，有许多地方都填写了我是证明人，而我和钱俊瑞共事多年，关系也很好，如果他看一看档案，何至那样轻率地就把王方名开除党籍呢？

事已至此，怎么办呢？那时，他已被贬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中学当教员。不过这也好，因为附中正由我管，

我可以帮助他伸冤鸣屈。我俩分析的结果，暂时不能完全翻案，最好先调到本科教书。教什么呢？他希望搞哲学。考虑到他已没有党籍，搞哲学有困难，于是决定到逻辑学教研室工作。

王方名到逻辑教研室以后，非常用功，他语文基础好，各种知识丰富，在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上很快取得了成绩。他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逻辑学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这些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无论在苏联和中国，大多数研究逻辑学的都认为逻辑学有阶级性，同时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完全对立起来，更多的人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的，只有辩证逻辑才是高级的思维形式。王方名则认为如果逻辑学有阶级性，那么请你拿出无产阶级的逻辑学来吧。西方自希腊以来，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人们讲的逻辑规则基本上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印度的因明学也一样，都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别，何况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当然是很高级的学问，但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学家的思维能够不符合形式逻辑吗？你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你不是红专，就是白专；这种逻辑，简



1983年5月在西安

直是天大的笑话。很显然，真正的科学思维，必须既合乎辩证法，又合乎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高低之分，虽然恩格斯有类似的说法，但未必恰当，至于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那就更近乎荒唐了。王方名的这些论点，遭到逻辑学界很多人的批判，而这些人自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这场争论中，周谷城老先生和王方名是一致的，但他们是少数派，而且都不是党员，处境很困难。毛主席年轻时学师范，对逻辑学很有兴趣，以后也很注意这方面的学问，所以他支持周谷城、王方名这一方。毛主席曾特意接见了他们，并设便宴招待，鼓励他们在学习上坚持真理，但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

自从毛主席接见后，王方名的处境大为改善。人民大学党内主要负责人胡锡奎改变了从前的态度，对王方名格外重视，并一度让他担任逻辑教研室主任。但教研室内部仍有人对王方名不买帐，一则学术观点不同；二则王方名已被开除党籍，毛主席接见并未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可见他的问题严重。王方名向我谈到这些情况后，我引他去见吴老（玉章），请示是否该提出申诉了。吴老一直很关心王方名的问题，由附中调到本科安排到逻辑教研室都是由吴老解决的。现在他主张先向校党委提出，然后再转呈中监委和中组部。随后王方名即向校党委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沉痛地检查了自

己的错误，然后希望校党委复查他的问题，恢复他的党籍。校党委讨论他的报告时，都认为对他的处分过重了，但校党委无法解决他的问题，必须他本人直接向中监委申诉，校党委负责转呈。王方名又向中监委写了申诉书，校党委附上几句话之后，送呈中监委。不几天，中监委将原件退回，不予受理。怎么办呢？我先后去找了刘锡五和王从吾，当时他两人都是中监委的副书记，我把详细情况向他们报告之后，他们都认为对王方名的处分是在“三反”运动中作出的，现在来看是过重了，可以改变。但最好由人大党委进行复查，提出改变处分意见，呈请中监委批准。我将他们的意见转告了党委，党委随即进行复查，并提出了改变处分的意见，再送呈到中监委去。但不久，中监委还是把原件退回来了。怎么回事？我和王方名进行了分析，认为钱俊瑞、刘景范和安子文三人的批示，好比三座大山，谁敢推翻呢？我们又去找吴老请教。吴老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如果钱俊瑞那里能松动一下，事情就好办了。就这样，王方名的申诉只好暂时放下。

1958年，来了个“大跃进”，闹得举国不宁。钱俊瑞也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陕西当副县长，随后又转到安徽去当副专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文革”中，王方名被当作“黑五类”分子，受的折磨更甚。

1976年10月，“四人帮”在万人

唾骂中倒台。王方名的问题也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解决。钱俊瑞回到北京后，我专门去找他。这次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王方名的问题。

钱俊瑞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谈话和批评，非但不生气，而且不断点头。最后他很诚恳地自责道：“荒唐，荒唐！我这人竟是这样的荒唐！让人家受了多年的罪！事情解决后我一定要向他当面道歉。随后，由他写了一份报告，说清事情的经过并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请刘景范、安子文撤销他们的批示，再提请中组部作出为王方名平反的决定。钱俊瑞办事还是那样的精明，他写的报告简直是一篇很动人的文章。其自我检讨也真挚诚恳，令人感动。可见一个人只有在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来承认整人的错误。我从钱俊瑞身上深深地悟出一条重要的处世之道，从而对那些能在任何条件下只整人而不挨整并因此自诩为一贯正确的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由于找不到刘景范，钱俊瑞对我说：只要安子文能撤销他的批示也就可以了。那时安子文在中央党校任校长。我从1978年秋就借住在中央党校编革命史，找他比较容易，所以钱俊瑞就托我转交他的报告。安子文看了钱俊瑞的报告后，二话不说，就在报告上写下了他的意见，说他从前的批示有错误，应予撤销。并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笑了笑，略微闲谈几句就告辞而出。很快，王方名的问题经中组部批准解决了，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党籍。

问题最终在举手之间解决了，但28年的时光已流逝。且不说王方名在这28年中挨了多少斗争，遭了多少罪，写了多少检讨，流了多少泪；就是他操劳起精神来作的研究工作，其资料 and 文稿不知有多少也在“文革”中被抄没无遗了！问题解决后，他高兴之余，想理旧业，但一看书架上乱糟糟的，除马列著作和毛选外，其他一无所有。再看看箱柜也是如此。他四顾茫然，王方名勤于研究，勇于探索，他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新见解都只写成提纲和草稿，未敢轻易发表。他已发表的文章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比

较平稳的部分；而大部分都储存在那里等待将来，这并非是他研究的成果不成熟，站不住脚，而是因为他的处境不佳，使他不得不如此。现在处境改善了，但稿件、资料以至有关的一切都完了！

他和我商量以后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再研究些什么？关于到什么地方——人民大学或北京市社科院？王方名倾向于去北京社科院。我当然听从王方名自己的决定。

他在五十年代就很注意从中国古籍中搜集、整理逻辑方面的材料，但写成讲义时，从不照搬西方和苏联那一套。他认为，现在的思想和语言比过去已经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但演绎法还是希腊时代的，归纳法还是近代初期的，为什么不可以从现代思想和语言中去求得逻辑学的发展和丰富呢？随着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革命性变化，逻辑学也必然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六十年代初，曾有人否定形象思维的存在，甚至从事逻辑学专业的也有人跟着瞎嚷嚷。王方名对此非常愤慨。他说：如果没有形象思维方法进行，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呢？请问：三千丈的白发、如斗大的雪花，合乎抽象思维的规则吗？他还特别举出了元人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说：这不是形象思维是什么？难道是抽象思维吗？抽象思维属于人类理性方面的需要；形象思维更多地属于人类感情方面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那么人就既有理性，也有感情，因而既有抽象思维，也有形象思维。王方名就形象思维写了一系列文章。

王方名从研究逻辑学开始，就认定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思维的形式而非它的内容，而那些强调逻辑有阶级性的就是把逻辑研究对象搞错了或混淆了。要弄清思维形式的规律，必须研究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所以从五十年代末，他就开始对人类思维史的研究。他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特别对黑格尔的著作感兴趣，为此他常常请教何思敬。但这方面的著作很少，这是科学上的缺口。王方名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一方面考察人类从古至今的思维发展；一方面考察儿童由幼到

长的思维发展。他到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人类学和考古学等研究部门去搜集资料，请教专家，得到这些部门的专家热情帮助，认为他的研究很有价值，无偿地给他精印了一些图片。他又专门到心理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去搜集儿童心理发展的材料，还亲自到幼儿园、小学去进行他自制的一套测验，并与一些小孩和家长交上了朋友。他不仅收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而且已形成了不少重要的观点。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人类思维的发展和儿童思维的发展过程竟是那么的一致！从“识数”到“会算”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哭到会唱儿歌、会童谣的过程也不简单，抽象思维的高度发展形成科学，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形成文学艺术。王方名准备把思维史写成一部大著作。我虽是个外行，但对他谈到中国的材料时就感兴趣。如他说中国人的抽象思维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发达，但多重重视治国平天下，而缺乏世界整体的思考。无论儒家、法家和杨、墨都是如此，只有道家有较深的哲学思维，但又过于空泛虚玄而欠深入细密，直到宋儒才在吸收佛学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理学”。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专横，严密统制思想，除极少数不满分子隐居到山林去谈佛谈玄外，所有的士人或经“推举”，或经“考试”，都去当官吃俸禄，在以皇朝划定的圈圈内去思维，做学问，写文章，著书立说。就是诗词歌赋以至琴棋书画都不能超越这个范

围。加以轻视体力劳动和工商事业，使得自然科学不能发展。所以中国人抽象思维的天地很狭小，老是跟着统治者的意图打转，固步自封，很少进步。以逻辑学而论，战国时颇为活跃，但还没有形成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体系，以后就停滞了，更不可能产生归纳逻辑，直到近代，还是从西方输入逻辑学。又如语言文字学，这似乎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把方块字弄得神乎其神，奇而又奇，一字之好，令人颠倒。后来发展到写对联，猜诗谜，还有什么八股文等等。这一系列近乎文字的东西，束缚了无数士人的头脑，搞了几千年，仍然只知道什么是句读，什么是虚实词之类一点点东西，根本没有形成严密的语法。直到近代，还是马氏兄弟参照西方语言学写了一部《马氏文通》，中国人才开始研究自己的语法。至于形象思维，由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发达得很早，所以很早就有人探索形象思维形式的规律。研究《诗经》的结果，把它归纳为赋、比、兴三种体裁，而且发现三者又可以互相渗透结合。这一成果是很有价值的，可惜以后没有发展。对诗的研究如此，对其他文体和音乐、绘画等的研究，也相差不多。尽管在美学和技巧方面的研究有许多成就，但对形象思维形式的研究则几乎陷于停止了。所以到今天还争论有没有形象思维问题。我对王方名讲的一套道理，虽不甚了然，很难置可否，但觉得把它写出来是会起作用的。特别是对建立起

1983年8月在峨山





1983年8月在青岛

思维史这一学科,对于科学事业和文学事业的发展都很有益处。因此我鼓励他树雄心,立大志,一定要抓紧把思维史完成。

王方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他对哲学问题经常思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颇有研究。还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他就想写文章批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这完全是为树立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写的,把一部联共党史写成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的历史,神化已死的列宁,又是为神化活着的斯大林服务。

至于谈到辩证法,联共党史把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三个法则,别出心裁地改为四个要素,有意把否定之否定取消了。取消了否定之否定就是认为事物发展不是螺旋形的,迂回曲折的,而是直线的甚至是可以跳跃式地前进。这样的发展便没有了继承性而增加了随意性,很容易导致唯心论或唯意志论。联共党史还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的学说改为生产力只由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组成,排除了劳动对象对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错误的。我们当时的“大跃进”思想,固然有中国本身的原因,但与接受了联共党史的思想,也有很大关系,我很欣赏王方名的这些思想,但不赞成他写文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写这样的文章,至于像王方名那样处境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文革”结束后,他的劲头又起来了,有一次他拿了文章的提纲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对提纲作了些补充,而对他写文章的计划未置可否。

王方名想写的东西太多了!而他想写的每个项目,规模都很大,难度则更大。尤其是思维史,全部资料,笔记和文稿已片纸无存。现在如何着手呢?他很痛心,但又不肯罢手。每一个项目他都不肯放弃,但年龄和精力以及客观条件都无法使他能达到主观的愿望,于是他陷入矛盾和苦恼中。他的助手和他闹翻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也不以他为然。他的长子本来很同意他的逻辑思想,后来也走向反对他那一面。他感到莫大的孤独。一次,他对我谈到这些情况时,十分感慨,痛苦地拉长声音叹息道:

欲取鸣琴弹,
恨无知音赏。

他吟诵毕,颓然往沙发上一倒,再也不说话了。我发觉他那两条泪线,悄悄地给他面颊往下流淌。我注意看他,额上布满皱纹,头发也变得稀疏,头顶已光光的了,我不禁轻声叹道:“老了!方名,我们都老了!”我劝他以后不要想写那么多的东西了,甚至可以撒手不写了。我说:“主观愿望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办不到的事何必强求?我们做不了的事,还有下一代嘛。”不等我说完,他忽地站了起来,愤愤地对我喊道:“你也觉得我不行了?!哦,我完了!我完了!”一副怒不可遏又力不从心的样子。我扶他坐下后,又耐心地劝慰了他一通: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已度过了半生。本来搞学问就晚了,以后蹉跎了十多年的岁月,着急也于事无补,不如量力而行,这是历史的安排,再也改变不了。我特别一再问他:“我们只能有点余热,你承认吗?同意吗?”他勉强地点了点头。

1982年,我接到他寄来的自作书画。他多年不习此道,现在重新捡起来,因为历经沧桑,无论书法和画笔都更苍劲有力。我很高兴,按他附寄的诗和了一首寄回:

青山长驻水长东,
革命人生万代红。
百炼千锤钢铁汉,
行书漫画乐无穷。

我以为他此后会安心下来了。谁知他思想矛盾愈演愈烈,一时提笔写这方面的文章,一时又改写另一个问题,接着又全都撕了,扔进纸篓中。每日起居无常,有时半夜起来伏案奋笔,

黎明大睡;有时半夜才睡,黎明又起来疾书;弄得家人深以为苦。他的思想时东时西,有时很敏锐,有时似乎又很迟钝。他的行动也很任性,到处乱跑,家人常常不知他的去处。据说他一次跑到成都,到四川大学他弟弟那里,因弟弟的不幸遭遇,回家后大为伤感。有人对我说,王方名这种情况,是老年人的一种特殊病态,叫做精神飘逸症。我因从未听说过,所以对此说半信半疑,仍希望能把他劝说过来,多在家里以诗词书画自娱,即使是病,也会自然好的。不过从1984年以后,我们见面少了,对他的情况也只能从孩子们的口中略知一二。

1985年9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召开盛大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并向全国直播现场情况的时候,王方名面对电视机,在床上靠着被子与世长辞了!当时,家中无人,孩子们不在,夫人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收看实况。我想,他当时一定有深深的感触。他大概在想,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打倒了,蒋介石也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何必还活在世上让人家看作多余的人呢?还有什么多余的话说出来让人家争论不休呢?可以走了,可以放心地走了!于是他安然地弃世而去。等他夫人开会回来时,看见他斜倚在被子上,还以为他是在休息呢。是的,他是在休息,是在永远地休息。他休息得很安详,毫无遗憾的样子。他一生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任何人,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死在抗日胜利40周年纪念日,真可谓死得其时;他死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可谓死得其所;他的冤案已经平反,他总算死得清白。在悼词中,对死者说一大堆好话固然必要,但那有什么用处呢?重要的是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让后人避免走弯路,少受些痛苦。因此,我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如实地、直率地写出来,一则用以寄托我的哀思,再则希望引起人们的思考。至于我从中引出些什么经验教训,当另外写出文章来。

(马元湘整理 责任编辑:刘家驹)

他在“五四”烈火中 怎样划着了第一根火柴

1919年5月4日凌晨,几个身影悄悄地跨出北京高等师范的校门。他们出门后又悄悄和重重地互相握了握手,然后各奔东西分道而去。

曙光微露时,人们看到其中的一位是个书生模样的南方青年。虽然当时春寒未尽,晨风透衣,凉气逼人,他却敞着领口,甚至卷着衣袖,戴不住帽子的头上,冲冠怒发中正散发出阵阵热气和汗气。只见他行色匆匆又心事重重地,小跑似的急步向前走去……

他是北高师数理部本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四年前,他从故乡湖南邵阳来到北京,考入这所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等学府数理部预科。几年下来,坐在安静教室中的他,竟越来越坐不住了。国运、国忧和国耻,使他在平静的书桌前,心情越来越无法平静。

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为防遏苏联十月对中国的影响,与日本密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5月21日,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抗议,要求废除卖国协定,但这次请愿事先没有妥善组织,当时几千学生站在新华门外,临时推举十来个代表进总统府见冯国璋,结果被冯一番圆滑又兼恐吓的话骗了出来。这事对匡互生触动很大,他深感群众运动若无一个坚强组织中坚就不会有力量。于是,他便和六七位平时相知较深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同言社,到1919年又组成工学会,提倡工学合一,参加的各科同学约30多人。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次年1月为处理战后问题举行巴黎和会。由于中国也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算是战胜国之一,因此也派出代表团参加和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派出的中国代表团向这次和会提出几项要求,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取消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可是,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在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把持下,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诸项要求均遭拒绝,不仅如此,和

会还强迫中国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1日,消息传开,举国为之震怒。北京各高校的爱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群情激昂。

5月3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集会抗议。当天晚上,匡互生所在的北高师工学会在学校饭厅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召开全体会议。原先,北京各校学生团体就有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5月9日举行示威的计划,大家认为在5月7日或9日游行,时间过迟,可能会引起反动当局的阻止和镇压,考虑到5月4日是星期天,可以不需要同学们停课参加,于是就决定提前到“五四”举行示威游行。同一天晚上,北大也召开了群情激愤的全体学生大会,会上也决定次日协同北京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在北京高师工学会的“五三”秘密会议上不少同学主张采取激烈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鼻息,卖国求荣的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这三人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是当时最受舆论谴责的三个卖国贼。会上决定次日联络各校的积极分子,在随大队游行到曹、陆、章等的住宅时,采取激烈行动,当时具体采取什么行动,没有细作安排,不过在当天夜里,就一面派会员先将这几个国贼的住宅门牌号数调查清楚,一面

二五四「英雄匡互生」 领头冲进赵家楼的

● 大申



影攝時校近日七生學國愛師高京北之紹初被命大街道界學京北日四月五年八國民華中



参加“五四”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拘押。这是被拘捕的北京高师学生5月7日被释放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

设法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里，将他们的照片搞来，以便临时可以对证。

5月4日，匡互生等一早就分别直到北大等各校的学生宿舍，通知准备惩处卖国贼的行动计划。那天由北京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进分子约20人左右，大多属高师工学会、高工北大共学会等学生团体。这些同学准备慷慨赴死，匡互生和几位热血战友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写下遗书。他后来曾说，当时“我看见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卖国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

当天下午1时许，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队伍三千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学生们手执小白旗，上书“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各种激昂慷慨的口号，同日上午，各校联合会议决定的游行路线是先到总统府，再往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并没有计划要到曹、陆等住宅去。当时，不仅

一般学生不知已有采取激烈手段严惩卖国贼的秘密决议，就连被推选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也毫不知情。

下午，当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守卫军警阻挡，不准通过。虽由学生代表再三向英、法、意各国公使馆交涉，仍未获允许。这时，就是平素比较温和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悲愤之情，对卖国贼更是切齿痛恨。正当群情激愤之际，忽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卖国贼曹汝霖家里去！”同学们群起响应，呼喊声震耳欲聋。当时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恐发生意外，竭力劝大家别去，但已控制不住。

下午4时许，激愤的游行人群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前。只见曹宅朱红大门紧闭，临窗口上密挂着铁丝网，门口有几个武装警察守卫。这时传说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正在曹家开会，愤怒的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一边把手中写有“卖国贼”字样的白旗，隔墙扔进曹宅。就在一片呼喊声

中，匡互生猛力跟踪跳到曹宅大门右侧围墙上的一小窗洞上，把铁窗撬掉，接着就从这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窗口，冒着危险第一个爬进曹宅。接着又有四五个同学跟着爬了进去。

这时，曹宅内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群众的汹涌声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见匡互生等人跳进来，吓得目瞪口呆，竟自动取下上好的刺刀，退出装好的子弹，眼睁睁地看着这陆续跳进来的5个同学去把曹宅那扇紧闭重锁的大门打开。大门打开后，外面的学生便蜂拥而入。

曹家院子并不大，顷刻之间便挤满了愤怒的学生。匡互生等到处寻找曹、章、陆三人。他们冲进客厅和书房，没见人影，又闯进上房卧室，也无曹贼踪影。其实那天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好都在宅内，他们当天已知道学生游行的事，当他们在家里听见外面大街上的呐喊扰攘声越来越近，便知学生奔赵家楼而来。曹汝霖仓猝间躲进内室夹层的箱子间里，章宗祥则由仆人带领到地下锅炉房去躲避。

匡互生等愤怒的学生四处找不到曹汝霖，便火烧曹宅，演出了“五·四”那一天的高潮。据当时同在现场的周予同先生回忆：“我们找不到几个卖国贼，便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同我一起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信件，便放起火来了。……当时内宅有几个妇女出来说话，说他们不是曹家的人，而是和曹家同住的，曹汝霖不在家，到总统府吃饭去了，如果你们放起火来，那就害到别家了。后来才知道，她们就是曹汝霖的妻妾。过于单纯和善良的青年们居然相信了她们的谎话，不再继续放火。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章宗祥在地下锅炉房里听说起火，便仓皇奔出，被学生抓住痛殴一顿。

不多时，大批军警赶到曹宅，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大家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时，匡互生挺身而出说：“第一个打进曹宅的人和点火的人都是我，与那些被捕同学无关，我去自首！”匡互生想以自己一人换回32人，以免大伙儿为营救同学而放弃了原来所抱的奋斗到底的主张。工学会同学竭力劝阻，他才没去。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匡互生，字济，号日休，1891年11月1日（农历九月三十日）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东乡长沙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县境内有苗、瑶等少数民族，民风强悍，明代成化年间苗族李再万和清代清光年间瑶族雷再浩的青莲教，都从这里起义举事。过去，外乡人都称宝庆人为“宝牯佬”，而外县学生最怕“宝牯佬”，因宝庆人叫打，他就真的叫你吃拳头，决不是说说吓唬人而已。

匡互生小时常跟父兄下地劳动。7岁时，他随伯父碧园先生读书，因用功，很受钟爱。10岁那年，邵阳大旱，饿殍遍地，互生也跟着家人剥树皮充饥。他曾把自己剥来的树皮和一点珍贵的食物，救助别的濒于饿死的人。那时，当地有一个叫贺金声的人见灾严重，便赶赴省城，请得10万石谷子回到邵阳放赈，一下救了几十万人的人性命。贺金声的义举使匡互生深为感动，仰慕之至。

旱灾后两年，清末民族革命的浪涛也波及匡互生的家乡。又是这位贺金声举起反清义旗，在邵阳首倡民族革命。结果遭到乡绅的残酷镇压，贺金声慷慨就义。少年匡互生视贺金声为英雄，立志要象他那样为百姓为正义而献身。

14岁时，匡互生读书的同时，跟一位贺金声的旧部属学习国术。坚持数年，练就了一副铁骨钢筋。16岁以后，他又随师研习船山学说，革命抱负日益坚固。王船山乃明、清之际湖南的大学问家，其学说极富革命精神。毛泽东年轻时深受船山学说的影响。

1910年，20岁的匡互生赴长沙读书。次年秋，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匡互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也扛了一杆枪跟着本校教员石基先生攻打巡抚衙门。这是第一次亲自投身于革命。巡抚衙门被攻下后，他又担任了防守小西门的任务。待长沙局面稍定，湖南准备出兵武汉参与北伐，匡互生毅然加入学生军准备北上，后因南北议和而中止。

1913年，国民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爪牙汤芑铭当上湖南督军。汤对民众大肆杀戮，极尽凶残，被湖南人民咒为“汤屠”。匡互生目睹革命失败，汤屠肆虐，义愤填膺。他在作文课上写了《时事感言》一文，内中颇多影射攻击汤屠之处。此事被人告密。他所在的邵阳中学同湖南反清义士禹之谟有历史关系，汤芑铭早想拔掉这个眼中钉，便借匡互生作文一事大兴文字狱。匡互生在国文教员李洞天的掩护下幸免逃脱，但校长刘武被处10年徒刑，李洞天先生竟因给匡互生修改作文惨遭枪杀。匡互生悲愤欲绝，誓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终于在到北京后，投身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上海立达学园的一次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有一个老师说：“五四学生运动是盲目的乌合的一场闹剧。”当时已是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匡互生立即当场给予驳斥。此后，他写了《五四运动纪实》一文，印成小册子分发全校师生，将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经过真相告诉青年一代，但对当年第一个冲进并要火烧赵家楼的自己却只字未提。在别的场合，他也从来不说自己在“五四”运动的作用和行动，更不以此作为炫耀

的资本。匡互生的高师同学、数学家刘薰宇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参加革命，惩罚卖国贼，铲除军阀，他都拼过命，然而他只是在尽责任，不是想要荣誉，不是想要顶烈士头衔，自然更不是以此作什么进身的手段，所以他做了就丢开，总不愿向什么人提起。”也正因此，他在那场伟大运动中的英雄行为，一直是世人不知的历史轶闻。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所在和品德所致。

他怎样力排众议，聘任毛泽东当老师

1919年暑假，匡互生从北高师毕业，回到湖南，和几个同学应聘到长沙楚怡小学，一面教书，一面编写小学教科书，有幸结识了青年毛泽东。

这时，统治湖南的督军是北洋军阀张敬尧，搜刮民脂，摧残教育，简直是第二个“汤屠”，令湖南人民恨之入骨。“张毒不去，湘无宁日”。1919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发起了“驱张运动”。匡互生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起草了“驱张宣言”，又同毛泽东、何叔衡、易培基等人一起被推举为驱张请愿团的代表，积极参与了驱张的具体活动。匡互生还跑到广东的兵工厂搞到几枚炸弹，秘密运回长沙，打算找机会炸死张敬尧，为民除害。

张敬尧被赶跑后，新上台的谭延闿、赵恒惕慑于人民的力量，不得不装出民主门面。毛泽东等人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联络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文化书社于1920年8月20日在长沙楚怡小学正式成立，匡互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他又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之一。

驱张运动胜利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被任命为省长公署秘书长、省教育委员，并亲任一师校长。一师是当时湖南的知名学府之一。易培基非常敬重匡互生，他一上任就聘匡互生出任一师的教务主任。当时一师先后从全国各地延聘了一批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新人，如本省的周谷城、舒新城等；浙江来的夏丏尊、沈仲九等，还有李达、

李维汉、田汉、辛树帜、赵景琛等，第一师范学校一时群英荟萃，盛况空前。

匡互生担任一师教务主任后，与这批志同道合的教员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工作。他取消了学监制度，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支持学生集会、结社、发行刊物、进行体育活动，提倡自学互助。还支持同学组织“工人读书会”、“平民夜校”等，使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

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匡互生对毛泽东的胆略和才干非常钦佩，便决定“聘请一师毕业的毛润芝回来任教”。原规定凡到一师教书的人，都必须具备大学毕业的学历。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沿旧例则不能被聘为教员，一些人也据此反对聘任他。匡互生力排众议，破除陈规，重新规定“本校附属小学主事亦可进校任课”，使毛泽东破例被聘为一师的国文教员。毛泽东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深得师生好评，一些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也高兴地说：“匡先生真有力！”此事在当时湖南教育界影响很大。为此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询问匡互生的后人在哪里，可见二人相互情谊之笃。

他又怎样呕心沥血， 创建了独树一帜的 立达学园

1922年，匡互生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可是不久即因与学校当局意见不合而辞职。1924年又应聘到浙江上虞的白马湖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那里正聚集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著名学者，如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刘薰宇、赵叔琴等。匡互生到后，对学生关怀备至，倍受师生们的敬重。一次，进步学生黄源（解放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因与学校保守派冲突，当局决定开除他，匡互生力劝未果，愤而辞职跑到上海。朱光潜、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周为群等先生和黄源等一批学生也先后来到上海。

匡互生到上海后，立即与朱光潜、陶载良、丰子恺等着手创办立达中学，有初中学生50余人，先在上海老西门黄家棚租了几间破房子开课，同时在江湾等筹建校舍。朱光潜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是些穷书生，白手起家办学校，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着筹

经费和争取社会支持，我曾陪匡互生找过上海的湖南大资本家聂芸台、文化界要人吴稚晖，还专程跑到北京找过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和教育部参事黎锦熙。”1925年秋，江湾校舍建成，增设高中部和艺术部，改名为立达学园。

立达学园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立达两字，来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含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立意。称“学园”而不叫“学校”，是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影响，讲学重自由讨论，重力行实践，这也是立达不同于一般学校的地方。

匡互生早就梦想着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立一所学校。为办立达，他常常穿着破衣服，啃着冷烧饼，在烈日下和风雨中奔走。朱自清先生曾感慨地说：“互生办立达，饮食坐卧都只惦着她。立达好像他的情人和独子。他性情本有些狷介，为了立达却常去拜望某些大人先生，特别是有钱的老板。还要跑北京、南京。他本可以留学去，但丢不下立达。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立达便是他的生命。”

为了省钱办学，时常啃几只烧饼了事。一年夏初，他刚下火车就直去上课，同学们看到他身上的大褂，背上一大条黄色污块，腰际一大块汗斑，下襟全是煤烟黑印。天气冷了，他没时间换衣服，冷便加上一件，再冷又加上一件，结果穿了三件单衣两件夹衣。

立达学园在教育上别具一格。设有校长，设一校务委员会，匡互生担任主席。没有繁琐的校规和各种形式的奖惩。全校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以诚相见，和睦相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匡互生与立达同人又实行生产教育，旨在通过生产实践使学生养成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进而领会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花了很大力气在南翔柴塘办起一所颇具规模的农场，设有鸡场、蜂场、果木蔬菜园艺部和农机具制造场。他见许多农民子女得不到入学机会，就在农场附设小学部，学生全部免费入学。又在各村庄办夜校，由立达师生轮流去教农民识字学文化，介绍农业生产科学知识，使学校和社会结成一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立达学园在战火中毁坏殆尽。匡互生偕夫人留守江湾，抢运学校物资；战后又忙着筹款复校。父母在老家相继去世时，奔丧后立即匆匆赶回上海。不到半年就在颓垣满目的江湾，一个崭新的立达学园又展现在世人面前。被炮火破坏的屋宇、门窗都已修葺完整，散失的校具书物都已重新置备，学生宿舍里的旧木床竟都换成了簇新的铁床。战后回到立达的师生们目睹这一切，见匡互生都禁不住泪如泉涌。

然而，他终于被繁重的工作拖垮了。1933年秋，匡互生病倒了，开始以为是小病，进医院才发现是肠癌。他躺在病床上，异常消瘦，剧烈的疼痛常使他黑瘦的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去看望他的同学们紧握住他的手，眼泪不住地流。他说：“我平常不注意身体，有事时一碗冷饭或两个烧饼当一餐饭，不料得了这样的病。”他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就在前不久，他为了筹款，在路上出了车祸，他负着伤忍着痛仍去办事，完了才到医院去诊疗。医生除给药外，叫他每天喝几杯白兰地活络血脉。可是，当他得知一杯酒要6角大洋时，便拒绝再喝。

手术后，医生说赶快输血，立达的同学们都争着露出了手臂。医生感动地说：“这位先生如此受学生爱戴，这样热烈献血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

虽然有那么多人的衷心热爱，虽然他自己也很想活下去，但他还是去了。1933年4月22日上午七时，匡互生于上海东南医院辞世，年仅43岁。

几天后，立达学园包裹在一片白花黑纱之中，哀乐低沉，呜咽声声，全校师生回想起匡先生为办学所付出的辛苦心血以至生命；回想起他平日的慈祥 and 忠诚，悲痛难禁，哀伤不已。同学们声泪俱下：“匡先生是为我们才死的啊！”在吊唁的人流中，除了先生的生前友好、师生、同志外，学校附近的居民、农人、小贩、黄包车夫、铁路工人，也纷纷前来默默哀悼、敬礼。

今天，知道“匡互生”这个名字的人剩不下几个了。但是，象匡互生这样埋头苦干、舍身取义的人，过去有，现在在，将来还会有。因为国家和人民永远需要这样的人。

（责任编辑：卢弘）

淞沪抗战前后

● 温济泽

今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 60 周年。

日本侵略者阴谋策划

日本侵略者在 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就在上海组织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撕毁抗日标语，殴打中国公民，多次进行挑衅。11 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又密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陆军辅助武官兼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给他 2 万日元活动费，叫他制造事端，为进攻上海提供借口。

田中通过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进行了具体策划。他们选定工人抗日情绪激昂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肇事地点，暗中唆使 5 个日本和尚，在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到工厂门口找工人义勇军寻衅。在义勇军追住和尚进行查问时，突然有一群由日本浪人扮成中国工人模样的打手冲到义勇军当中，挥拳猛打，用石块狠砸，一个和尚被打死，一个和尚受重伤，其余和尚与打手在混乱中逃跑，事后就嫁祸于毛巾厂工人，说日本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打死打伤的。这个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就成了“一·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指使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并游行示威，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采取强硬手段”，为武装侵略上海制造舆论。

国民党政府谋求妥协

1 月 21 日，日本领事村井仓松一口咬定日本和尚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工人打死打伤的，蛮横地向上海市政府提出 4 项无理要求：要上海市长向日方道歉；逮捕惩办“加害者”；对“被害者”给予抚恤金和医药费；取缔一切排日活动，解散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第 2 天，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津幸一又发出恫吓性声明，声称对 4 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就要采取“适当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向上海增派军舰和陆战队。到“一·二八”前夕，日本在上海的军舰由平时的一二艘增加到 24 艘，陆战队从六七百人增加到两千多人，还增派飞机约 40 架，铁甲车 10 多辆。27 日，日本领事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威胁说，限 28 日 18 时以前答复所提要求，否则就采取“必要手段”。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节节退让，在日僧事件后，国民党政府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采取缓和态度”，“万不能发生冲突”。吴铁城卑躬屈膝地向日本领事“深表歉疚”。并拘捕了三友实业社 3 名无辜的工人。在接到日方通牒后，又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并正式复文给日本领事，表示完全接受 4 项无理要求。对这样的答复，日本领事也无话可说。

当晚，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毕露。20 点 30 分，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津幸一又蛮横地发表声明，说什么

为维持“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撤除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声明文本在 23 时 25 分送达上海市公安局，5 分钟以后就向闸北发动进攻。

“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十九路军准备抵抗

十九路军是在 1931 年 11 月从“剿共”前线调驻上海的。他们深受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工农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的影响。当时，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部抗日，全国正在开展“抗日援马”运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激于爱国义愤，召集旅长以上将领开会，商讨组织志愿兵赴东北抗日。在全军各级将领支持下，从自愿报名的官兵中，挑选了约 6000 人，组成“西南国民义勇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准备第二年 2 月北上抗日。在积极准备出发时，突然得到日军准备进攻上海的情报，蔡廷锴等从 1 月 15 日起即紧急进行应战部署。1 月 23 日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讨论应战措施。全体一致表示决心保卫上海。蔡廷锴在会上讲了对日作战的战术，他指出，上海地面辽阔，要学习红军的战术，避开敌人的铁甲车、飞机和大炮，以各连为单位各自机动作战。当天晚上，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密令全军：“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进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还同蒋光

甬、蔡廷锴、戴戟一起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其中说：“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号召全体官兵坚决抵抗日军进犯。

在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之时，蒋介石接二连三电令十九路军驻闽北部队撤退到南翔。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到上海阻挠备战，被蔡廷锴严辞拒绝。蒋介石1月27日又强行派中央宪兵第六团到上海接替十九路军防务。当夜何应钦发出了3次火急电报，要十九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蔡廷锴一面不得不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防务，一面命令部队，在未移交前，如日军胆敢进犯，仍要迎头痛击。何应钦限十九路军在28日18时移交完毕，但宪兵第六团先遣部队一个营到17时左右才到上海，还没有交防，日军于23时30分即突然向十九路军阵地进攻。淞沪抗战即由此爆发。

气吞倭寇 血溅沪野

淞沪抗战，从1932年1月28日夜开始，到3月6日十九路军发出停战布告之日为止，历时38天。

日军发动侵略之初，盐泽幸一曾发狂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事实远出乎他的意料。在盐泽指挥下，日军分三路进犯，以铁甲车为前导，企图以猛烈的枪炮，迅速占领我闸北全境，把日本的势力范围从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扩展到整个闸北。当时我国在闸北担任防务的是十九路军的一个团。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时，全团爱国官兵已有准备，立即奋起抵抗。敌军多次发动猛攻，都被打退。到2月5日，战事持续了五六天，仍无“进展”。日军屡攻屡败，盐泽幸一被撤职回国。

2月6日，日本派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盐泽指挥作战。野村决定重点进攻吴淞、江湾，同时包抄闸北十九路军后方。野村集海、陆、空主力在7日发动进攻，限令24小时内攻占吴淞要塞。但血战数日，吴淞要塞岿然不动。此时，第五军爱国官兵在军长张治中率领下，开到上海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齐心协力奋勇抗击下，日军多次进攻终未得逞。

野村进攻一再失利，也被免职。日本政府又大量增兵，并派植田谦吉中

将接替野村。植田于13日到达上海。他的作战计划是实施“中央突破”，就是从闸北到吴淞全线进攻，以分散牵制我军兵力，其主力则集中于江湾、庙行两处。日军猛烈进攻，我军英勇迎战，战况激烈。江湾镇一带几成一片焦土，尸横遍野，河水都呈红色。在我军顽强抵抗下，敌军进展缓慢，仍被阻在沿海狭窄地带。植田因屡遭失败，又因其旗舰被我国抗日敢死队潜水炸伤，引起国内震动而下台。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解决上海战争，又增派陆军两个精锐师团和一批海军飞机参战，并任命白川义则大将为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在2月29日到达上海。这时，日本在上海的军队已达7万人，飞机200多架。白川了解双方兵力部署后，决定把正面进攻改为侧击，袭击我兵力薄弱的浏河阵地，然后包抄我军。此时，我军只有4万人，战线很长，浏河一带，我官军只有第五军的一个营和义勇军100多人，兵力十分单薄。在前线兵力严重不足的形势下，各界人士和国民党内不少军政要人不断呼吁蒋介石火速派兵增援，但蒋介石不增一兵一弹。3月1日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我军全线投入战斗，肉搏奋战，伤亡甚大。终因敌众我寡，无兵增援，正面和侧面阵地已有几处被突破，我军不得已于3月1日夜全线后撤。国联宣布3月3日召开会议讨论中日战事，白川于3月3日发表所谓停战声明，十九路军也于3月6日发出停战布告。至此，中日淞沪战争基本结束。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以血肉之躯英勇苦战了一个多月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统计，我军伤亡失踪官兵总数为14801人。为悼念淞沪抗日阵亡将士，5月28日，上海各界数万人举行了悲壮肃穆的追悼会，会场四周，遍悬挽联，贴在大门口的一联是：“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

同仇敌忾 热烈支援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立即发出“把民众武装起

来”、“上前线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等有力号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等，还有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都强烈呼吁各界同胞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代表300万市民发表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武力抗日到底”。

上海人民组织的义勇军，纷纷向十九路军要求参战。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义勇军（简称“民反”义勇军），有2000多人，多数是工人，也有学生和市民。他们编成运输、施工、担架、救护、募捐、宣传、慰劳许多队，在闸北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隔壁设立了前方办事处，随时接受各种紧急任务。有一次，前方修筑工事，急需大量麻袋，前方办事处火速组织人员发动筹集，不到一天，整卡车整卡车的麻袋及时送到前线，解决了燃眉之急。向前线运送枪弹、粮食、蔬菜等任务，也大半是他们完成的。还有一支1000多人的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他们训练有素，敢打敢冲，直接在前线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加上复旦学义勇军、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等，外地来的南京中央大学铁血军团、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等，以及归国华侨义勇军。各种义勇军总人数达5000多人，他们在十九路军的统一指挥下，在战场和后方各尽其力，在保卫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淞沪抗战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地方政权陷于瘫痪。动员和组织人民支援抗战的工作，由临时成立的以史量才、黄炎培等为首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由50多个民众团体发起成立的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他们除组织人力支援外，还为前线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现金。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妇女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等也都开展了募捐活动，其发动面之广，人民热情之高，可说是史无前例。据统计，在淞沪抗战期间全国民众捐款总数达700多万元，还有大量的食品、日用品、医药用品、军用物资等。国民党政府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整整8个月未发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欠饷达600万元，而军饷开支和衣食供给全靠民众捐助来维持。宋

庆龄、何香凝等到前线劳军后，在《申报》上登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界民众积极募捐赶制，5天之内，十九路军就收到全新的棉衣30000多套，棉被2000多条。有些衣服还绣上激动人心的口号和诗句。其中有：“须知亡国即亡家，十九路军威最佳，头可断兮心不屈，拼将热血救中华。”“大好河山似旧否？须将武力洗前羞，挥戈逐日同心力，不灭倭奴誓不休。”正如蔡廷锴所说：“这回战争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民众的”，“唯民众的力量才是伟大的”。

又一个辱国协定 又一次抗日浪潮

淞沪停战后，在国联的操纵下，在英、美、法、意等国代表的所谓“调停”下，中、日代表经过多次会谈，于5月5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这是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协定规定我国正规军队不得调驻上海市区，把上海变成了一个不能设防的城市，这显然使我国丧失了在上海领土的自主权。相反，协定却明文规定日本可以在上海驻兵。而且对其驻公共租界的海军陆战队，没有数量上的限制，这就为日军今后侵略上海大开方便之门。这正如当时一家报纸评论所说：“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惨遭炮火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参加这次停战谈判的中国首席代表是外交次长郭泰祺，他在5月4日接见抗日团体代表时被打伤，住进了宏恩医院，是工作人员把协定送到医院时让他签字的。参加谈判的日本首席代表是驻中国公使重光葵，他被朝鲜爱国义士尹奉吉炸掉了一条腿，住进了福民医院，也是工作人员把协定送到医院时让他签字的。重光葵被炸是在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即天长节那一天。当时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纪念大会和阅兵典礼，以庆祝他们的所谓胜利。朝鲜爱国义士尹奉吉身藏手榴弹和手枪潜入会场，机智英勇地执行了暗杀任务。主席台上的日本军政要人无一幸免，除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外，策划侵略上海战争的头目白川义则受重伤后死亡，野村吉三郎被炸掉一只眼睛，植田谦吉

被炸掉一只脚。这反映了中朝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十九路军撤出闸北之后，国民党闸北保卫团马上就出来镇压抗日运动。他们在慌忙逃走以前，包围了“民反”义勇军前方办事处，当场绑架了“民反”义勇军主席韩白涛、组织部长傅维玉和交通员小白，在附近广场就地枪杀。韩白涛（现名韩进）未被子弹打中要害，后被抢救脱险，今尚健在。傅维玉和小白当场牺牲。3月2日，“民反”义勇军在闸北一个广场召开战区市民大会，国民党保卫团又赶来镇压，开枪打死正在演说的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孙小保，逮捕20多人。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又掀起一次抗日的浪潮。几十个民众抗日团体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该会在成立宣言中严正谴责国民党政府，“于十九路军英勇兄弟血迹未干、东北义勇军勇挫敌人之际，公然出卖淞沪，签订停战协定。”宣言庄严提出“誓死反对停战协定”，“组织北上决死团，并募集巨款以实力、经济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压迫反日、反帝运动”等项主张，号召全上海民众共同起来作坚决的斗争。上海市民联成立后，即积极筹备召开了上海各界民众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追悼东北淞沪抗日死难烈士大会，并开展了募捐、抵制日货等活动。

6月间，又由上海市民联等几十个民众抗日团体联合召开会议，成立了江苏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定于7月召开江苏省代表大会，8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7月17日，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在上海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又名共舞台大戏院）召开。到会的有上海、南京、无锡、南通、崇明等各地代表100多人。9时许，大批武装警察将会场包围。除少数代表越墙跑脱外，当场被捕88人。他们经上海市公安局和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初审后，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审讯过程中，又有7人在上海被捕，全案共95人。在那“爱国有罪”的黑暗年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肖万才、曹顺标（曹仁飏）等13人被判死

刑，于10月1日晨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其余70人被判徒刑，其中26人被判10年到无期徒刑，大多数被判徒刑6年，有个13岁的童工被判3年。从“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全国抗日运动到此被暂时镇压下去。这次巨大的牺牲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领导有关，但是当时的群众抗日运动，特别是这些英勇殉难的同志仍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淞沪抗战失败了，抗日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但是历史仍在前进。此后，经过1933年的热河抗战，同年十九路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的西安事变，终于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由局部抗战走上了全面抗战。

（编者注：本文作者是“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上海市民联和江苏省及全国民联筹备处青年部部长。）

（责任编辑：卢弘）

大型普及性新闻知识综合月刊

中国记者

新华社主办，征求
1992年订户

“文字摄影并重、国内国际并重”是她的特色。普及性、知识性、可读性是她的追求。广大的新闻爱好者是她的朋友。

本刊代号：82—23。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北京新华社《中国记者》发行组代办邮购。邮政编码：100803。订价每册1.95元。

欢迎征订

秦城监狱的 6601号犯人

●师哲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

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开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说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

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河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河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蔫，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狽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

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秘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

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明：“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可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侯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

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111)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

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们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

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一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

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已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属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

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统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的。

1954——1955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

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会见了，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

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己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 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

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

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个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祟祟，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祟祟”，而应说“崇崇”。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听得，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了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

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肯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城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

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 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

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

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四、“张锡侔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

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手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十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 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理！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责任编辑：方实）

中国空军空袭日本

●徐伟剑

召日本人民反战,显示中华国威的传单,撒遍了九州半岛。

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国军人第一次空袭日本本土!

烈士壮怀,跨海东征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全面进攻中国大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决心誓死抗击。野兽一般的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本空军仗其雄厚实力,无视国际公法,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对中国后方和平居民狂轰滥炸,甚至有目的地破坏教育设施,袭击医院伤员,追炸旅客列车……种种暴行,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愤慨,中国空军将士纷纷请缨,要求轰炸日本本土,决死迎战,以雪国耻。

1938年3月3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决定采取非常军事行动,派遣空军奔袭日本本土。这是蒋介石侍从室内极其机要和周密的行动,是蒋介石与高级幕僚共同磋商的一次军事行动。对此行动方案,在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中间曾引起争议。有人主张,实弹轰炸,以血还血;有的则主张,中华本为礼仪之邦,攻心为上,散发传单以唤醒日本民众实为上策……而宋美龄是最坚决主张后一种意见的人。最后决定,此次行动主要任务是在敌境内散发传单、小册子,以唤起日本民众的觉悟,使之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反战宣传品由大本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撰写并翻译,远征之具体策划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杜立特少将,已随着广岛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载入史册。但在之前,中国国民党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且饶有趣味的无声空袭却鲜为人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刊登闻名全世界的12个飞行员的大幅照片,其中之一,便是这次跨海东征的中国空军队长徐焕升。

中国军队来“轰炸”了

1938年5月20日凌晨2时40分,这本来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中国大地血雨腥风,日本本土则风平浪静。夜幕笼罩下的日本重要城市长崎正酣睡之中,天上月明星稀,街道灯火如旧,再过2个小时,将又是一个忙碌的黎明……

藤泽家的太郎只有12岁,半夜里饿醒过来,父亲当兵到中国打仗去了,母亲白天到兵工厂干活,夜里还得出去打工,挣钱养活太郎和两个妹妹,一家人经常吃不饱。太郎看了看熟睡的妹妹,穿衣起来,轻轻地拉开门,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突然,天上纷纷扬扬地落下“雪花”来,“雪花”飘摇,落在邻家的房顶上,闪动在街道路灯的光影中,散在自家的庭院里……奇怪,是夏天嘛,怎么下雪了?太郎揉了揉眼睛,不,不是雪花,是纸片!太郎好奇地捡起落在脚边的一张纸,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发现上面用日文印着这些文字: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告日本国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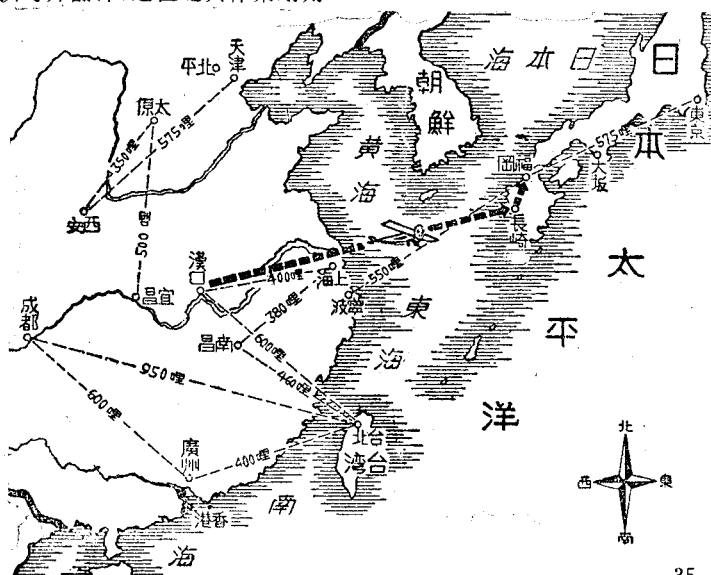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

“哦,中国!中国军队来轰炸了!妈妈,妈妈,快躲起来,中国军队来了!妈妈——”太郎疯一般地跑上大街,他那焦急惊恐的哭喊声,在这安详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地响亮。

是的,中国军队来“轰炸”了,但用的不是炸弹。不是炸弹,却胜似炸弹!

英勇的中国空军,如神兵天降般地把近百万份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

我空军渡海长征图



由空军具体拟定。

这次东征，落在了蒋介石侍从武官、空军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和其他5名战士身上。徐焕升，江苏崇明人，黄埔八期生，毕业后考入中央舰校，后又赴德国深造，曾担任蒋氏座机驾驶员。他身材魁伟，英俊威武，宽厚谦和，具有绅士风度配以绝对服从命令和过硬的飞行技术，深得蒋氏夫妇的信赖。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的指令下达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经过审慎的谋划，向蒋介石转达了他亲赴日本完成这次非凡任务的要求，并面陈具体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这是中国空军首次长途奔袭敌国本土。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空军健儿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和周密的准备，蒋介石曾多次接见参战队员嘉勉训示，并指示前线丽水机场加紧修建，同时一切地勤工作紧张而按部就班地全面展开，地空诸项通信设备一一更新完善。为了做到绝对保密，参战队员不能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透露实情。但是，他们周围的人们，还是从他们庄严郑重，压抑着满腔激情的脸上，看出了这次任务的神圣，从他们一丝不苟，近乎苛刻的训练中，看出了这次出征的非同寻常。出征时间因天气不佳而一再推迟，使这次使命披上了一层层神秘色彩……

出征的日子终于盼到了，5月19日，空军总部下达了远征的命令。下午3时23分，中国空军仅有的两架“马丁”式重型轰炸机1403号和1404号，满载着大批反战传单，满载着中国人民的义愤和智勇，满载着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从汉口起飞了。2小时后，飞机在浙江丽水机场降落，进行最后的检修，并再一次补充燃料，当天夜里23时30分，徐焕升向最高统帅部拍电：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各誓以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烈士壮怀，字字千钧。

在发动机的怒吼声中，两只战鹰腾空而起，直扑扶桑列岛。

0时12分，飞机的轰响惊动了停泊在浙江定海海面的五艘日军军舰，

日舰即用探照灯向空中扫巡搜索，幸飞机在高空云层中，未被发现。当时，我国空军力量薄弱，既无雷达，也无定向仪，夜航只能靠星座定向。1小时后，地面收到空中报告：云太高，依月光飞行。1个半小时后又接到报告，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大本营内翘首以待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经过近2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到达日本上空，徐焕升庄严下令：准备投弹，放！

百万张传单无声地向日本大地倾泻下去，其中除了《告日本国民书》外，还有给日本军阀的训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变为百吨炸弹矣。尔其戒之！我空军长征，系应全民及中日反侵略大同盟之要求，使知吾中国空军之威力，随时可以粉碎三岛。倘再执迷不悟，则中国空军之炸弹，迟早下定须在倭国爆发之决心也。”有《告日本工人书》，“……紧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狂妄的日本军队，把自己看作亚细亚主人，根本就没想到仅有不足3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在国内战事屡屡失利的情况下，竟能空袭日本本土。因此，在日本的各大城市，既没有实行战时灯火管制，也没有派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巡戒。中国空军随后飞往福冈、佐世保、长崎、左贺、久留米，在九州半岛北部绕了一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之后高速返航，飞向祖国的怀抱。这时，恍然惊醒过来的日本防空部队才慌忙拉响防空警报，发射高射炮，但一切都晚了，一切都结束了。

5月20日早上，两驾绿色战鹰先后降落于中国玉山机场和南昌机场，长达9个小时的东征至此圆满结束。

举国欢腾，世界震惊……

当中午徐焕升等勇士驾机返回汉口机场时，军乐声，欢呼声，震动天地。摄影记者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拍照；国民政府要员孔祥熙、何应钦等到机场欢迎；中共代表董必武也亲到机场为东征勇士授以锦旗。当天，蒋氏夫妇自在官邸迎候，并设宴慰劳。

国内各大报纸均在头版以大字标题，隆重报导。在上海租界出版的《文汇报》，冲破万难险阻，以《日本首次遭受空袭，中国空军跨海扬威》为题，报导了东征过程和武汉各界群众欢迎英雄归来的盛况，并配发社论《伟大的中国空军》。在汉口出版的《大公报》，依地利之便，派出记者在空军部门彻夜监听，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消息和社论。邹韬奋先生在《抗敌》三日刊上，也发表文章盛赞中国空军之壮举。中共《新华日报》以《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配以热情洋溢的社论。同时，中共代表、八路军代表向空军英雄献旗慰问，徐焕升也给中共的报纸题字留念。

中国空军跨海东征，不仅全国欢腾，也令世界震惊。英国《新闻纪事报》当天以《传单力量，胜于炸弹》为题，认为中国空军的这次行动，意义极为重大，方式亦具特色；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中国伟大》为题，作了报导，同时配以中国空军赴日散发传单和日军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的比较图片，谴责日本之“文明”，预言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苏联报纸也给予了热情的赞许和积极的肯定。

日本政府虽然拼命遮掩事实，但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认：“有华机飞至日本上空……”

这次远征，警告了日本军阀，中国军队有能力袭击日本本土；这次远征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证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目的；证明了在军事上屡屡失利后，中国军队仍具备部分发动进攻的能力。当时正值徐州失守，战事不利，因而这次壮举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激励了全中国同胞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坚定了中国人民还我河山的必胜信念。

徐焕升等英勇的中国空军战士，作为首次袭击日本本土的军人，也已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据蒋介石侍从副官、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居亦侨先生回忆，徐焕升一举成功，从此平步青云，到台湾后升至空军总司令。年老退役请辞后还任台湾“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1984年病逝台北。

（责任编辑：卢弘）

“文革”中 秘密拍摄 传统戏始末

● 齐英才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这脑袋轰的一下就像炸开了。这八九年来，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我吃的苦头还少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八个样板戏唯恐大树特树还不够，搞传统戏，岂不是黑线回

潮，复辟倒退吗？这可是拿政治生命开玩笑呀！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顶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这一晚，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难以入睡。搞传统戏，这是件多么诱人的事啊，我9岁参加夏声戏校，坐科8年，学的是传统戏，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戏剧形象，伴随着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我竭尽全力塑造好每一个艺术形象，认真地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奉献给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

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却因此成了罪人。一条条罪状、一顶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曾发过誓，今后再也不登舞台，再也不演那倒霉的传统戏。可是，剪不断，理还乱，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哼几段熟悉的

传统戏唱腔，会在斗室里拉拉身段，走走台步，我是多么想再重登舞台啊！可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浪潮越来越凶猛。在这个时候，搞传统戏，真是吃了豹子胆。孟波讲的“最高领导”是谁？我不敢妄加猜测。想起我爱人张美娟，春天的时候也曾被召去北京，具体做些什么，她不讲，我也不便问，是否也和搞传统戏有关？这真是难猜的谜。就在胡思乱想中，我迷迷糊糊地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七点多钟，我急忙吃了早点，带上些换洗衣服，便坐车朝机场而去。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要说对京剧传统戏，毛主席也算得上个内行呢，他不但喜欢看，喜欢听，高兴的时候，偶尔也哼上几句。每逢来上海视察，我们上海京剧团的演员和上海戏校京剧班的学生，都要为他演出。他对

京剧艺术的谈话,不但在行,而且高人一筹,使我们这些搞了大半辈子京剧的人都折服三分。现在毛主席提出要看传统戏,就像一道阳光,驱散了压在我心中的重重迷雾,使我感到精神一振,好像吃了颗定心丸。

于会泳布置任务

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文化大革命”前,由于经常随团到北京演出,对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我是非常熟悉的。那平直的街道,金黄色的琉璃瓦,一座座的四合院,都曾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有我尊敬的师长,有我的师兄师弟,也有我的亲朋好友,所以,每次到北京,心情都是亲切而坦然的。可是这次上北京,是劫后余生,又肩负着“特殊使命”,更多的是陌生、紧张、拘谨,因此没有往日那种欢快和轻松。

文化部的陈应时、李金泉在机场迎接,把我们接到西郊的一个招待所安顿下来。第二天,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四人帮”在文化战线上篡党夺权的干将于会泳召见了我们。

召见地点在东单的一个胡同里。这个地方很神秘,大四合院内套着一个小四合院,门口不挂牌子,外人看来搞不清到底是机关还是住家。参加召见的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京剧院,天津市文化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大家都不熟悉,又是在那样的形势下,互相之间没有话,都冷冷地坐在那里。片刻,门开了,于会泳走了进来,他没有同大家寒暄,径直朝沙发里坐下。这个人,我过去并不认识,在京剧团搞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时才有了接触,知道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副主任,因为得到江青的赏识,现在从一个普通的业务人员,一下子跃升到文化部负责人。此人平素不苟言笑,现在身居高位,更是紧绷着脸。他看了看入座的人,清了清喉咙,开始发话:“都来了吗?”陪同的陈应时连忙回答:“都到齐了。”于会泳正色道:“今天把你们找来,是因为中央交办几件事要马上落实。”在座的几位忙掏出本子要记,只见于会泳把手一挥:“不要记录,知道就行了。中央负责同志连续几次找部领导研究对传统戏录音、拍电影,这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有些业务要恢

复,结合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词、曲、音乐独奏,独唱也要拍。”

哦,原来是对传统戏录音、录像、拍电影,我这才知道任务的具体内容。可是这个任务出自于会泳的口中,我却感到不可理解。这个人靠扼杀传统戏,搞样板戏起家的,如今这样做,岂不是自我否定吗?果然,他话锋一转,暗藏杀机地说:“这件事对外要严加保密,特别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要给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也不要使我们的同志产生错觉,不能有错误的片面的看法,不要认为又要开放什么传统剧目了,现代戏不搞了。今年是京剧革命12周年,样板戏10周年,要加强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教育,要抓阶级斗争。”

于会泳后面的这段话,像迎头一盆冰水洗身,顿使我感到如坠冰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要我们搞传统戏,又不让外传,要严加保密;既要拍摄传统剧目,又要注意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真玄哪,搞得不好,不又是黑线回潮,右倾翻案吗?

于会泳召见时的谈话,可谓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现在看来,江青、于会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谈话,反映了当时政治舞台上微妙复杂的形势。于会泳讲话中流露出的色厉内荏,正是江青等处境不妙,内心空虚的一种表现。

1974年的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毛主席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这一系列的讲话和措施,都表明毛主席对江青等在政治上的做法是不满意的,对文艺战线上一花独放的现状,主席也颇有看法,多次做过不利于江青等的讲话和批示。

由于这些原因,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

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最后于会泳交代了各单位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明确上海京剧团就在上海拍摄,并尽快拟定剧目,人员名单上报文化部。

回到招待所,我对孟波说:“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弄得不好,身家性命都得搭进去。”孟波朝我苦笑说:“谁让你干这行的呢,你就大胆地干吧!”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倒在床上,在飞机上时的那股希望和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

剧目和人选

京剧剧目素有唐3千、宋8百之说,一部《京剧剧目初探》就收录了京剧常演的传统戏1千多出,上海又是海派京剧的发祥地,生、旦、净、丑,名家辈出,要选出合适的剧目和人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我搞了几十年的京剧,自上海解放后一直在京剧团工作,对各流派的代表剧目和演员都比较熟悉,又征询其他同志的意见,很快拟定出一份拍摄剧目和人员的名单:

俞振飞的《太白醉写》、《奇双会》(昆剧)。王传淞的《狗洞》(昆剧)。李玉茹的《贵妃醉酒》、《梅龙镇》、《梅妃》。董芷苓的《十八扯》、《红楼二尤》、《姑嫂比剑》。张美娟的《火凤凰》、《虹桥赠珠》、《挡马》、《八仙过海》。李仲林的《闹天官》、《七侠五义》、《紫竹林》。王正屏的《黑旋风李逵》、《嫁妹》、《通天犀》。沈金波的《柳林写状》、《逍遥津》。童祥苓的《桑园会》、《战太平》。汪正华的《失空斩》、《文昭关》。纪玉良的《借东风》。迟世恭的《捉放曹》。言少朋的《让徐州》。王小楼《杀四门》。李炳淑的《凤还巢》。小王桂卿的《四平山》、《雅观楼》。小高雪樵的《狮子楼》、《武松》。张学津的《四进士》、《白蟒台》。计镇华的《弹词》(昆剧)。华文漪、岳美缇的《琴挑》(昆剧)。梁谷音,刘异龙的《思凡、下山》(昆剧)。王芝泉的《盗仙草》。孙花满的《罢宴》。李家藏《卧龙吊孝》。陆柏平的《罗成叫关》、《巡营》。

这些剧目和人选,囊括了上海京、昆剧中最优秀的剧目和代表人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名单报到文化部

后,很快就批了下来。此外,还要上海录七首词曲,时间很紧,要求半年内完成。

参加拍摄的演员需要一个个地去做工作,青年演员比较好说,讲明情况也就答应了。难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演员和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演员,他们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头,听说拍摄传统剧目,没有一个不面带难色。如沈金波同志,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演过少剑波,算得上是个革命文艺战士了,一听说让他拍传统戏,连连摇头说:“老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让我多活几年吧。”俞振飞、李玉茹、童芷苓等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又批,斗了又斗的黑线人物,现在又让他们出来拍传统戏,全都心有余悸,再三推辞。经过我再三说服,才勉强答应下来。

人员确定后,就准备投入拍摄了。时间要求那么紧,一天也耽搁不起,可是摆在面前的困难真是多,首先是没有服装。剧团的传统戏服装,从蟒袍、带、盔、靴、把子,全都卖的卖,烧的烧了。记得靠边的时候,我们这些专攻对象被打发把蟒袍上的金线一根根地拆下来,然后把金粉刮下,送到冶炼厂炼成金子,足足干了一年。现在要把这些服装凑齐,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啊!亏得团里的叶菊笙师傅,踩着自行车,跑遍上海所有的寄售店,寻觅回不少旧戏服装。那时,戏剧服装厂不敢做戏服,非有介绍信才敢接,就这样再加上到处借的借,添置的添置,几经周折才算把各类服装置办齐全。

服装凑齐了,但要拍摄的剧目却都没有剧本。包括音乐、唱腔等文字资料,都在十年动乱中烧的烧,毁的毁了。如今光是演戏倒也好办,戏词全在演员肚子里,各自的拿手好戏,谁不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要拍电影,一定要有文字本,否则无法写分镜头本。于是调了京剧团的编剧陶雄、陈西汀、刘孟德、陈文华等人整理剧本,还调了写得一手好字的淮剧团的张云虎来写字幕,反正当时于会泳有一句话:“你们要调谁就调谁。”这些同志来后,一边回忆,一边请演员们对台词,边记录,边整理,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剧本整理出来了。

紧张而神秘的拍摄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绍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俞振飞老先生年纪大,家里又有些矛盾,于是就干脆住进丽都花园。从浙江调来的王传淞也安排进来与俞老作伴。日程安排基本上是,白天排练和拍摄,任务紧急时,晚上继续干。后来,为了抢进度,白天排练,晚上拍摄,于是,四五个剧目同时进行。地方不够,又选中了美琪电影院、文化广场等新的排练地点。当时这两个演出场所都没有什么业务活动,就关起门来专供我们排练拍摄。这里演员进排练场,电影导演也跟进去熟悉情况,然后就分镜头,一出戏排练完毕,分镜头剧本也同时完稿,接着就投入正式拍摄,真是分秒必争,抓得很紧。

大家没日没夜的奋战,虽然很辛苦,但没有谁敢发牢骚,说怪话。一方面,所拍摄的是自己的艺术精品,如俞老的《太白醉写》、王传淞的《狗洞》等,是他们一生心血浇灌的果实,作为一个演员,能把自己的杰作留在银幕上,永远地保留下去,确实是一件如意的事,就是苦点累点也值得。另外一方面,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扣你一个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战略部署的大帽子,你吃得消吗?所以大家非常谨慎努力,没有叫苦叫累的,就是安排上有不合适或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吱声了。比如李家载主演的《卧龙吊孝》,拍摄好送到上面审查,江青不满意,说是唱得不错,但身段不漂亮。于会泳传达了江青的这个意见。怎么办?这身段又不是一天两天能提高的。结果上面做出决定,唱腔用李家载的,表演让言少朋上,于是重新拍摄言少朋的《吊孝》,

再配上李家载的唱腔。送到上面审查,果然通过了,江青很满意。这件事要是放在今天,不用说两位都是颇有名气的演员,就是一般的演员,也会不高兴。因为按照常规,表演、唱腔应该是一个人,弄个配唱,有损演员的自尊心。当时听说是江青的意见,谁也不敢吭气。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江青等人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何等的猖獗。

按照上面的要求,完成一部送审一部,由飞机直送文化部于会泳,再由于会泳送江青,别人一律不准插手,不得过问。当时上海市委徐景贤等虽然也是“四人帮”的骨干,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做具体指示,只是派秘书张家龙来了解情况,问问有什么困难。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有一次是我送片子去京,江青审查,要我陪看。我边走边说:“这个地毯怎么不出绿呀。”这个“不出绿”,江青说过几次,对另外几部也有这个说法,搞不清楚她对出绿这么关心的原因。江青又说:“灯光怎么不亮呀,看不清楚,我介绍你们看看美国的片子,你们看看人家的色彩,光线多漂亮。”于是马上就放了部美国电影,江青大加称赞。有人向她解释,可能是胶卷的关系,美国电影用的是伊斯曼胶卷。江青傲慢地说:“那你们就用伊斯曼胶卷嘛!”于是从那以后进口了大批的伊斯曼胶卷,专供拍摄传统戏用。

在送审的片子中,江青最满意的是《火凤凰》,认为戏紧凑,开打干净利落,配合默契。可她不知道,演员张美娟等花费了多少心血。那时张美娟已到中年,脱离舞台也有一段时间了,又担任“五·七”京训班的负责人,白天忙于单位工作,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赶来排练,拍摄,累得人躺下就不想起来,可是这是政治任务,第二天咬咬牙又继续干。一次拍《挡马》,在椅子上没站稳,摔了下来,脖子肿得很厉害,可还得坚持拍完。像张美娟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演员们脱离舞台也有十多年了,而传统戏从1964年起,许多演员

就开始不大接触了，现在要拍摄，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基本功，恢复唱、念、做、打，是很不容易的。许多武戏演员一早赶来练功，文戏演员也抓紧吊嗓，忙得不亦乐乎，累得筋疲力尽。正是靠着大家的辛劳，才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拍摄。这其中的辛苦，高高在上的“四人帮”是不会知道的，他们是靠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起家的，样板戏是这样，拍摄传统剧目也是这样。

对俞老的《太白醉写》，江青颇为折服，说：“这个老头演这个戏真不错。”俞老那时六十开外，正值艺术上的顶峰，《醉写》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当然精湛无比；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不能不使江青等感到深沉伟大和无法抗拒。可正是她，手挥大刀，狠命地向中国传统戏曲砍去，说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是大毒草，统统要铲除，在这些优秀的剧目前，江青等应感到羞愧和有罪。

上海送审的片子除个别重拍外，绝大部分都很快通过。

拍摄到此结束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抓紧拍摄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事变。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等被抓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到上海。可是我们这些拍戏的人，整天关在丽都花园里，真可谓两耳不闻园外事，一心只管拍电影，对外界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4日党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我们才仿佛从梦中醒来。丽都花园里乱了套，多数人喜形于色，拍手称快，少数人满腹狐疑，个别的提心吊胆，于是三五成群，闹闹嚷嚷，都丢下了手头的工作。内部乱哄哄，外部的压力如洪水般冲来，附近的居民、单位，甚至派出所都把大字报贴了过来，一时间墙上刷得满满的，连大铁门都封住了，要“揪出黑后台”，要“捣毁‘四人帮’的黑据点”，要“交代阴谋活动的一切”等等。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是有多少张嘴，也说不清楚呀，心绪纷乱万分。好在内部的同志都很通情达理，没有过分为难我，只是要我为他们证明，他们不过是应召而来，没有参与什么



画坛“玄奘”西域行

——记十踏丝路的画家赵以雄、耿玉昆夫妇

●刘东平

1989年深秋，朔风横吹，落叶铺黄。一辆银色的北京BJ222越野吉普车出京城、下郑州、过黄河、跨潼关，直向古都西安飞驰……

车内一对年逾五旬的画家夫妇。手握方向盘的男主人公赵以雄，肤色

黧黑，神情凝重，如同他的画作。他196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75年以来，8出阳关，9踏丝路，几乎走遍了丝绸之路中国境内南北中诸道，并两次赴伊拉克两河流域写生考察。

阴谋活动。我告诉大家，党和人民是讲政策，是实事求是的，事情总会弄清楚，请大家放心，真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决不牵连大家。演员和拍摄人员离去后，只剩下我和少数几位同志。我们不能走，这么多器材，都是国家的财产，扔下不管，还不是国家的损失！我派人把俞老等人送回家，妥善安置后，就坚持在丽都花园，等候上级的指示。不到十天，外部的压力逐渐减小，大字报也没有了，很快，文化局运动领导小组来宣布了拍摄组解散的决定，所有人员各自回单位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器材、物资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回顾这半年多的工作，我们拍摄了20余部传统剧目，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艺术资料，这些资料在“四人

帮”粉碎后，很快派上了用处，中央电视台播放过，许多演员像觅宝似的通过关系翻录成录像带，供自己观摩学习，提高技艺。是啊！中国戏曲是个聚宝盆，里面的财富太多了，要趁着老演员都健在，留下宝贵的艺术资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决定恐怕也有这层意思，可惜的是他离开了我们，看不到了，可是根据他的指示而进行的拍摄工作，确实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艺术精品，我想，曾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也许和我一样，会为此感到欣慰吧。

(王诗昌整理) (责任编辑:张晋)

都在 40℃ 左右, 强日光照射下, 石头上能烙熟面饼, 沙子里也能烙熟鸡蛋。那座海拔 500 米高, 东西长 100 公里的火焰山呢, 山上皆是红褐色的沙岩, 看上去简直像一团团烈焰在升腾。神话小说《西游记》曾描绘这山: “那八百里火焰烧得唐僧却步不前”, “火头飞有千丈之高”。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也为此留下了“火山五月火云厚, 飞鸟千里不敢来”的诗句。

赵以雄、耿玉昆二人白天背上水壶、画板在火焰山麓作画, 常常是汗水在皮肤上凝成了一层白霜, 塑料凉鞋也被烤得几乎要熔化。

有一天傍晚, 残阳如血, 火焰山的折皱变得殷红, 如火山喷发出的岩浆, 又像即将凝固的铁水。这种极具艺术夸张的景象, 令两位艺术家激动不已, 事后根据印象的回忆, 赵以雄很快画出了油画佳作《火焰山》。

这幅画, 山前点以烽燧高车, 使火山更巍峨。远山和天空渲染以金色, 富有神话气氛。站在这幅画前, 会让人为大自然的雄浑恢宏而荡气回肠。

夜幕降临后, 画家夫妇便借宿山下阿斯塔那古墓看守人的小屋。墓地里刚刚出土了几具唐代女尸, 还未及运走, 两个活人只好委屈在角落, 与枯干的女尸同室而眠。夜深了, 室外一团漆黑, 不时有点绿森森的磷火閃閃, 像是为几百年前的女主人鸣冤招魂, 好不让人。而两位过度疲倦的画家却不及多虑, 酣然睡去, 一觉天明。事后耿玉昆谈起此事, 才感到有几分余悸。

绕行“死亡之海”的回忆

从库尔勒驶出, 赵以雄熟练地驾驶着 BJ222 吉普车, 一路西下, 直抵新疆最西端的明珠——喀什。

喀什, 不仅是中西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还是中国境内丝路的南、北、中三条道的分支点。赵以雄清晰地记得, 1978 年第 2 次踏访丝路时, 他们就先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丝路中道行至喀什(与这次路线相同), 然后再以此为转折, 沿塔克拉玛干南缘的丝路南道考察, 最终完成了环绕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一周的旅行。

那年, 他们从喀什调头东南, 一路经过莎车、叶城、和田, 来到了地图上

塔克拉玛干最南缘的一个小黑点——民丰。

民丰县的确小得像颗芝麻。仅有的一条街上, 在这头儿喊一声, 那头儿便可应答。据考证, 它在西汉时为精绝国属地。由县城深入沙漠几十公里的尼雅河畔, 便可找到当年精绝国的尼雅古城遗址。

这样重要的丝路遗址怎能放过, 赵以雄夫妇便利用去且末前的候车时间, 搭乘拖拉机进漠寻古了。

一入沙漠腹地, 便是满眼流沙, 孤寂的生命仿佛随时随地被这片单调的黄色榨干似的。突然, 有一片胡杨林闯入眼帘, 顿时使人人为之一振。那萎缩的枝条像魔鬼的手臂, 横七竖八地交错, 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 人称“魔鬼林”。

那片被淹没在沙海之中的古城, 也留下了许多胡杨枝条编结的围栏和倒塌的木柱、木梁。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农具、食物、丝绸物、木简等等, 其中有一块蓝色的蜡染棉布, 左下角绘一半裸鬼子母像, 右画人、龙、狮, 是东汉时期佛教艺术图案珍品。赵以雄曾以这图案为依据, 创作了《尼雅蜡染》。为此, 画家夫妇也饱尝了沙途之险和宿夜荒漠的彻骨之寒。

携他们去的 3 辆拖拉机, 回来时, 只剩下了一个车头, 其余全都身陷沙海, 难以拔脱。只有干等着“天兵天将”前去搭救了。

从尼雅遗址返回民丰, 赵以雄夫妇便执意要往且末。许多知情人好言相劝, 莫再向东行了。民丰和且末之间根本不通路, 连地图上也只能用一条虚线相连接。你们要走, 不被那凶恶的沙魔吞噬才怪! 要么, 你们干脆从和田搭乘飞机回乌鲁木齐吧。两位画家丝毫未被好心规劝所动摇, 他们早已认定, 东面的且末是古丝绸南道必经之地, 途中也有古迹踪可寻, 作为真心实意来探寻丝路奥秘的艺术家, 怎能弃难而逃呢。再说, 当年古人能凭借着几匹骆驼走过来, 我们有现代交通工具却为何不敢走呢? 一定要走!

民丰县政府的办事人员为两位艺术家的胆量和献身精神感动, 遂选派了两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和一辆吉普车送他们前行。

这真是一段奇特的路。时断时续, 时有时无。有的地方则是用砖铺、石

堆, 或芦苇搭、红柳枝垫出来的路。有时走着走着会突然末路穷途。原来一把大火之后, 枝条化为灰烬, “路”也就没了。还有一段路, 全是沙窝子, 汽车轮子一陷进去, 光空转, 不动窝, 真像水牛陷进井里, 有劲也使不上。他们只得下车边挖沙边垫树枝, 车子才得以爬出沙窝, 一步步艰难地缓缓移动。

就这样, 他们在沙陷和饥渴的胁迫下跋涉了一整天, 直到掌灯时分, 才“爬”进了且末县城。

“从沙漠西面的民丰来了几位客人!”招待所里立即爆出了头号新闻。一传十, 十传百, 不大功夫, 全城的人都知晓了。因为多少年来, 走这条以“虚线”标明的路上, 能走过来的人是极罕见的。

第二天, 当赵、耿二人来到街市买馈赠物时, 这两位“天外来客”立即被当地人认了出来, 大家围拢来问长问短, 并竖起大拇指!

饱经风霜的北京 BJ222 吉普由喀什西行, 穿过疏附县城, 即向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疾驰。

古老神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帕米尔高原, 此时两位画家对它既期盼, 又焦虑。因为这里将是他们出境前最后一座山峰了。巴基斯坦旅游局人员将在红其拉甫山口迎接他们。而眼下, 接应的日期一天天逼近, 他们却处于人疲马乏的艰难境地, 要通过这海拔近 5000 米, 历来被称作丝路险道的高原, 谈何容易! 又不知有怎样艰险在等待他们呢?

古代, 那些到印度去的“求法高僧”以及印度来中国传道的和尚都曾走过此道, 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用不少笔墨形容葱岭道路之险, 并且记载了一段耸人听闻的轶事: 即有一支万人以上的商队, 在葱岭上遭遇风雪, 因而全队人畜覆没于此。由此可见, 帕米尔高原的风险之多,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这命丧黄泉。

而此时正在险途驾驭的赵以雄却显得沉着若定, 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如期赶到红其拉甫山口, 哪怕是铤而走险也要开上去!

雄姿万千的公格尔峰就在眼前了, 吉普车停在一处兵站休息, 岂料赵以雄、耿玉昆刚一下车就好像中了煤气一样, 头晕、心慌、胸闷, 气喘接踵而来, 原来这是高山反应。据兵站的人

告之,这里已是海拔4000米以上了。

但眼前的奇异景观,又使他们忘记了身体的不适,连连按动照像机的快门。

那浑身缟素,璀璨晶莹的公格尔峰宛若天仙少女,从隐现的云纱雾幕之中,露出了迷人的身姿。沿着她裙衫下摆垂挂下来的道道冰川,好像舞女的长袖,袅袅飘动,这蔚为奇观的庞大冰山银瀑令人目眩神往!

吉普车像一头气喘吁吁的黄牛,继续一步一喘地向上挪动。海拔逐渐升高,气温骤然下降,加上冰封雪冻,行车愈发艰难了。

每次给车加水,水还未加完就已结成了大冰砣。在海拔4500米处的一个山口前,油门怎么也踩不起来了。“是没油了吗?”油箱显示还是满的。什么原因呢?当他们打开油箱一看,原来油下面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连敲带砸,终于把冰搬了家。车子这才得以蜗牛似地继续向上爬。

终于爬上了距离边境30公里处的海关所在地。他们急忙下车去办理出境手续。

“你们是画家?”“自己驾车从北京开到这儿?”“去探访西域的波斯?(今伊朗)。”一双双惊异的眼睛望着他们,有的惊羨敬佩,有的不可思议。

一切手续办妥,边关人员用叮咛和祝福声,送他们向出境前的最后一个边防哨卡挺进。

离巴方规定的时间仅距几个小时,红其拉甫最后一个中国哨位也近在咫尺。赵以雄夫妇不顾缺氧和高山反应,在颠簸高寒的路上向前挣扎,好象随时随刻都会车散人瘫似的。

守卫着国门的年轻班长从哨位上下来,认真查验两位画家的身份证明和过境手续。本来这道仪式之后,赵以雄他们就可以长舒一口气,恭候巴方来人。谁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班长用严厉的声调说:“出境的手续中,你们少盖了一个章,下去重盖吧。”

“重盖!”这声音如同巨雷轰顶。他们没有氧气袋,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三颠地把车子开上来的,如若走回头路,车、人都难保有去无回!再说,接应时间已到了。这30公里的往返,少说等于内地的100公里,万一错过了接应时间,岂不是万仞之功,亏于一

策吗?

代表着国威军威的年轻班长一丝不苟,无论画家怎样解释,他依然不能在自己手下放过一个出境手续不全的人。赵以雄、耿玉昆自知执拗不过令行禁止的军人,只好搭乘一辆巴基斯坦方面的汽车下山补盖公章去了。

此时,他们才突觉一阵阵气虚、心慌,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刚才被紧张抑制的高山反应现在又乘虚肆虐起来。

待补齐公章,重返哨位时,小班长才向画家夫妇挑明,刚才你们搭乘的巴基斯坦汽车就是来接应的。原来你们是相见不相识呵。

赵以雄这才想起,由于一路心绪焦急,语言又不通,竟不顾及同巴方人员打招呼。这会儿,两国人员的手才紧紧握在了一起。赵以雄、耿玉昆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他们日夜兼程7000多公里,在一个月期限内走完了丝绸之路的中国一段,就要从红其拉甫山口出境了。

穿越卢特大沙漠

出境后先经巴基斯坦,赵以雄和耿玉昆一路走访了伊斯兰堡、卡拉奇、基达、白沙丸等几座名城,之后入伊朗。

伊朗是一个有四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传到这里。此后,丝绸之路就像一条纽带,不断维系,促进着中、伊两国的友谊。今天,两位中国画家又摹仿先驱的足迹,肩负友好使命,千里迢迢踏寻丝路而来。

伊朗的地形非常奇特,它像一个巨大的碗,四周围绕着连绵的高山链,而中央则是3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盆地,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荒漠沙原。

赵以雄夫妇从拉黑丹经克尔曼到设拉子,即要穿行长1000多公里的卢特大沙漠。

克尔曼是建在沙漠中的一个小城。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来此之前,已是波斯湾、霍腊散和中亚商人汇聚的一个贸易中心,出产马具、盔甲和绿松石珍宝。

当赵以雄夫妇的吉普车开进克尔曼时,沙漠风暴突袭而来,刹那间天旋

地转,沙飞石走,浩瀚的沙漠像暴怒的大海,连波翻涌起凶恶的沙浪。车厢被风沙吹得东摇西晃,随时都有掀翻的可能。人简直难以呼吸。稍一喘气,鼻嘴立即会涌灌沙土。这样恶劣的气候,连路都难以辨清,更无法去找住宿地了,只好把车停靠在几辆大客车之间的避风处,在车上凑合一夜。

后半夜,风鸣渐渐减弱,最后停息下来。四周回复了寂静,静得让人心悸。耿玉昆再也睡不着了,撩起窗帘向外探望。

呵!一些房舍已在突至的沙暴洗劫中倒塌,有的被流沙掩埋到了窗户上。再定神一看,不好!四周的“挡风墙”——几辆大汽车早就悄然“起锚”,开得无影无踪了。莽莽荒原之上,只有这像一片孤叶般的北京吉普车滞留在此地,若再有风暴袭来,怎逃得过这恐怖的灭顶之灾呢。

“不行,赶快发动车。闯出卢特大沙漠!”赵以雄和耿玉昆当机立断。

凌晨3时,天上的星星为他们掌灯,北京BJ222吉普开足了马力,野马似飞速奔驰,车后留下一溜黄尘。

天渐渐亮起来,沙漠的尽处跃出了血红的圆轮,它颤抖,上升,用奔涌的血色渲染了天际。

沙漠的黎明如此动人,因为那是又一次把死亡甩在了后头,又一次使生命和灵魂得以升华。

车继续在沙海中驰骋,一幕幕奇特的沙漠景观,就像一位演奏家,为他们孤寂的旅程奏响一曲曲精彩的乐章……

天空湛蓝透明,镶嵌着几朵玫瑰色的云霞,远处的山岩色彩斑斓,一层殷红,一层赭石,一层墨绿,一层暗紫;赵以雄、耿玉昆不禁百般惊叹:大自然的调色师竟如此鬼斧神功!

那天,赵以雄一口气行车19个小时,飞越穿行了700多公里的沙漠地带,又创下了他行车的新纪录。

当赵以雄夫妇的吉普车驶出伊朗名城扎格罗斯山南麓的设拉子后,前面后路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

忽而,耿玉昆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呼喊起来:“以雄,你看那边!”赵以雄侧头看去,也不禁惊异地喊出声来。只见一般强劲的旋风从一处山口奔突而出,瞬息又变成一个巨大的宝塔形土柱,旋转上升,滚卷游移!那地面上的

物体被土柱吸附上天空,然后又被重重地抛下来。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土柱”有规律地间隔而出,疯狂地旋动着……

“这是龙卷风!”赵以雄惊诧地断定。耿玉昆也恍然大悟,再没有观赏奇异景色那般轻松愉悦了。

赵以雄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司机了。他沉着地观察了一段时间,便稳操方向盘,趁前面的风柱刚减弱,后面的风柱还未形成的间隙,加大马力,一口气冲过山口,把那肆虐的龙卷风甩在了后头。

抵达丝路终点

顺底格里斯河南下,过伊拉克古都巴格达,赵以雄夫妇便驾车驶向丝绸之路的终点——伊斯坦布尔。

位于土耳其西端的伊斯坦布尔,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界,截分为东西两半,一半属欧洲,一半归亚洲。2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就运抵这里,再由此集散至欧洲大陆。

北京 BJ222 吉普车英姿勃发地驶过伊斯坦布尔古老曲折的街衢,穿越笔直坦荡的土耳其大道,径直开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这是中国吉普车首次从亚洲东端的渤海之滨驶至亚洲西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为中国画家首次完成丝绸之路全程旅行建下了奇功!

当载着两位中国画家的吉普车驶向大桥中段白色的欧、亚两洲分界线时,赵以雄和耿玉昆激动不已。回眸东望:呵,那边就是他们历时8个月,行程2万公里,跨越6个时区,穿越的地球上最大的陆地;那边就是绵延万里,极东西方文明贯通、融汇的漫漫丝绸古道……

(责任编辑:穆图)

〔来函照登〕

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

师秋朗

编者按:师秋朗同志是本刊第5期所刊师哲同志《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的执笔者。她对于本刊未经作者同意,删除了稿中若干重要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诚恳接受作者的批评。本期我们还发表了对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一文的意见和补正,前此还发表过关于《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一文的来信,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来共同关心和监督、改进本刊的编辑工作。

本刊主要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作品,而历史是不容掩盖、歪曲和伪造的。有关的作品作者可以各抒己见,做到文责自负,编者也有责任使作品从内容到文字上更臻完善。

为尊重作者意见,我们将师秋朗同志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将信中所说的删去部分补登于后。

编辑同志:

贵刊创刊时间不长,办得生气勃勃,内容丰富,很愿读,也愿供稿。

但1992年3月第5期上所刊家父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的处理,却令人不快。现受家父之托,致函贵刊。

《我所知道的康生》原文25000字,你们未经作者同意即大量删节,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

所删部分又恰好是康生最丑恶、作用最坏的部分。要说康生的骨灰从革命公墓被扔出去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还会有人替他掩饰、包庇,我看倒不至于,但认识问题要澄清。为此,我们要谈谈写此文的意思:

第一、过去对历史和历史人物随心所欲地编造,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因而,我们只想留下历史的真实。

第二、康生这个人,并非偶然现象或个别产物,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东西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毫不奇怪。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康生”到处都有,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就是了。

第三、把康生曝光,正是为了使广大善良的人吸取教训,擦亮眼睛,以便及时识别大大小小的“康生”,利于减少其危害。

第四、有的地方涉及到毛主席,但都是历史的真实。毛主席伟大,非常伟大,但他毕竟也是人,他不是神,神是人造出来的。不幸的是:有些同志仍自觉不自觉地造神。

希望将此信在贵刊登出,并将原文重新发表。

此致敬礼!

师秋朗

1992年3月21日

※ ※ ※ ※ ※ ※ ※ ※

本刊第5期《我所知道的康生》

一. 第12页中栏, 接上数第13行后: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五六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岐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非常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做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多,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多少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

一文被删部分的补正:

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得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原话如此——笔者注),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发表反党言论,把另一些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法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空气。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一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杨家岭、保安处和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受过的。

二、第12页中栏,接《康生和中央》小标题下数14行后: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

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5个人就组织了5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正。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笔者注)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三. 第12页右栏倒数18行上:

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四. 第15页左栏倒数14行上:

1940年—1941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长作讲解。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岁。担任临时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尚未使用。”她又接着说:“他们都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

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执行的方式么?!

五. 第 15 页右栏,接上数 20 行后:

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长征老干部,又是残废,解放后任西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康生对西安来北京的学生代表们说:“刘海宾是老特务,是叛徒,要查清。”学生们回去后对刘批斗了一个多月,都找不出任何疑点,学生代表二次来京,向康生要证明材料,康生却矢口否定了自己讲过的话。使学生无可奈何。

六. 第 16 页左栏倒数第 12 行起原稿为: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后来孩子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刚离开延安还在西安时,康生和曹轶欧便迫不及待地吧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已毛遂自荐地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亲自安排的,江青也就很容易地接近了毛泽东。

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是乡村的孩子,有些事不会干。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常常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举止得体,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着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里里外外收拾个干净整洁,面目一新。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便由接触频繁发展到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接触后两三个月,便要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了解江青底细的王世英等同志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江青

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下面反映的意见,又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于是他揣着那些信去见毛主席。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主席便表现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朱德总司令出了个主意,给江青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与党的事务。这三条在干部中迅速传开,意见才为之平息。

举行结婚仪式时,请的来宾不少,唯独没有邀请张闻天夫妇。

主席原来有个警卫员名刘海宽,是在全警备团挑选的最能吃苦耐劳、最勇敢也最忠诚老实的好同志,可是江青不喜欢,很快就把他赶回警备团去了。以后挑选过好几个人,大多数都是同江青不和而干不下去。对此,康生曾无伤感、吞吞吐吐地对我讲过些对江青不满的话,接着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挥说“他们(指主席和江青)的事情真不好办,就像蒋干说过的‘曹营之事啊,难办的很哪……啊……啊……’”拉起了一串京戏腔。

又一次闲谈中,康生说:“中国(指党中央、毛主席)的问题和事情,外国人(指共产国际)总是弄不清楚的,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的话何所指,我不大清楚,但这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直觉是他急于要摸中央的脉搏。

七. 第 16 页左右栏接上数第 2 行后为: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同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同志替中央起草的土改工作指示,

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八. 第 16 页右栏倒数第 5 行原文为:

一两个月后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是一套家庭式的病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不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柳克斯大楼里第181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烂纸、破本、破烂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怎么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

他们回到中国后,首先是他的秘书不断增加,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有用场。连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等等都由秘书承担。他的伙食标准虽然同中央负责同志一样,其他却另有特殊要求。连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苏联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的产品;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爱喝咖啡,有时饮酒,酒量很可观。1946年夏秋之交,他一度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他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

杂文大家聂绀弩的坎坷路

●姚锡佩



197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为无期徒刑的共产党员、现代著名作家聂绀弩，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身份和一些战犯同时被特赦，真是“初闻喜讯喜还惊”，令人哭笑不得！1979年彻底平反后聂绀弩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年老病弱的绀弩穿着发给战犯的那套簇新的蓝帽蓝衣蓝裤，参加第5届全国政协会议和第4次全国文代会。在会议期间，他经常躺在招待所的床上，重晤天南地北劫后重生的故旧知己，此后便一直卜居京郊劲松，或病卧医院。1986年3月26日，在他年满83岁高龄时，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终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熟悉他昔日潇洒模样的老朋友，说他出狱后的十年形似一段“呆木头”。有人则尊称他为“卧佛”。广大读者却像发现出土文物那样，拍案激赏1981年香港付印的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集中有咏写他50年代流放北大荒的《北荒草》，60年代蛰居生活的《南山草》，以及抒发友情的《赠答草》，

这些本为自遣的小诗，已被人评为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以《散宜生诗》为书名再三增补注释出版。同时，几家出版社重印了他的旧作，如《绀弩小说集》、《聂绀弩杂文集》、《绀弩散文》、《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还有一本已经介绍尚未出版的语言文字论集。年轻的读者方知这位在文坛上沉默了30多年的聂绀弩，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不少行家高度评价他的创作，如夏衍在最近出版的《聂绀弩还活着》的《代序》中称：“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

绀弩晚年推出的新作，更富有哲理，人称他为哲人，他却自称为“散人”、“庸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赞美他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老友们怀念他是一位“独立特行”的“狂狷之士”；一位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则对他在北大荒时逆来顺受的言行大为不解，问道：“这也算是革命

者？”

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恰如绀弩自言：“语混心艰辨者稀”。他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的沉思，透过他那伤痕累累的身心 and 热烈而冷隽的文字，灼然可见一个令人颤栗的中华民族的精魂。

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绀弩曾自咏：“缘何除夕作生日，定为迎春来世间。”90年前的除夕日（1903年1月28日），他在除旧布新的阵阵爆竹声中，哭喊着降临湖北省京山县。生母因产后出血，病卧两年去世，生父也在1914年因肺病离开人间，绀弩即由其叔父母抚养。

京山是鄂中的僻山小县，却也崇奉读书科举的仕途。县内古迹文笔峰，即绀弩的曾外祖父曾宪德倡建。他在同治二年出任台湾、福建沿海地区的道台，政绩显著，被授予三品按察使，赏戴花翎，塔门上的“青云直上”四字

由他的二儿子题写。然而，饱读经书的绀弩祖父，只在咸丰年间补了恩贡，一直未能进入仕途；分家之后又不善理财，家境便一落千丈。生养绀弩的故园，本是浪漫主义楚文化的发祥之地，又是滋生清静无为、恣睢逍遥老庄哲学的山野之乡，以道家思想成分和楚文化圈中的神话传说构筑的中国大众宗教——道教，更有神仙方术教人度世求生。潦倒的绀弩生父聂平周就常年浪迹江湖，后因贩卖布匹、烟土失利，便在家中开一小烟馆，借阿芙蓉养生，在吞云吐雾中纵欲，他画得一手丹青，更有一副好嗓子，常和志同道合者组成业余唱戏班子，在茶馆里自弹自唱，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之日，为乡邻助兴。绀弩也常常随行，唱本中的故事成了他最早得到的历史文化知识。

楚地又多革命志士，养父聂行周追求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之道。辛亥革命时，他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几乎遭到杀害。后任云梦县法院书记，因吸大烟而被撤职，只得靠世袭的“跑税契团”（代衙门收税）维持生活，四十来岁便老废在家。

绀弩初进小学读书，便显露特有的悟性。那时大小班学生同室学习，老师给大班讲课时，他也爱听，因此读《三字经》时，就能解释《论语》中“学而”的意思，还学会了平仄对仗。不久，老师便让他和大班学生一起开笔作文，出了两道题，一是《子产不毁乡校》，二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任作其一。绀弩听毕老师的解题和作文法后，竟提出要把两道题合为一题写，还说有一想法，即“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老师听了暗自吃惊：这个黄毛小儿怎会说出自己心中之隐，还解得如此奥妙，不由当众表扬。于是，小绀弩得了个“聂贤人”的雅号。其实，这些道理原出自老师之口，老师在讲《论语》时，不是也说过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诸如此类的话，父辈们在茶馆里、烟榻旁大发牢骚时，说得更加明白、尖刻。儒家的入仕之道和道家的无为之道，几乎同时灌入绀弩的头脑中，尽管他一生几乎都在行“庶人之议”，但到晚年忆起儿时不知深浅的看法，似乎更有了体悟。

绀弩在县高级小学毕业后，欲去武汉上中学，不料，为他筹钱的养父也

患结核病去世。失学的绀弩只得借阅外祖父申子舆家的藏书自学，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各种野史笔记、小说，如百看不厌的聊斋、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红楼，以及《笑林广记》等等，最爱读的是《庄子》和各种高人隐士独立特行的传记。他几乎天天关在房里，躺在床上看书，由此造就了他广博精深的旧学根底和博闻强记的本领，但却也养成了散漫的习性，以至后来他在《壁画》一文中惊诧地回顾道：“如果我在家里不出来，不知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不是像祖父、父亲一样的鸦片烟鬼，就是受到退隐老庄哲学的影响而无所事事。”

17岁，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龄，绀弩和两个同学合谋远赴他乡，却失败了，还被迫娶了他不爱的姑娘。出路，在何方？春天，又在何时？

虚无和民主，专政和法制

帮助绀弩走出闭塞之乡的是他的小学启蒙老师孙铁人。这位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前辈，当时在上海任国民党党务部副部长。他偶然在汉口的《大汉报》上读到绀弩的诗作，便觉得这个聪颖的学生需开拓视野，生长志气，就写信邀请绀弩和另外两个本邑弟子到上海。

飞出牢笼的绀弩经孙先生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又推荐他到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前敌指挥部湖北同乡何成濬手下当录事。在这革命的大时代里，他开始懂得了不少新名词、新概念，也知道胡适之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但吸引他的是一本《无政府主义讨论集》，尤其崇拜刘师复，这位通古明今的学者，把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解释得十分投合熟读《庄子》的绀弩的口味，支配着这个刚刚摆脱家庭封建羁绊的年轻人，竟有十年之久。虚无和怀疑，使他看到自己所在的这支革命队伍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封建旧习气。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决定离开军队。

远在南洋的国民党人鲍蕙僧受孙铁人之托，邀请绀弩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华侨办的运怀义学教书。不久，在缅甸主编《觉民日报》的同乡、共产党人董锄平需要绀弩去做他的助手。当绀弩抵达仰光时，英国政府却发出了

限期驱逐董锄平、鲍蕙僧出境的命令。“小学毕业生”绀弩面临独力承担一日四刊的编辑工作，董锄平在离境前教会了他设计版面、编排栏目，并留下一堆书籍让他学习，其中多为西方自然科学、哲学，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译著。董锄平告诉他，从这些启蒙著作中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由来，还特别要他精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合订本，学习它的编辑思想，了解中国最新的思想动态。

《觉民日报》开创了绀弩的编辑生涯，也促使他去认识传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世界思潮，认真思考中国现实中的诸种问题，并运用手中的剪刀和笔，介绍、阐述乃至议论。

当时他看《新青年》，受震动最大的是四川反孔非儒斗士吴虞（又陵）写的《吃人与礼教》，其中评鲁迅的《狂人日记》说：“我觉的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些戴着礼教的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把鲁迅对半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高度概括为“吃人”一词，更加透彻地亮在读者的面前，直截了当地批判礼教吃人。绀弩因此爱看《吴虞文录》，尽管吴虞是抬出老庄诸子和李卓吾来打“孔家店”，无新鲜的思想信仰，却因贴近本国实际，抒绀弩过去读孔孟之书时结下的疑团一一解开。所以他一直把吴看作打“孔家店”的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老英雄。

因吴虞的推荐，绀弩又重读鲁迅以现代手法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方醒悟其中深刻的涵义和强大的战斗力量，由此爱上鲁迅的作品，注意搜求。不过，年轻时读鲁迅的小说，总有点不满足，如看《在酒楼上》，嫌写得太悲观、颓伤、阴冷，没有一点年轻人发扬奋进的精神，然而，就是这篇小说，使他难以忘却，而且一碰上什么钉子，无法可施时，就会想起《在酒楼上》，觉得自己就是吕纬甫，才真正感到鲁迅是最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时代。所以，尽管绀弩一生碰壁，不时感到孤独，却未如吕纬甫那样去教“诗云子曰”，倒是鲁迅的思想文章伴随他走完了人生的长途，从中吸取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观察现实的眼光也因此愈加敏锐、深刻。



△绀弩与周恩来“五十周年今起蜜月”

1925年，他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不久即随军东征陈炯明，打下海丰县后，暂留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讲习所”任教员。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第一次感受到军官的权威。一次，有人密告某农民私藏军火，他奉命去查找，把破房上下里外翻拆遍，未见踪影，农民也拒不承认，他就按规定把农民遣走，交农民自卫军审查。可是内心却产生了矛盾和苦恼：为什么可以随心抄百姓的家？为什么可以随意逮捕一个人？自己反对人压迫人，却又服从命令干这种压迫人的事。他向周围的同志诉说对革命的疑惑，却遭到攻击、排挤、轻蔑，于是，更感到孤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专政和民主法制关系的问题仍时时困扰着他。

你占朝廷我占山

绀弩从海丰回到黄埔军校不久，就面临毕业分配。恰巧莫斯科中山大学前来招生，绀弩以第三名被录取。1925年冬登上了去苏联的路途。

莫斯科中山大学几乎云集了国共两党的年轻的骨干分子，包括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留苏的中国学生除了本身分属两党，又受到苏联党内不同政见的派系影响，明争暗斗，颇为激烈。绀弩却不屑参加党派之争。那时，

他已对国民党不满，认为戴季陶编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是要孙中山承继中国的道统，要捧孙中山的神主进圣庙，是复古，不是革命。对充满家长军阔气的蒋介石更为不满，早在黄埔时就宣称，不出两年，自己就会反蒋。对共产党，则认为不少人是投机入党。所以，他依然抱无政府主义态度，专心于学习，几乎把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读遍，其中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默慈的《政治学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等，这些比课堂上讲的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读书多，又不时流露人道主义观点，同学就称他是“托尔斯泰”。

不过，当时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领袖康泽却给绀弩下了一个结论，太不世故，太任性，太好发牢骚，近于《三国演义》中的弥衡，如不留心，难免有杀身之祸。大概正是这种“糊涂蛋”的面目吧，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这批留学生被遣送回国，绀弩虽未遭清洗，却被闲置了数月，才派往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任挂名的训育员，后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

那时，凡进过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员，只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即可飞黄腾达。对此绀弩焉能不知？然而，他竟一直未领国民党证，也未在黄埔同学会登记。当他的同学如

谷正纲、王陆一、郑介民、康泽等一个个爬到蒋介石身边，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时，绀弩的心依然是淡淡的。他自己的人生准则，诚如后来在《钓台》诗中所云：“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

绀弩占的“山”，便是搞文学创作，编报纸杂志，尤喜编那活泼多采的副刊。他一生编过六个副刊，影响深广，却也因此不时受到“朝廷”的戕害。

在南京，他编了第一个副刊《新南京日报》的《雨花》，并与《新民报》副刊《葫芦》主编金清成组织“甚么诗社”，出版《甚么周刊》、《甚么月刊》，专登新诗，社员多至一百来人。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在“九·一八”民族救亡的高潮中，绀弩果真举起了反蒋旗帜，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公开在上述报刊上发表抗日诗文，甚至散发传单，提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等政治主张，终遭国民党当局的恐吓和追捕，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经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妻子周颖的介绍，结识湖北同乡胡风、方翰等。当时胡风正在研究左翼文学理论，他否定了绀弩的诗文，促使绀弩积极钻研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在日本他们共同组织“新文化研究会”，出版抗日刊物，1933年便被日本警察局驱逐回国。

回到上海后，绀弩即参加了“左联”，并成为该联盟的理论委员会主要成员。1934年又由担任共产党中央特科工作的同乡吴昊如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已比较自觉地批判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上活跃的作家之一。

思考世真脚底皮

身为共产党员和革命作家的聂绀弩，却无“唯我独革”的面孔，他依然保持着广泛的社会联系，甚至利用旧关系，在汪精卫派系的《中华日报》上开辟左翼副刊《动向》，影响甚大。

他经常代表“左联”和光华大学小组联系，在这些小老弟面前，他无丝毫领导架子，平易近人，积极支持他们编印大型文艺刊物《文学丛报》，并强调

要“团结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关门，没有门户之见。”因此，这个刊物既发表了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供讨论，也刊载了郭沫若的《在国防的旗帜下》，进一步阐述“国防文学”口号应有的正确内涵。刊物还同时发表了以茅盾、周扬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以鲁迅、巴金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绉弩在这两个大同而小异的宣言上都签了名。当然，在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上，他有自己的倾向。

当周扬等人提出并大力宣传“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时，绉弩和不少作家都感到这一口号作为创作口号是含糊的、不明确的，对所谓的“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断语，敏锐到此乃“不是同志就是敌人”的宗派主义老调的重弹，实际是拒绝、否定了未写国防主题的作者和作品。因此，当他看到经鲁迅、冯雪峰等商讨，由胡风率先提出的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马上同意将它作为“现阶段文学的内容的特质”和“现阶段的作家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并在《夜莺》杂志上撰写《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支持新口号。不过，他在文中又指出应该正视“文坛上已经有了比这更简练的创作口号，那口号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应该忽视、抹煞，或轻率地作字句上的吹求”，也就是说，“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也可以继续存在。只是他同意胡风的分析，新的口号“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所以“在现阶段是居第一位的”。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统一”、“第一位”的观点，在当时宗派主义情绪严重的文坛上引发了一场混战，胡风成为众矢之的。

当时鲁迅正在重病中，为了准确解释新口号，消除宗派主义情绪，就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修改、补写并署名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其中强调提出新口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错误的意见”，并非是什么“统一战线的总口号”。在承认“胡风的文章解释不清楚是事实”之后，又着重指出：“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

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显然，这封公开信用心良苦，让支持胡风观点的绉弩来承担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那时周扬等对胡风的成见极深，而绉弩与各方的关系尚好，不致引起更大的纷争。事实果真如此。不久在冯雪峰的努力下，论争双方和文坛其他各派代表共同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体御侮与主论自由宣言》，达到了联合抗日救亡的目的。

尽管由于鲁迅和冯雪峰在公开信中批评了绉弩，使他后来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在一些研究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中，成了三十年代宗派主义的代表人物，绉弩不免有点委屈，但他始终认为雪峰在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当他和笔者谈到当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旧案时，毫无怨言地说：“那时，大家都年轻，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鲁迅批评了我，我还想写文章反驳，但胡风告诉我，鲁迅希望我们不要再写了，我也就接受了这个意见。为了平息论争，团结抗日，个人委屈又何足道哉？”

绉弩十分欣赏鲁迅在《答徐懋庸》公开信中的一句名言，即对待新的口号，“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1966年胡风流徙四川，绉弩曾远赠诗作多首，其中《风怀》之二云：

三十年前口号提，今方定案敢嫌迟。

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

当日万言名论在，凌烟诺将首功谁。

介推焚死哈哈笑，思考世真脚底皮。

绉弩把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遭遇，比为春秋时追随晋公子重耳的介子推，未想邀功却被火焚死，他自己的结局也类似。而有的人在回忆、研究两个口号论争这段往事时，不是全面地去思考双方立论的依据和口号本身的涵义和解释上的问题，而是斤斤计较于口号是谁提出来的，唯以党内某人指示和鲁迅有无手书作为论断是非的标准。这种因人立言，因人废言，因人而异的思想方法，往往造成文学界不必要的纠纷，也妨碍了后人对文学争鸣上的问题作出正确的总结。此类脚底皮式的思考，不仅让当年的鲁迅愤懑，也令今天的被批判者觉得可



△绉弩青年时期(1929年)

笑。绉弩正是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思考了鲁迅批评他的错误所在，恰如他在《误〈金瓶梅〉》一文中说：

鲁迅全集所注，我亦不解。错误在，我在《作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世界文库翻印古书》，是攻击郑振铎同志的，后来还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一篇《一九三五年的语文运动》，也是攻击郑的。就政治上说，就是破坏统一战线。

这是从历史的高度和总体上来认识自己青年时期思想激烈、片面的错误倾向。

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正直的总结，使绉弩的思想创作迅速走向成熟。他的长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被公认为是悼念鲁迅的最好的挽歌。到四十年代，他的创作进一步登上高峰，表现了他丰富的阅历和精深的文化素养。他的小说、散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杂文更是独具一格，论古说今，汪洋恣肆，委婉曲折，机趣多刺，如《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

绉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也颇多创见。如评论《封神榜》，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鲁迅曾评这部明代神魔小说，“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绉弩则在《论〈封神榜〉》中进一步剖析了这部大众读物，以其迷信神怪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极深，乃至“占着它确乎

不拔的支配地位”。但又指出：书中描写的许多“正”、“邪”教的冲突，“如剥去那江湖术士的外衣，也未尝不可以有朴素的脚踏实地的解释”。后来他又陆续写出《论莲花化身》、《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再论申公豹》、《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等等，都能透过荒唐的神鬼描写，听到历史的回声，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后来，他对《水浒传》、《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等的研究，更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礼教的批判。

阿 Q、庄子、资本论

列上这组小标题，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然而，此三者却是支撑着绀弩后半辈子生活的精神支柱。

绀弩在赠著名新闻记者、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的《悠然六士》之三中有诗云：“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系自责当年不该邀请老友来京共襄出版工作，使这位当了半辈子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戴上了罪人右派的帽子。据说张友鸾看后付之一笑曰：“在劫难逃，与卿何干？”绀弩自身不是也“在劫难逃”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绀弩受党的指示在香港做统战工作，后又充任《文汇报》主笔，1951年他才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安定的生活环境，使他决意收起鸣不平的带刺的笔，专心致力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1954年，他主持整理出版了《水浒》的71回本和120回本，又通过去苏北实地调查施耐庵的材料，写出独具己见的《水浒》五论。正当他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积淀的难点时，他却失去了写作的权利。

首先把他拉下马的是1954年的肃反运动。曾加入过国民党，又从不讳言与许多反共人物有过来往的聂绀弩，顺理成章地遭隔离审查，连他在香港动员一些曾反共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回归大陆，也成了疑点，更须交待他和特务头子康泽的“非常友谊”。原来，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康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绀弩想起曾答应为康泽作传，便践约写了一篇《记康泽》，不料遭到一些人批评，指责绀弩把一个反动政客写得十分精明，还显得颇有“情

义”。鲁迅早就揭破中国人的“世故”：“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绀弩却从不知避瓜田李下之嫌。在反复的批判、反省下，他痛苦地在交待材料上自污自罪自我否定，就像小时候那样，在母亲的鸡毛帚下屈打成招。他原以为这样就能搞清楚问题，最后却以“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开除共产党的党籍。至今，在一些看过他交待材料的人的眼里，他仍是一个乌七八糟的人。“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推心坦白难。”即是他对这种切肤之痛的深刻感慨。

紧接着而来的便是震撼文坛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追查他和胡风的长期交情，他便给自己扣了一顶帽子：“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后因在胡风家中搜出一封绀弩夫人周颖劝胡风多作自我批评的信，夫妻俩才幸免于难。

然而，1957年却因身为“民革”领导人员的绀弩夫人热诚帮助党整风，批评肃反扩大化，还质问：胡风算啥反革命？于是，未鸣放的绀弩成了幕后策划者，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遭此接连飞来的横祸，绀弩倒有了比林冲洒脱的感觉：“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一种慷慨怨凉之情，促使他以半百之年，坚持要求参加流放北大荒的右派行列，不愿在京城看故旧变了的颜色，做愚弱国民的受众材料。

天寒地冻的荒漠，使绀弩凝积了万千情思。恰逢有令，要人人写诗歌颂劳动，绀弩便遵命提笔，将心声倾泻于他过去否定的旧体诗形式中。读这些名为“北荒草”的小诗，人们惊叹他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亦庄亦谐，亦冷亦热的情怀，却也感到有一股“阿Q气”。绀弩也承认，诗中把“挑起一担水，自谓挑起‘一担乾坤’（《挑水》），挑土和泥，自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脱坯》）；何等阿Q气，只诙谐、滑稽、打油而已哉”。却又说：“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哲学上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这是在一种无法自拔欲求生存的诡辩逻辑。

诚然，在1957年和“文革”年代，“阿Q气”几乎已成了从屈辱中挺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体验和笑

谈，也许是因为它和中国根深蒂固的老庄思想有某种精神上的相通。绀弩正是把自己的万般酸楚，寄托在艰辛却蕴有情趣的劳动中，并以凡人杂事，俗习白话入旧诗高雅之殿堂，变“犷言”为富有生命力的奇句，以至开旧体诗之新风。1962年他摘帽返京，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挂个“文史专员”的闲差，他难酬壮志，便在文化遗产和旧体诗中磨淬神思。为消遣无聊，竟于拙处巧对仗，更多俏皮诙谐之句，但正如他自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请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及历史之大悲也。”

不过，绀弩未因洞悉人生之大悲而消沉，倒是因从庄子游后更旷达自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他面临无期徒刑的残酷现实，屈辱地忍受各种非人的折磨，却不废苦读和思考。他以监狱为学习的圣地，反复穷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以唯物辩证逻辑启发神志，振奋生命，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把握现代社会的历史和人生的奥秘。他的思路，不再是遇顺境高扬马克思主义，处逆境宣泄庄子般的牢骚，忽而峻急，忽而平缓。深奥的《资本论》和老庄哲学的精华，一经他的迂回幽思，融会贯通。

正是这斗室深宵的灯火，照亮了他晚年的创作走向巅峰。他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观点，指导对《金瓶梅》的研究，也以此纠正青年时期把它看为淫书的偏见。他依循鲁迅“有字皆从人着想”的思路，剖析了反映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系列仁和礼，疾呼：“何处不是人肉宴，古久帐簿几篇章”，责问：“女人何故属男人？”悲叹读书人“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杀泪痕”。

中国君子陋于知人心

妇女问题，是绀弩对“人”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引用法国傅立叶的话说：“一国文野，看其妇女所处地

位。”

早在少年时，他常见母亲在冬夜的灯下对着唱本唱《再生缘》、《二度梅》、《梁山伯和祝英台》、《柳荫记》等，唱着唱着就流出了眼泪。绀弩窥测到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内心的寂寞和精神寄托。然而，他也看到母亲硬是把养女（实为使唤丫头）卖给穷山沟里的老夫，活活夭折了她心中的爱苗。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又遇到各种命运悲苦的女子，有的已成了他所创作的小说人物的原型，如《姐姐》、《两条路》、《旁听》、《酒船》中的女主人公。绀弩的杂文也有不少是论妇女问题的。1941年，他在桂林《日报》主编副刊《新垦地》时，还发动了一场女权问题的论辩，成为“五四”以来有关妇女是走向社会还是回到家庭的第二次大论战。他对中外古典小说的评论，更有不少涉及妇女问题，如《谈〈简·爱〉》、《谈〈娜拉〉》，以及对《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花月痕》、《金瓶梅》中妇女观的评品。在这些文章中，绀弩不仅同情、支持妇女为争取生存、创造的权利而作出的奋斗，鞭挞那些吞噬、污辱、损害妇女的恶势力，同时也真诚地告诫妇女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克服自轻自贱的依赖思想和柔弱的性格。他对颇有才情，已经“飞”起来的女作家萧红，有着深沉的感情，因而更惋惜她为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栽到“奴隶的死所”上。

他呼吁解放妇女，渴望真正的男女平等，追求纯真、自由的男女之爱。

他曾借《庄子》里某人的话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人心”也者，即私欲、嗜欲也。他很欣赏柳亚子送儿子柳无忌诗中的一联：“须知恋爱弥纶者，不在纲常束缚中。”但不赞同亚子先生和“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那样，从冶游中找寻恋爱，乃至自以为是反对纲常名教，是革命。他渴求的是真实生活中灵肉一致的男女情爱。为了寻求真正的爱，他不惜做各种名教的罪人，所以和他的政治生命一样，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他也是伤痕杂泪痕，难解其中味。

绀弩的原配发妻申小姑是母亲为传宗接代而婚娶的表亲，这位表小姐苦守空房四年死去，也就埋葬了封建名教结下的苦果。

22岁的绀弩东征到海丰后，才尝

了初恋的甘泉。活泼热情的农民讲习所学员——陆安师范宣传队员敖少琼，给孤独的绀弩带来了希望。然而，待到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绀弩从苏联回国，要求去海丰看望她，她却坚决拒绝。直到30年后，绀弩重访海丰，方知她那时正被疑为反革命通敌分子，罪证就是国民党党员聂绀弩的来信。这初恋之花竟在革命的名义下凋零。

陷于失恋痛苦中的绀弩，久久未觉察党务学校以大胆著称的女学生周颖正在暗暗地追求他。周颖在12岁就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活动，她自小失怙，一见绀弩，就爱上了这位言谈随和诙谐的训育员。她以机智而又执着的追求，终于赢得了绀弩的心，1929年结为夫妇。他俩都是鲁迅思想的真诚追求者，他们把爱的结晶——鲁迅逝世那年诞生的女儿，命名为海燕，这是绀弩和鲁迅等合编的杂志名。

但是，绀弩对周颖的感情又十分复杂。绀弩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惯于无拘无束的思想，生活散漫，感情却细腻，语言含蓄。而周颖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擅于演讲，好发议论，豪爽之下不免失之空疏，也不是绀弩所喜好的诗文书棋的对手，天长日久，心灵便少沟通。八年抗战离乱，两人天各一方，绀弩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金华后，竟与一位诗人的妻子发生感情纠葛。恰在此时，又耳闻故乡京山遭敌机大轰炸，化为焦土，顿时勾起了对避居老家的妻女的怀念，一篇《离人散记》，曲诉衷肠，也割断了婚外恋。

当周颖沿江寻夫到重庆时，却惊闻绀弩在桂林和一位女演员热恋。被周颖视为小阿妹的邓颖超和周恩来，狠狠地批评了“大自由主义者”聂绀弩。这场苦恋留下的是一首苦涩的诗：雨露凋上枫树林，金风吹遍女儿心。

抽簪化地成银汉，背水施屏障锦衾。

二十六个和一个，谁家豪富谁情深。

早知抛劫红尘去，碧海青天任古今。

绀弩与周颖间的伤痕远未弥合，他的心又被一位久已认识的胖实、单

纯的业余女作家所牵动。在婚变的风波中，担任重庆劳动协会福利部主任的周颖，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声援。绀弩即挺身发表《记周颖》，歌颂他那有智有谋又富于牺牲精神的妻子。待到周颖被释放，随劳协去香港开辟新阵地时，绀弩竟幻想和恋人私奔解放区。就在登上轮船的刹那间，恋人为理智束缚而悄然离去。绀弩四处寻找不得，才服从组织命令前往香港，唯将新出版的杂文集名为《二鸦杂文》，二鸦者，二丫也，乃以离去的恋人乳名，化作自己的笔名。

绀弩和周颖间似乎有一个强大的磁场。每当周颖有难时，绀弩即著文广为声援；在绀弩遭灭顶之灾际，周颖则充当他坚强的后盾。她“寒荒万里探狱”，澄清了所谓的绀弩在北大荒纵火烧房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绀弩以莫须有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在近乎绝望的境地，周颖执着地寻找各种渠道，不断向上申诉，直到亲自把形如槁木的绀弩接回家中。一天，绀弩终于探悉老妻是在独自承担爱女海燕自杀身亡的惨痛中，心力交瘁地照料着家中大小人丁。当晚，他含着湿透衣襟的泪水为周颖写下《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诗一首：

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

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通岂人情。

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

稀古姬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在历经患难与共、九死一生的风雨后，绀弩与周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体贴。正如绀弩在另一首《赠周婆》的诗中所云：“五十年今超蜜月。”

绀弩的多次爱恋，曾受组织的批判，情敌的争斗，友人的指责，世人多不解，他亦无悔无恨。而爱他的女子，包括他的老妻都说：“绀弩的爱是真诚的，不是玩弄。”抑或此即为中国君子陋知的“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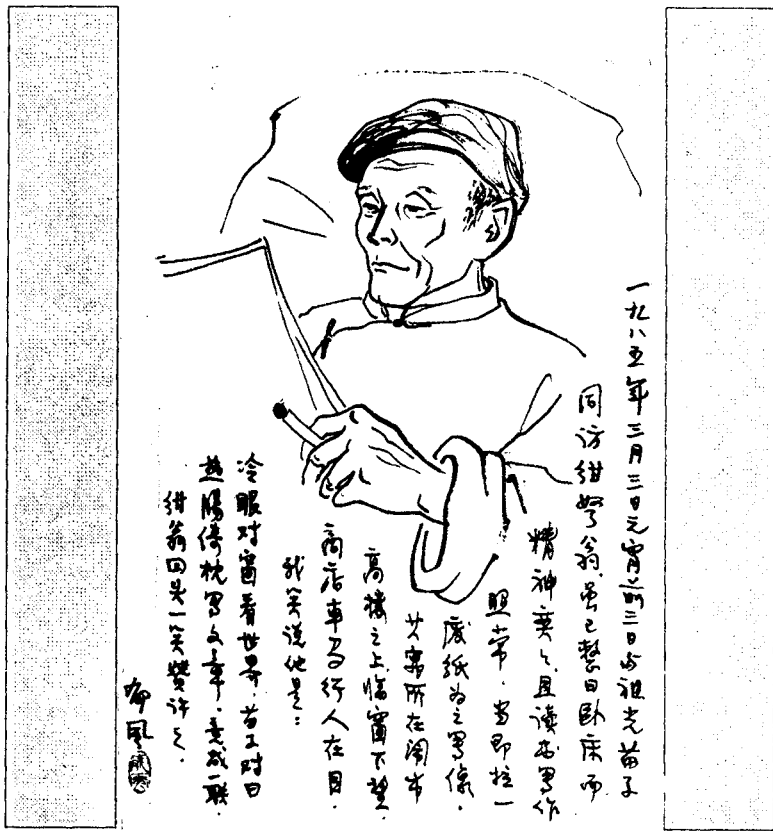
从德充符到散宜生

绀弩的《〈赠答草〉序诗》有句云：“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这是他几十年自我解剖后的思想反

扬。然而，其间因检查思想创作上的清浊是非而备受的煎熬及付出的代价，又有谁评说？绀弩老友钟敬文在送他的挽联中道：“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在荆棘丛生的文坛上，绀弩终于放弃了他早年颇有抱负并已有成就的小说、新诗、散文、杂文创作，令人惋惜不已。

就其思想的取舍而论，绀弩所选择的也并非是一条可喜的新路。被周恩来称为“大自由主义者”的绀弩，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批判自己，如他的文集《天亮了》的初版和再版序言，对书中以《庄子》篇名《德充符》为题的小说，自评就很不同。1949年初版时，他说明题为“德充符”，乃“意谓人最重要的是德性充足，形体之类无足轻重”，因此文中表扬了残废的“主人公的一点美德，也要算是对旧世界的战斗的”。到1950年再版时，他已感到文中宣扬了一种狷介思想，消极地做好人的思想，如不屑肋肩谄笑，同流合污之类。然而，这“比之于进取、有为、革命，那意义是很小的”。他自责道：“在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下作为一个作者，一方面固然对那统治作过若干程度的战斗；另一方面也作过更多的适应，有时甚至变成思想的麻痹，以达到极小的一点点为满足。《德充符》是那种情况之下的产物。”

然而，30年后，绀弩将自己的旧体诗集名为《散宜生诗》，并在《自序》中有一段长长的解释：“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但此意未必始于庄子，殷周之际似已有之。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涵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借‘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1983年，他又作自寿诗《八十》三首，其一云：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以上可谓绀弩老人在历尽坎坷后识得的人生真谛。老人以久病之身，坚持不断著述，从中可见他自谓“散人”、“庸人”，实是以此作为战胜天命、人意的精神力量，非消极颓废之言，但其悲凉之情已溢于言表。且不说他大半生积极、进取、有为、革命，即以他早年形体残疾而“德充符”的肯定，观照前后思想之落差，实在令人怆然！莫非人一定要自贬到庸凡后才适宜于生存吗？这与一百年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岂非背道而行？然而，正是这个生遭摧残的绀弩，将“散宜生”这个残废了的灵魂摆在国人面前，让人震颤，任人思故：缘何几千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大凡“散人”、“庸人”适宜于生存，或更有大用？

（责任编辑：方实）



(张虎 摄影)

我的父亲李英儒

· 李家平 ·

光阴犹如逝水，转瞬间爸爸离开人世已近三载。自爸爸走后，我不曾断了对他的思念，想来这本是人之常情，爸爸一辈子对我爷爷、奶奶的想念就从没有中断过，直至他临终前，还在病床上不停地叨念。

不过，我却很少想到要动笔写一写自己的父亲的。尽管自爸爸故去之后，有不少长辈和朋友提及此事。

当我独自静想时，总感到爸爸在文学道路上的足迹，大体已经随着他本人的逝去固定下来，无需我再重提。倘或避开业已公认的那些事实而另外下笔，那么我又能写些什么来呢！作为亲生儿子，既有比别人更熟悉父亲的地方，又有比别人更陌生的。面对爸爸

生前留下的一卷卷文稿和在历次运动中写下的一份份检讨书，我将何以认识这位历经沙场考验与文坛磨炼的父亲呢？困惑之余不无担心，实不愿有见地者在看了我这篇文字后会露出那会意的一笑；不过为亲者诲耳。

但凡夜晚安睡不下时，人翻来覆去的总要想这想那。每当我一想到爸爸，从黑暗中呈现于眼前的，总是那副略带笑意的慈祥面容，大约与所有为人之子脑际中浮出的形象并无二致，都是那般的亲切。如果执偏要找寻出点不同之处的话，或许是在爸爸的笑容中间还稍稍有点苦意，眼神里多少透出一些轻微的思索之痕。诚然，在认识爸爸的人们中间，爸爸还是颇有口碑的。除却对他的才识、文章的赞扬而外，有一点最为一致的是：他是个仁慈的好人，待人宽厚，有长者风范。想来这当属无可非议的事实吧。不客气地说，我也这么认识爸爸。从小时候起，爸爸就没完没了地劝诫、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作老实人办老实事，前半夜为自己想，后半夜替别人想；富贵烟云事，平安即是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等等，多得叫人记不住。即便是在文革那种年代，还在聊天的时候说《颜氏家训》也是可以读一读的，当然是躲在家里说的。自小我听这听多了，

懂与不懂的略能明白一点，只是时常听得有点烦厌。不过，爸爸绝非腐儒，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空泛的偶像，而是实实在在的依靠。

年幼之时，从没人想过别人的爸爸是否如此可靠，反正自己有这样的爸爸，生活中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可不是吗？当我爬到树的高处下不来的时候；当我被野狗追到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时候；当我把手指头伸进小瓶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的时候；当我用刀在吉普车身上乱划而被当司机的战士俘虏的时候；当我偷吃菜地里的西红柿让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农民逮住的时候……林林总总，记不清有多少应付不了的局面。但只要那熟悉的身影一出现，我就可以含着自认为委屈的眼泪，使用丹田之气扯着嗓子来一声：爸爸——！事情到此便结束了，下边的事自有爸爸去解决。虽然我很清楚，回头爸爸定会找我“谈谈”，可那又算得了什么，根本不用担心挨打，至多是多站一会儿罢了。那时，我根本弄不明白面壁思过有什么好处。

爸爸慈善归慈善，但也不是那种天生不会生气发火的老好人。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住在工友宿舍的小孩玩，那家伙骄横极了，玩着玩着，不知

为什么忽然在我脸上狠狠抓了一把返身就往家里跑。情急中我伸脚绊了他一下，这家伙足球队员似地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马上我就看到半张脸都是黄土渣，下有红红的鲜血顺着鼻子流出，连哭声全都变了调。我一向淘气，可从不打架，此刻早已吓得魂飞体外，一口气跑到机关宿舍大院外头躲了半天。事后才知道，那孩子的妈妈闻声出来没有见到元凶，便叉着腰指着军官宿舍楼破口大骂。适逢爸爸和许多同事下班归来，闹得好一场惊动。

个人惹了麻烦自家明白。天一擦黑，我赶忙溜进家门，真恨不能变作鼠类从此遁去。果然是纸不包火，爸爸一瞧见我这副模样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火，脸色全变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还说要大义灭亲，送我去政治处云云。爸爸越说肝火越盛，转身从抽屉中拿出个装满白药片的瓶子：你爸爸白天上班，晚上写东西，累成什么样？你还这么气我，与其一天到晚这么活着，还不如吃安眠药死了算了！一见爸爸欲服药自尽，我又吓得清醒过来，不由得咚地一声双膝跪地，抱住爸爸的腿大声哭诉：爸爸，你别生气呀！以后再不敢啦。我又指着脸上的血痕：我没欺负人，是他先

欺负我的呀！……

次日，在我们兄弟住的小屋里，发现爸爸写的一张纸条，是用毛笔写的。哥哥那时已经上学，认得些字，他读给我听：

当年姑母多吵闹，
祖父仅活五十多。
如今父亲近百，
作儿作女应如何。

我觉得这是写给我的，便悄悄把纸条收起来，决心痛改顽习。以后纸条不晓得丢到了哪里，可四句打动内心的话却铭记不忘。后来哥哥私下告诉我，爸爸那天虽然生气，但扬言吞安眠药只是为了吓唬吓唬我，其实他还是很疼我的，见我哭，吓得那样，心里反倒更不好受了。听了这话，我才觉得踏实了。

没过多久，爸爸找到我说：你也该学学规矩啦，天天泡在家里胡闹，总不是个长法儿，回头送你上幼儿园，那里有的是小朋友跟你玩，饭后还有水果吃，比在家里强多了。每礼拜有专车接你回家住一天，你看好么？

我进了幼儿园。开头还好，一切都挺新鲜，还补学了“园友”们人人必唱的歌：《阿姨像妈妈》。但没过多久，我就忍受不了这里的刻板生活了。牙具



一九七五年七月全家摄于河南许昌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旧曆正月
初九）为邓拓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丁巳冬日末佳客诗勉馀三
章

十年京國未相逢。雷私雅名飲
耳聲。閃道先生多上客。一

時俊逸。盡雲從。

曾讀燕山夜話來。曾曰吳老

共留杯。惊雷一日从空起。同

作三家村里材。子居京華未能獲交。即以此
語示之。吳時曰。吾燕同編

三。

往事前塵亦可傷。所以姓

字自堂堂。請翻二十五史

讀。屈宗馬遷尽凄凉。

江長盾未是草。

冯其庸为邓拓诞辰 80 周年赋诗三章

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

怎么放，毛巾怎么挂，皆有定规。大家的水杯全是一个式样一个色儿，我根本看不出哪只是自己的，每回喝水只有等别人拿完后我再端剩下的那只杯子，真佩服其他小孩本事怎么那么大。在这里一切得行动听指挥，让你说你才能说，让你唱你才能唱，吃喝拉撒睡，无不纳入正轨。特别是我这个临时补编的散勇，和那些有着一两年以上园龄的老战士们相比，样样不行，且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动辄获咎。像妈妈的阿姨们给我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爸爸当初描绘的天堂美景早就崩塌了，我倒宁可搬进家里楼后的大垃圾箱里去，也比在幼儿园过得开心、自在。于是，每逢星期日傍晚该回幼儿园时，我都要大哭大闹一场，然后被大人强制性地送上班车。

大约入园两个月后，我终于下了最大的决心，抗争到底。这天，我大闹不止，在各屋乱窜，弄得一片狼藉。妈妈和姑姑叫姐姐堵住大门后，过来抓我。见到无路可逃，我便返身钻到加宽了的双人床底下，弓身死死顶住墙根。妈妈正没办法，有意躲开的爸爸推门进家（他本不忍再看我哭着被带走）。爸爸蹲在床前一句一句地劝我，我缩在床下一个个“不”字拒绝。最后，图穷匕见，大床板给掀了起来，爸爸舒猿臂，探囊取物般地将我夹在腰际，

大步出了家门。一路上，我拼命挣扎，四肢齐动，累得爸爸直喘粗气。待赶到大院门口，班车早就没了去向。正是寒冬腊月的日暮时分，狂风劲吹，头顶上的电线发出可怕的尖叫，犹如鞭梢划空令人心悸。漫天的尘沙，遮住了四周的一切，只有零星的枯叶败絮在黄雾翻腾的半空中若隐若现地飘闪，忽而快忽而慢，仿佛永远寻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爸爸背着我迈开当年急行军的步伐，一口气走了几里路，径直进了幼儿园大门。院中空阔无人，那座令人生厌的小楼里照例传出歌声：“阿姨好，好阿姨，阿姨像妈妈，宝宝听你话……”这是开晚饭前的公式。爸爸放下我，改用手拖着走到楼门口望了两下，没有进去。然后又拽着我顺墙根绕行，来到房侧沿着“之”字形消防梯上至二层，站在侧门口处。爸爸用手把我眼角的小沙块抹掉：“你不给我面子，可我不能不给你面子，怎么样？自己进去吃饭？”

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感到爸爸已经不存在了，我开始恨眼前这个人，怀着绝望的心情，我注视着他退到台阶前，一屁股坐下。爸爸看着我的眼睛，停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那好，我就等着你你自己进去。说完，把大衣解开，紧挨着我坐下，用衣襟给我挡住寒风。

一阵惊沙抽在脸上，好疼啊，我侧眼看看爸爸，只见他那长着硬胡茬的青腮，他的眼睛半睁着，似乎很难过很忧愁，与来时急咻咻的样子判若两人。……天色渐渐黑下来，顷刻间小楼里灯火齐明。里边，晚饭的蒸气马上把外厅的玻璃遮严。就这样，昏暗中的一对父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和一个五岁多的小孩，各怀心事默默坐在楼外的台阶上，任凭狂风抽打，谁也不去理睬谁。此刻，我并没有觉得太冷，反而感到就这么紧贴在爸爸呆着更好。

风，到底住了，寒彻清绝的夜幕上挂起了几颗小星星。一位阿姨来锁侧门时发现了我们，她惊讶地叫我快快进去，说完立刻缩回身子，站在玻璃门内等着。

“那我进去了。”我已经再没有指望了。

爸爸用双手紧紧地捏了捏我的肩膀，然后下了消防梯，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

“怎么你还不进去？”

“我要看着你走！”

爸爸把双手插进大衣兜里，转身朝大门外走去，再也没有回头。我真的感到冷得不得了啦，赶忙进了门。

没过几天，爸爸把我接回家，两个多月的幼儿园生活就此结束。

在后来的日子里，爸爸常提起那个狂风之夜，笑的时候眼神总显得意味深长。似乎从那个夜晚之后，对我有了某种认识。

二

“你是最不适合当兵的人，也是最该去当兵的。”“要不是你还小。真想送你参军，让个厉害连长带上3年，或许还能成点材料。”每当听到爸爸对我这种不无担忧的低评价时，我总愤愤地想：“你不就是比我生的早，赶上打仗的年月了吗？这院里打过仗的人多啦。以后我非当兵不可，做个样儿让你看看。”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浪一下子摧毁了我的这个愿望，造反派、专案组走马灯般地在我家出入，又是抄家又是抓人，莫要说我们度日如年，连邻居们都被搅得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生活还能有什么奢望？！看到别人穿上绿军装，心里反倒没有感到多少不暢。可心细的爸爸却担心我想不开，很认真地安慰我说：孩子，这没什么，你爸爸当了一辈子的兵如今又怎么样啦？待我使劲表白说对这件事早就想开了之后，爸爸又感慨良深了：哎，要在打游击那时候，像这样的棒小伙子，又是念过书的，可真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战士啊。

在造反派折腾最凶的那段日子里，爸爸不得已离京暂作躲避，只身潜入保定市。爸爸青年时期在保定念过中学，搞过学运，抗战时又在那里做地下工作。他的那部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以这段地下斗争生活为基本素材的。当年日本宪兵、汉奸、特务那等凶诈，爸爸照样可以在他们眼皮底下工作。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爸爸此行不仅意义上全然不一样，而且也不可能长期隐蔽在那儿了。爸爸走后一两天，为了保护、照顾他，妈妈决定我和哥哥赶赴保定。为了不惹眼，我们天黑后才动身，一人遮上一顶旧草帽，悄悄地快步出了门，在一位铁路上的朋友的帮助下，搭乘通勤车午夜来到保定。

我们首先去了范姨家，她家是当年爸爸在敌占区工作时的一个落脚点。范姨的丈夫那时是爸爸领导下的交通员，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就



1975年7月于河南许昌(前)李英儒

义的时候，这位叔叔慷慨激昂，大骂不止，被日寇的刺刀挑得鼻开口裂，仍无半点惧色。以后爸爸每当想到他时，心里都难过异常。我每回跟爸爸来保定，都爱住范姨家；这套古旧的房院给我留下许多难泯的记忆。可是现在走进这熟悉的院子，心中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

听说我们来，范姨拉开灯前来开门。望见窗棂纸上映出的颤巍巍的身影，哥哥和我不由得同时轻轻地“呀”了一声，几年没见，没想到精明能干的范姨竟衰老至此！进门后，我一眼发现正屋悬挂的烈士遗像不见了，忙问缘故。“摘啦，”范姨小声说，“你爸爸一不行，他那条线上搞敌工就全成了叛徒了，甭管你活着的死了的。”当夜，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休息，我躺在紧里头听着范姨和哥哥说话。范姨的心情显然也很不好，没完没了地叹气：“……英儒可是个好人呐，你张叔叔去了后，我一个寡妇拉扯着四个孩子，五张嘴呀，都不知道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保定一解放，我就领着孩子们去找你爸，一家人穿的破破烂烂到处打听，赶见到你爸的面，我噙着泪叫了声‘英儒’，嗓子眼儿就给堵住了。你爸见我们娘儿几个成了这个样子，一下子就急啦，当天就找人给我们解决了烈属生活问题……解放后咱也短不了有难处，可好些人进城后当了官，就懒得管咱们了，英儒可不这样……”

天亮后，我们在一处偏僻的房院里，看到了爸爸。爸爸正盘腿坐在床上用扑克牌玩一种简单的算命游戏。我们的来到并未能使他的心情有所好转，只说了声“上阵还需父子兵啊”，便又低下头摆弄纸牌。也难怪，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时，爸爸奉命打入保定，那时组织上怕他暴露，规定除万不得已，一定要深居简出，昼伏夜行。谁料20多年后，他又在保定过上了相似的日子，心里怎能痛快？哥哥出门办事去了，我在一边闲着没事，想起方才爸爸看我时那副“你怎么也来了”的神情，觉得有心要表现表现。于是我操着老练的口气提出想法：为防万一，我看我还是出去看看地形吧。这下倒把他逗笑了：保定的地形还用你看吗，全在这儿（他指了指头）装着呢。告诉你，这里地形不怎样，保定也不是久留之地。

果然，转天范姨便跑过来说，有熟人向她打听爸爸并说已经听到风声：李英儒到保定来啦。

经商量，爸爸由哥哥陪他离开保定，我次日返京将他们的行踪告诉家里。天黑后，我坚持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临行，我习惯地打开灯，想看看行装有无遗落。爸爸过来一把将灯关上，严厉地说：黑着灯屋里瞅外面，开着灯外面瞅屋里，这都不懂！我又一次感到爸爸过去所言不差，自己确有当兵的必要。是夜，我们沿着僻静而弯曲的小

胡同前行，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或紧或慢的声音，“嘎，嘎嘎嘎——”，在这片自古出慷慨悲歌之士的土地上，如今又燃起了武斗的战火。路上，爸爸不断提醒我：靠着墙根走，小心有人顺街筒子放枪。

火车站上没有多少人，我和爸爸呆在候车室外的小广场上，等哥哥买票回来。置身这人们惯常分别的场所，直觉得离乱人的酸楚凄凉阵阵袭来，看一看爸爸那疲惫的面孔，我真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爸爸。”我想哭。

平儿，不要这样！爸爸口气很坚强：记住，人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希望，悲悲切切又有什么用。有机会不妨再读读《基督山伯爵》里最后那段话。你爸今天跑出来，就是为了今后，为了希望，只要留得青山在，谁敢说就没有伸冤、辩白的那一天！

爸爸看了看四下，又说：你今年该十六了，按虚数就是十八，要成人啦，成人不易呀。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出息，可从小学习上还有股狠劲，所以才能考到这保定来念中学。你爸爸发着狠念书，还不就是因为家里头穷让别人看不起，才想争口气吗？记得那年我和你爷爷在村口呆着，过来几个同村的，他们手里捧着火烧夹肉，看见我们故意大声说，吃呀，快吃呀！咱们不吃谁吃。待他们走了，你爷爷才跟我说，知道吗英儒，他们是在笑话咱们呐，等回头你要是念了书，得好好地地上进呀！想一想多快啊，说话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可爸爸现在不是还在挺着劲往前走吗？

爸爸拉起我的手：这次分手，过些天咱们还能再见面，可以后还可能再分手，那时就难说了。要是真的见不到我了，你要坚强，还要争口气，不管往后的日子多难，可千万要走正道啊。

我嗯嗯地点头，竭力不让泪水流出。等哥哥一回来，便匆忙与他们告别了。

三

自从爸爸被“隔离审查”后，一去数载，全无半点音讯。此间仅存的，就是希望，希望多病的父亲能够挺住，熬到和我们相聚的那一天。

记得我懂事时，有一回爸爸聊天

时又说起我们在幼儿园的那个狂风之夜，我忽然问，既然知我不愿去，干嘛还苦苦地逼人家。不料爸爸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忧郁了：要不是为了搞写作呀，哎，你怎么会理解作父亲的心。那天咱们坐在楼梯上，你爸爸是肝肠寸断、五内俱焚啊。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自己带着你，连让你妹妹入托的想法也打消了。

想想爸爸为我所做的牺牲，我又怎能不在思念他的痛苦之后，更品尝到一种痛悔的滋味呢？假若能和爸爸见上一面，呆上一会儿，即使仍旧是坐在寒风之中，我的心境也会好得多。每一天，我都在企盼着奇迹。

也算是苍天有眼，苦尽甘来。1975年夏，爸爸终于获释出狱了。但是爸爸并没获准回家，甚至回家看一眼都不允许，径直被送到河南许昌城外的一个部队农场分场。没过多久，一家团聚在许昌的农场，在那里，大家过了一段诗一般的日子。

天阔地广的农场，从气度上早已超过当年曹孟德的屯田时期，无论清晨还是黄昏，都有令人驻足忘返的景色呈现，且日日无一雷同，难以备述。单是分场宿舍附近，就有享不尽的美韵，果园外，小路边，冲天的白杨三转几转便消失在视野的尽处；更有那房后棵棵成荫的巨柳，瀑布般地倾泻下宛若长发的枝条，轻轻摆动，拨风送爽。煦风到处，是闻不够的花香草气，听不厌的鸟语蜂鸣。更有那些热情、质朴、富于同情心的农场战士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何须有一丝一毫的戒备。其时，麦收刚过，大田一马平川，阡陌直指天际。我们常搭乘农场的拖拉机外出，大家分坐在三四台拖拉机上，轰轰隆隆地行进在田间，声震四野。农场里大大小小十余条狗逢此总要尽数出动，呼前喝后地伴行在周围，它们无休止地在田野中跳跃嬉戏，狂奔时，四蹄腾空，全身展平，引得车上的人发出阵阵喝采的欢声。笑声中，爸爸的精神显得分外抖擞，人也仿佛年轻了不少，坐在他身旁，我分明听见爸爸在朗诵苏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实际上，那时爸的心情并不很好，散步时也常听到他拖着长腔唱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无有杀人刀。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横行，爸爸他含冤

忍辱地在牢狱苦熬了春秋几度，如今人虽出来了，可政治结论上还是给留下了莫须有的尾巴。谁都清楚，只要那帮迫害他的坏人还在掌权，又怎能保证以后不再身陷囹圄呢？

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的一天，爸爸所受的种种诬陷，统统得以彻底清洗。他怀着更大的热情投入繁忙的工作与创作之中，年近七旬的人，每天写作竟达十余小时，这毅力和精力使我感到惊讶。

在他安排的很紧的工作计划里，时常会插入大量新的“写作任务”——为在历史上蒙冤受屈的战友、同事出证明、写材料，其中主要是那些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他说，这些人熬到现在不容易，应该有个着落，踏踏实实过几年安定日子。可他自己的晚年，偏偏就没有一天能够踏实下来。写作几乎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需求。

天道酬勤。爸爸忘我地工作，换来的是一部部作品的问世，一位位战友得以政策落实。但过度的劳作，到底还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尤其最后的两年，基本都是在病房中度过的。

爸爸再度报了病危后，医院要求家属长期在他身旁陪护，因此，全家与病房的医生、护士都混得很熟。护士们常说，兄弟姐妹几人里，唯有我“最差劲”，不知道规劝父亲休息养病。但她不了解我的个中曲委。自打那次我们争论活着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活着（当时我坚持后点），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之后，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但父子间似乎总是产生了一点变化。平心而言，假使当初我们都不那样偏执，爸爸日后对我的看法也依旧会产生，两代人间的不吻合终难避免，只是由于文革的原因中间被隔断了——一个时期，来得较晚而已。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基本属于起床晚、读书少、串门会朋友多、结婚要孩子早之类“以小见大”的琐事，连听说我给自己添置了台洗衣机，他也大不以为然地认为：年年岁不大，人也没病，何必那么贪图安逸。诚然，我确乎没有那种闻鸡起舞、渡江击楫的奋发与豪迈，可也没有像爸爸认为的那样，属于“垮了的一代”。眼看爸爸年事渐高，病况逐步加重，我觉着自己还是少说话多办事为宜。

不意缄口时间一长，爸爸反误以为我比別人更能理解他的需要。那次

他的长篇小说《女儿家》清样打出来后，出版社希望作者校对一遍，爸爸答应后随即要我速到医院陪住，实际是要我在他身边校稿。那会儿爸爸病得已经不轻了，但为了不耽误交稿时间，偏是不让我服侍，只管催我加快进度。我是在爸爸的督阵和护士们的白眼这双重压力下，提前完成任务的。

1989年春节前夕，也就是爸爸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赶到医院替换下陪床的姐姐。此刻外面已是一派节日的气氛，人们在寒风中穿梭往来，忙着购办年货，性急的孩子已经开始零零星星地燃放鞭炮、烟花了。但我们全家却没有半点过年的心情，爸爸已经朝夕不保，临近最后的日子。长期的疾病折磨，爸爸早就枯瘦得不成样子，只有一双眼睛，偶尔还能闪现出些许昔日的神采。如今，他体内各个器官全都不行了，仅只依凭了药物作用，进行着最后一段机械性的运转。连说话都极端困难的爸爸，现在真正为他所拥有的，也就只有大脑了。然而此时此刻纵是神志清醒，除了徒增些痛苦与压力外，又能为他带来什么呢？现实太残忍了，在这人生最后的一站，竟不肯有丝毫的放松。

入夜后，护士撤走了输液的吊瓶，屋里又剩下爸爸和我了。病区原本就很安静，到了晚上更听不到丁点声音。爸爸被病痛折腾了整整一天，到这会儿，刚刚得到一点平稳的喘息时间，因此很快入睡了。

我小心地把爸爸伸出棉被的一只枯干如柴的小腿，轻轻送进被窝，看着他可怜巴巴地蜷缩成一小团的模样，心头一阵悲哀。昔日魁梧的爸爸今又安在？想想儿时，在澡堂里我伏在爸爸宽大的背上，数他身上的黑痣，被他一把搂到面前，放在腿上搓得我哇哇乱叫，那时爸爸是何等的高大有力，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会有今日。

爸爸，就要离开我们上路了，他的确在人生这条道路上走得太多、太苦。一个穷苦农家的儿子，从童年就开始在充满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奋争，为父母、为家庭、为自己，后又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学；从学堂到战场，从文坛到监牢，他闯过了多少沙场的硝烟、运动的浪潮，现在终于跋涉到了尽头。莫非，人的一生都是以悲凉而结束？

约是后半夜时，迷迷糊糊之中我

忽然感到了什么，睁眼一看，爸爸不知何时已经坐了起来。借着地灯的幽幽之光，我发现爸爸强抬着松弛的眼皮，向前茫然地凝视。我一骨碌从小床上下来，忙用毛毯、枕头垫在他的背后。

“蒙老天爷照顾，咱父子俩又算是多见了一面。”爸爸的声音含混不清。

“瞧您在说什么，放心养着吧，您会好起来的。”我明知这种话我们俩谁也不信，可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安慰爸爸。

“我的身体我最清楚，好是好不起来了，你爸一辈子死里逃生多少回了，这回过不去啦，死也没什么可怕，只是有些遗憾。”

我知道爸爸说的遗憾有三，一是有不少东西还没写，特别是原准备写一本个人的回忆录，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安排动笔。二是爸爸一生热爱大自然的山水，但总是忙于写作，没能尽兴游历。第三，也就是爸爸最大遗憾，他觉得没能对父母尽孝道。其实爷爷去世时他方13岁，尚未成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敌占区出生入死地工作。按说即便没有在双亲眼前侍奉，也属情有可原。可爸爸他太重感情了，竟为此自责了一生。

“平儿！”爸爸让我坐在他的床边，说：“咱们好久没在一块说说话了，总是各人忙各人的。今后你将怎样生活，我看不到了，其实守着个人的小家安身立命地过，也没什么不好，个人的路个人走。过去我对你的消沉是有看法，我真心希望你能多过几年艰苦的日子、多受点锻炼，这些你会理解的。那年你出差到南方，在外写信给我说，横跨了大江南北之后，发现自己更爱这个国家了。对你这句话，爸爸深有同感，咱们还是有共同之处的。”说到这里，爸爸有些激动，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你爸爸这一辈子，眉头从没有舒展过一天，苦也吃了，罪也受了。可我还是认为，作人，就要作个正直的



人才好。”

爸爸说话，越来越困难，但他仍然不听我的劝阻，强挺着身子，喘着气一字一句地说：“想我一生，不敬天地，不畏鬼神，不孝父母，纵然坎坷再多，这也是命该如此。你爸爸没有什么可悔恨的，我也决不悔恨！”

我从爸爸失神的双眼中，看到了一种少有的坚定。

一个月以后，爸爸终于结束了他有憾无悔的一生。

有一说，人的一生就是缺憾的一生，弥补了一些，就会出现另一些，弥补了一种，又会留下另一种，总是自古难全。爸爸过世之后，我总不免想起过去的桩桩件件，这才发现缺憾之感萦绕心头时，一切的一切，挽回都已成为不可能的了。既然脚下的路尚未走完，我想，或许也只能像爸爸那样，把缺憾扔在后边，争取多做些不至悔恨的事情。

（责任编辑：张蕾）

· 欧战风云中的

萧乾

· 傅光明

1939年初夏的一天,作为香港《大公报》记者的萧乾,风尘仆仆从中国军民为抗日用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赶回香港。在等待他处理的诸多来信中,有一封来自英国,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请他去当中文讲师的邀请信。

萧乾问过朋友,觉得对方的条件太苛刻,年薪仅有250镑,而且只签一年的合同,本想回绝。让《大公报》老板胡霖知道后,找到萧乾说:“眼下欧洲形势日渐紧张,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大战爆发只是一朝一夕的事。我看你该接受邀请,借教书的机会,可以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你就当是《大公报》设在那儿的棋子吧,多写回些通讯报道回来,怎么样?”一席充满温和亲切的睿智话语,当即帮助萧乾下定了决心。

好事多磨,临行前,萧乾的公寓被窃,换好的英镑、法郎全被偷走。幸运的是,赴英的护照及各种证件还在。胡霖安慰萧乾:“别着急,破财免灾,路费嘛,报馆给你再补一笔,到英国勤写点稿子就都有了。”胡霖的话再次给萧乾带来希望和信心。

1939年8月31日,萧乾只身踏上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奔赴战云笼罩的欧洲。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动身的第二天,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大批轰炸飞机突袭华沙。英法继而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更没有想到,第一次离开祖国,就是遥遥7载,尝够了思乡之苦,眷故之切。尤其没有想到的是,他会作为欧洲战场上少数几位中国战地记者之一(以前,人们总认为萧乾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事实上,当时还有几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记者生涯。

10月,萧乾抵达伦敦。第二天,他就来到因战争爆发由伦敦疏散到剑桥的东方学院。他的课并不多,每礼拜只有几节,这使他有时间去旁听别人的课。他特别选了著名政治家拉斯基的课为以后回国为《大公报》撰写大量深刻、敏锐的国际性政论社评,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剑桥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城,古迹遍布,晨曦中一座座中古世纪的钟楼,披着旖旎的薄雾,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萧乾总喜欢在清新晴和的早晨,骑上自行车,穿行于头顶黑方帽,身披黑“道袍”的学生们中间。他还常常独自一人驻足剑河畔,谛听那静静的流水声,沉浸在诗一般美好而古老的气氛里。他忘掉了战争,忘掉了离别惆怅,忘掉了尘世间一切的痛苦,仿佛变成一幅文艺复兴时代油画里的主人公,默默诵读一首弥尔顿的诗歌。

剑桥大学学生会每周都要组织一场学生辩论会,萧乾第一次参加,正赶上辩论“英国应不应该援华”。来自中国交战国的日本人极力主张不要援华,使坐在旁听席上的萧乾非常气愤,真想冲上台揍那人一顿。《新政治家与民族》的主笔金斯莱·马丁的辩论,给萧乾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位满头白发,身材高大,富于正义感的英国人,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积极主张英国援华。在这之后不久,萧乾结识了马丁。

转眼到了1940年元旦,学校放了寒假。萧乾从剑桥来到伦敦。伦敦是有名的雾都,漫步街头,恍如置身浓浓的云海之中。此时,萧乾无暇欣赏这缤纷绮丽的伦敦雾,径直来到座落在一所教堂附近的中国驻英大使馆,会见郭泰祺大使。从大使那里萧乾得知,中国的抗战一爆发,就有一批热爱中国的英国人士成立了援华会,他们一方面为中国募捐,一方面到英国各地宣传中国的抗日。会见后,萧乾找到了援华会的秘书乌德曼女士。从此,萧乾成了援华会的委员,经常参加援华会组织的宣传演讲工作,向英国人民介绍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抗日业绩。

1940年4月,萧乾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战时中国文艺”的演讲,后扩充为第一本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萧乾在英国7年,共出版过5本英文著作。

5月10日,力主抗德的丘吉尔取





1945年9月，萧乾登上阿尔卑斯山，喝了杯啤酒。

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英国从此转入紧张、顽强的反法西斯战争。

7月，丘吉尔政府为求得一时安宁，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封闭中国西南交通命脉滇缅公路的协定。针对这一作法，萧乾随援华会到英国几个城市进行了关于滇缅路的宣传演讲。

8月，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逝世。在英国笔会纪念泰戈尔逝世的大会上，英国小说家福斯特代表英国，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代表苏联，萧乾代表中国致词悼念泰戈尔。这次会上，萧乾结识了福斯特，几天之后，福斯特致信萧乾，约他去一个俱乐部吃便餐。他们很快成为朋友。不幸的是，这场难得的中英文学友谊最终因政治原因而以悲剧结束。

9月15日，德国空军出动1700架次的战斗机、轰炸机袭击伦敦，英勇的英国皇家空军升空迎敌，机枪声、爆炸声响彻云霄。刚随东方学院由剑桥搬回伦敦不久的萧乾，正好遇上这场旷古罕见的“鹰”日空战。两国空军在伦敦上空激战，丘吉尔和德国空军司令戈林也在进行一场较量。最后，德国放弃了攻击英伦三岛的计划，但空袭仍是昼夜不断。德国的轰炸给伦敦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灾难，伦敦人的精神却依然那么坚定、乐观、自信，以幽默的态度、英雄的壮举对待战争这个恶魔。萧乾亲眼目睹，一座平民住宅倒下坍塌，十个壮汉硬是用胳膊托起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抱扶老幼；一个戏班子巡行2000多里为军队作义演；

一位年近七旬的义勇救护员，为救邻舍，失去了右眼；某防空壕里，竟有个四岁的管理员；伯明翰一位不露姓名的怪善人，沿着几条穷巷挨户往信箱里投金镑票；布瑞斯陀一个老樵夫，每周末把工资中剩出的十先令交给红十字会。最使萧乾难忘的是，二十世纪欧美最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艾略特，也在那炮火轰炸的日子里做起了防空巡逻员。每当空袭警报一响，他便挥起小旗，疏导人们有秩序地下防空壕。

在大轰炸的日日夜夜，萧乾始终同英国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英国人的自信幽默深深感染着这个时刻挂念自己祖国命运的炎黄海外赤子。他在最漆黑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微笑的伦敦，残梁断壁上到处飘扬着饱经风霜的国旗；德国飞机撒下的希特勒劝降演词，成了募捐的工具。红十字会把它们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在威尔士某地，行市每张贵到五先令。后来买者太多，幽默的英国人为发起了“一便士一看”，集资全给军队；缪拉·海斯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常在市中心的国家艺术馆举办一种“午餐音乐会”，入场券只一先令。外面不时传来飞机丢下炸弹的轰鸣，里面的人却一面嚼着夹肉面包，一面神情自若地静听悠扬的舒曼的室内音乐。这种战火下的闲情逸致，这种英雄的民族性格，是任何一个民族永远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12月29日，萧乾到朋友家去度周末。外面拉响了防空警报，萧乾刚来得及躲到底层的楼梯下面，寓所就中了烧夷弹。随着一声巨响，整幢大楼摇晃起来，楼板一块块往下掉，玻璃碎屑四溅，火光腾起，浓烟弥漫。萧乾感到难忍的窒息，他想借着火光往外冲，可无情的烈火完全封死了窗户、门洞。他慌了神，一时竟忘了喊叫，他感到绝望，命运之门的钥匙握在了上帝手中。这时，浓烟中闪进一个人，急切地喊问：“有人吗？”“有！”萧乾的回答全然出于一种本能，他被烟熏得快晕过去，仿佛已从崖端往下坠落。

来人很敏捷地循着声音摸到萧乾，背起他就往外冲。萧乾紧闭双眼，直到感觉一股清新凉爽的空气沁入心脾，才睁开眼，发现背他出来的人竟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民防队员。萧乾的眼睛湿润了，他紧握住那人的手，一时说

不出话来。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调动百万大军，对苏联实施闪电进攻。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对日宣战，英国官方及私人宣传媒介开始关注站在反法西斯前线、全民族投入抗日的中国。萧乾也一下子由普通侨民变成了伟大的盟友。他由衷感到，个人命运是同民族的荣枯兴衰息息相关的。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开始约请一些驻伦敦的盟国记者用母语向本国听众广播，内容是关于欧战局势和英国的战争努力。英国广播公司远东组组长，著名评论家乔治·奥维尔写信邀请萧乾对美国人和印度人做中国抗战及文学范围内的专题广播。那是一段令萧乾兴奋不已的日子，他是在向国际社会传播着中国的声音。

1942年夏，由阿瑟·魏理和福斯特推荐，萧乾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颁发的学术奖学金，离开东方学院，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成了英文系的研究生，专事意识流小说的研究。东方学院远东语文系在年终报告里不无遗憾地提到：“中文系唯一的变化是萧乾先生的离去，……本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惋惜，……他对本院及为中、英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丝毫不逊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成就。”

1944年在南德巴伐利亚州滑雪(穿的是随军法军制服)。



剑桥是座迷人古朴的城市，它最古老的建筑圣玛丽教堂建于1120年。萧乾所在的皇家学院，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他所住的公寓楼建于15世纪，房间宽敞明亮，整齐的书架，堂皇的壁炉，更衬托出几分高贵。推开窗户，是一片碧绿的草坪，正与赫赫有名的皇家学院教堂遥遥相对。整整两年，萧乾养成了一种习惯：清晨，捧上一本小说，不时望望草坪上被晨曦拖长的教堂影子冥思默想。黄昏时分，则沉浸在唱诗班清脆悠扬的歌声中，领受宗教的庄严与神圣。

1943年底，胡霖随中国访英代表团抵达剑桥。这位第一次大战期间采访过巴黎和会的风云记者，根据当时的战局，敏锐地判断德军在苏环节败退，已坚持不了多久，英、美盟军在西线转入反攻为期不远。他劝萧乾放弃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离开剑桥古雅的校园，去当一名职业记者。他说：“我就是要把你从艺术象牙塔里拉出来。这可是天赐良机，我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回机会轮到你了。问题是你还迷信什么学位，当个无声无息的学者呢，还是趁此时机去做战地记者大干它一场？”萧乾陷入了思索，他从心底反对战争，向往自由，渴望和平，但现实世界充满了矛盾，自由、和平的获得，往往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每当他走过伦敦国家美术馆时，就不禁自问，如果没有纳尔逊特拉法加尔战胜拿破仑海军，会有今天的国家美术馆吗？当一名记者，不是正可以实录风云，揭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创伤吗？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他发现，尽管詹姆斯·沃尔夫、乔依斯都是天才的小说家，但他们对意识流小说的探险是一条充满迷彩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萧乾天性活泼、好动，打青年时代起，理论总是叫他头痛心闷。他更愿意到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采访人生。他终于接受了胡霖的忠告，于1944年6月盟军准备诺曼底登陆，开始西线大反攻前夕，在英国报界云集的舰队街，开设了《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

萧乾由舰队街向《大公报》发回大

量特写，向祖国的读者报道战争进行的最新情况。但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只给伦敦带来片刻的喜悦，这喜悦很快就被希特勒耗尽血本最新研制的V₂飞弹的轰炸淹没了。经过1940年大轰炸的萧乾已不象上次那么恐惧，虽然这次轰炸比上次造成的损失、伤亡大得多，他照常到舰队街的《大公报》办事处上班，有时甚至爬到高处，眼看那发出刺耳声音的飞弹落下来，完好的房屋顿时化成瓦砾。

V₂飞弹挽救不了希特勒。1945年3月，盟军逼近莱茵河。就在这个时候，萧乾申请获得了随军记者的资格。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军装。军装是美式的，土绿色配上一顶软帽，一双发亮的高筒马靴，威武、潇洒。肩章上用金丝绒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的字样。证件背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按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待遇。

萧乾是乘一条只能容纳25人的空军营救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当时，海峡中漂浮着不少水雷，还常有纳粹潜艇出现。萧乾坐在船尾，紧依着一颗对付潜艇的深水炸弹，心中不时漾起一丝紧张，紧张中又洋溢着兴奋。浴着三月凛冽刺骨的海风，小船破浪而行，终于安全到达法国东海岸的迪埃普港。这时，美国帕其将军的第7军已向莱茵进军。为赶上队伍，萧乾匆匆由巴黎赶往南希，后搭乘一辆大卡车，开抵萨尔古曼。一路上，朱红色的丘陵此起彼伏，公路宽阔平坦，密绿的松林葱葱郁郁。但一车车狼狈的战俘，衣衫褴褛的难民，将这美丽的自然景观笼罩上一层黑雾。整座城镇被炸得只剩几片断壁残垣，击毁的坦克车下，堆满了牲畜和人的尸体。盘根错节的大树残枝断臂，宛如远古时代的石雕。正当萧乾随美国第7军装满黄色炸药的车队，准备参加莱茵河大桥争夺战，然后去东岸采访的时候，突然接到胡霖的电报，要他火速赶回伦敦，去旧金山采访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萧乾36小时内办完护照，由伦敦出发，乘“新希腊号”轮，出格拉斯哥港，汇同一支庞大的船队，横渡纳粹潜艇仍不时出没的大西洋，抵达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港，而后经魁北克、蒙特利尔、芝加哥，横穿美国中西部数州，到了旧金山。

联合国大会盛况空前，旧金山的大旅馆都成了各国的临时政府。莫洛托夫、艾德礼成为各国记者注意的焦点，中国代表团的董必武也很引人注目。大会期间，萧乾把一则关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赴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独家新闻”，抢先拍回重庆，令国民中央社丢了脸。萧乾在美国呆了六个多星期，又匆匆赶回伦敦采访英国大选。

1945年7月，英国大选刚一结束，萧乾就急着赶往柏林采访波茨坦会议。10月，再由伦敦赴法兰克福，后经维尔茨堡，到纽伦堡，采访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纽伦堡关押着包括戈林、里宾特洛夫在内的23名纳粹战犯。萧乾访狱时，透过门上的小洞口，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戈林，坐在一把大椅子上，虽显得很疲惫，眼里却依然闪出一股犀利的凶光。萧乾感到压抑，感到郁闷，更感到历史的绝妙讽刺。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缓步走出监狱大门，望望蓝色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不禁由心底发出一声慨叹：人类的浩劫常是由几个丧失人性的家伙制造的，但他们终于逃不脱历史的公正裁决。

1945年底，胡霖致信萧乾，希望他尽早回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不久，又去一信，要萧乾离英前去趟瑞士。瑞士之行是萧乾向欧洲的告别旅行，他拜谒了詹姆斯·乔依斯的墓地，并为瑞士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所陶醉。

1946年3月，归心似箭的萧乾在伦敦登上“格林诺高”号货轮，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乾以他那支神奇多彩的妙笔写下了许多真实报导欧战及战后欧洲实况的特写，被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几十年风雨过后，这位已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每日伏首在那张零乱的写字台前，把岁月的沧桑、深沉的眷恋和睿智的思考，抒写成一首首文字的乐曲

(责任编辑：张蕾)

在北京天桥小戏园子唱戏，真是长知识、见世面，也招龙引凤啊！著名教授侯仁之、吴组缃，以及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还有赵树理先生等，那时，都深入到社会底层，向民间艺人学习。他们带着学生看天桥小戏园子，听小戏棚子里的说书，看什样杂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还带学生来我住的小房子参观。他们发现我窗台上有一排小人书，觉得奇怪，便问：“凤霞，你摆这么多小人书是……”我看出侯先生不明白，说：“这书是我看的。”侯先生惊奇地说：“怎么，你看小人书？”我说：“是，因为我不认字，不会看字书。”侯先生很同情我，说：“你爱书，好。努力学习认字吧，我相信你会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好演员。你戏演的好，你是能吃苦的，只有刻苦才能做出成绩来。”我说：“谢谢侯先生，我知道自己愚昧无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后来，侯先生派学生给我送来几本看图识字的书，“一”字伸一个手指，两个手指是“二”字。这时我才算接触了字书！心里感到豁亮多了。

老舍先生也发现我爱看小人书，而且，我看了小人书后，能成本大套地讲给人听。老舍先生夸我讲的有声有色，他送我铅笔和白报纸本让我学写字，我不自信，说：“您看我这样的人还能学会写字吗？”老舍先生笑了，说：“能，你就大胆放开手写吧，等你练好了字，我相信你不但能看书，将来还能写书呢。”这话我当时听着只觉得是前辈鼓励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自小立下志愿，要做个好演员，我做到了。现在一定要学会认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开始刻苦地学习。我是戏曲演员，我的艺术是从传统宝库中得来的，从小人书中看到的形象，有的我相信，也有的我不相信，我从小就有自己的判断力，重要的是知己知彼。看小人书，我能边看边猜出字来，先是猜出名字，后来能猜出故事解说，再一步一步地从简单笔划的字，猜认出笔划较多的字来。同时我练习记下人名，时代背景，故事梗概。在看小人书的同时，边对照自己写的字对不对，虽然有时写的很可笑。小人书看多了，戏也演的不少，人物在脑袋里混成一团，我就自己练习写着短小的句子，

我和书

新凤霞

如：“张飞娶了潘金莲”，“霸王教武则天耍剑”，“红娘见梁山伯下拜”，简直驴唇不对马嘴，但我是为了练习用笔写字。

再进一步了，我开始看剧本练习认字。一出戏口传心受后再看剧本中的字，这时就感觉容易多了。人家看剧本很快，我看剧本慢得要命，而且随时随地抱着剧本，看破了皮再用报纸包上。可是我很开心，一本书我居然能看下来了，有多好哇！于是，我开始抄剧本。可是，很多字认不得也抄不下来，我不管，能抄下的抄，不能抄的也抄。那时，我练写字没有纸，都是在报纸边上练习，或是用滑石趴在台阶上写，总之，哪里能写我就在哪里写。父母、二伯母看见了就骂我，还常被二伯母没收了铅笔和滑石，但是我仍旧不间断地写。

从记事起我就渴望追求知识，想学认字，但家里太穷没有钱上学，每当看到我年龄相似的财主家小孩，背着书包，由老妈子、“下人”护送去上学的场景，我心里就会难过。那时，我看到财主家大宅门儿里的少爷，上学堂，总是由佣人李二把自行车推出来，车座子后头的架子上用带子绑好一摞书。我问李二：“李伯伯，你们少爷怎么上学不背书包哪？”他几次把我推开不理睬，我心里纳闷，天天看见少爷接过车骑上就走了。一次我在过“五月节”时给路家做小工，包粽子时，便又凑上去问那位不好说话的李二：“李伯伯，你们少爷上学怎么不背书包呢？”李伯伯说：“少爷是

上大学，不背书包，车座后架上就是书。你不懂，学那书可深了。”我听了心里更闷了，又看见李伯伯推车时，瞧瞧四下没人，便悄悄对李伯伯要求说：“能让我摸摸架子上的书吗？再细看看吗？不用力。”李伯伯看看我说：“行啊！摸摸书可以。反正你也不认字，可是你手脏不脏？”我伸出双手给他看，可是这时少爷出来了，叫着：“李二，车擦好了吗？”李伯伯说：“好了。少爷！”少爷接过车飞快骑上走了，我眼巴巴地看着却没能摸一下，望着路少爷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那个后悔呀！要是不问李伯伯就去摸摸书那就好了。那是多么深的高级书啊！

我没有书，我对书有一种神秘感。家里只有一本皇历，里边有很多图。父亲也不认字，可是他能看着图讲解：“这是说几龙治水，看看，这不是五个龙头吗？这是合婚用的夫妻反相，如：“天龙犯地兔，白马犯青牛，猪狗不到头，鸡配鼠夫妻哭……”12个属相都画着一对对的反相不许婚配。每年都要买来。还有节气，秋收、春耕、冬至、大寒、谷雨等等，都有图解。我是常常看着这本书，不明白除了这本书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书。大伯父有文化，可是他的书不许女人摸，说是：“如摸了书，圣人会恼怒，女人不干净啊！”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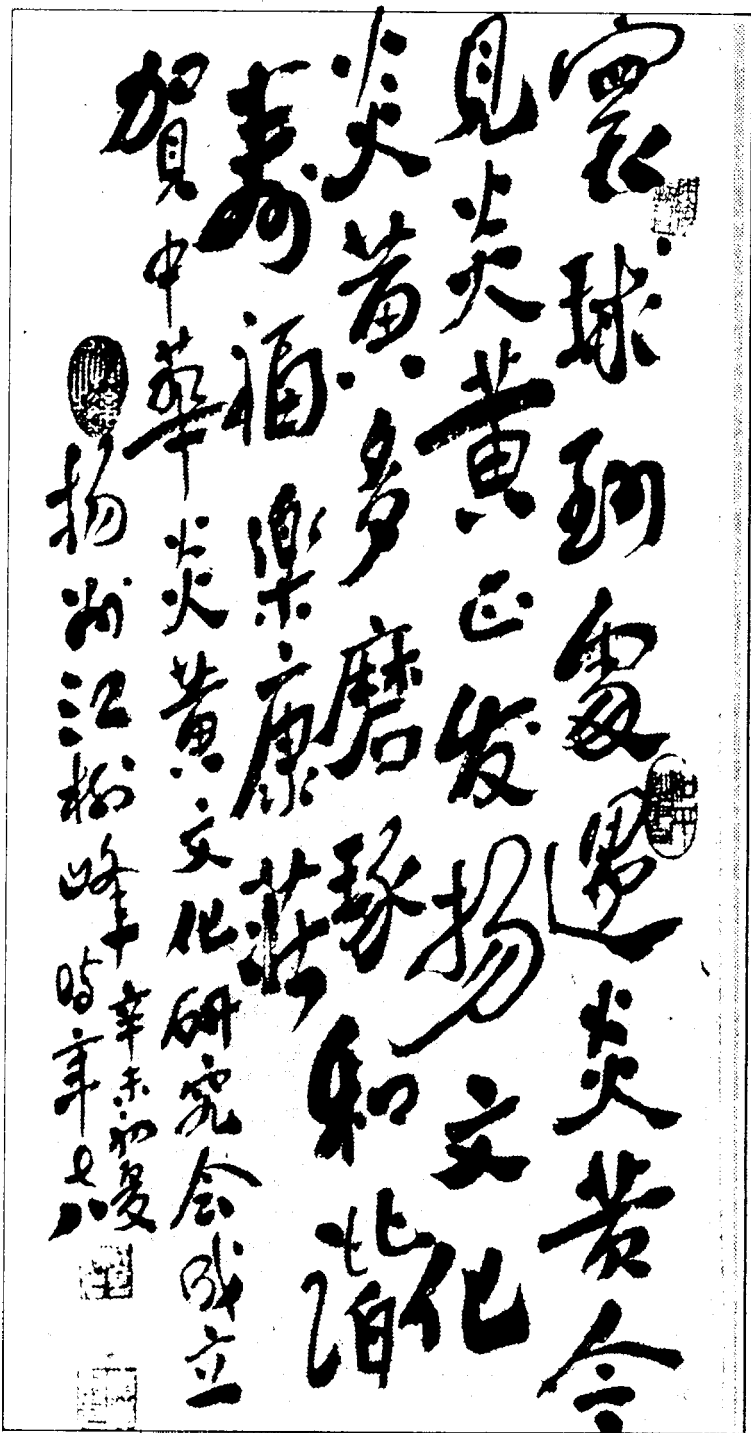
大伯母同情我，便偷偷地给我看一本书，这是日本书，上边有小人、百花草，一个图，一个字，就是看图识字。大伯母说：“小凤，这本书你拿去，明天一早送来，你大伯连我也不许摸呀！”我高兴地如获至宝，边答应边把书揣在怀里。大伯父住在南关下头，我要回到南市够远的，边跑边走，走一会儿拿出书来看看。天阴了，说是秃尾巴老李生气了，不许女人认字。雷声、电闪、大雨瓢泼，我低着头，顶着雨，生怕怀里的书淋湿了，又怕掉了，我扎着腰带双手捂着胸跑，等跑到家，书也淋得湿透了。我不敢跟大人说，蹲在炉子旁边烤。干了更糟，又皱又硬，颜色发黄。这可怎么办？我恨自己没有看书的命，第二天来到大伯母家，进门不敢说话，盼着大伯父出了门，轻轻地拿出书来交给大伯母。大伯母一看就火了：“小凤啊，你这是得罪了孔二爷呀，要读书认字，

你得先拜孔二爷！”说着，抓着我跪在孔圣人的画像前，又狠狠地抓住我的头向下磕。大伯母又教念咒：“孔二爷呀！您老高抬贵手吧！赏给我小凤识几个字、喝一口墨水吧……别叫我当个睁眼睛了……赐给我一支笔吧！”从此我看见字书、报纸，都先默默地在心里说：“孔二爷，我谢谢你让我看字了……”

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每个阶段都是眼看“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却“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都是看书、写字得来的支持。

我从小就唱戏，风风雨雨中跑来跳去，是个不甘寂寞的野女孩，养成了时刻都闭不住的习惯。丈夫知道我，生病后，他提醒我看书、写字，并为我布置了适合学习写作的环境。开始我不知如何写，他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就像你唱戏一样，放开手，大胆写。”我果然开始写了，像我唱戏那样，要求亲切真诚，叫人家爱看；像爱看我唱戏那样。我唱戏情真意切，鲜明通顺。唱戏不矫揉造作，学写字也一样要诚恳质朴，如同亲人谈心谈话。

艺术都有共性，我学写字也是一样，节奏鲜明，强弱对比。主要还是有意无意会把自己带进书中、戏中去。我不会用词汇来描写，也不会如何作纲要、结构，可以说什么也不懂，但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耳听眼见的真人真事。从1980年出版第一本《回忆录》，直到今天，我已写了近三百万字了，废品也不少，出了五本书；今年又有两本《新凤霞说戏》、《新凤霞唱腔谱》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戏剧出版社出的《新凤霞唱腔选》有曲谱，还有我设计唱腔和科学发声的研究文章。《我当小演员的时候》、《以苦为乐》等都是写幼年学戏演戏的情况和生活经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从看书到写字，每个阶段自己都没有空度。台上作戏，台下作人，不图名追利，争个落落大方，作个靠得住、信得过的人。叶圣陶先生说：新凤霞是个“旧社会的戏曲艺人、新社会的写书人，是空前绝后了。”因前辈戏曲演员都从小学戏没有上过学，没有一位自己能写出书来的，今后都是学生出身的戏曲演员了，再没有文盲了。这是长者给我的鼓励和鞭策，我



自己每个阶段都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苦钻苦练的事，不抄近道，不赶时髦，不做脸红事，苦熬了三十多年，今天的光景才好，写到这还是要再唱那句词：“大好年华正读书”。

能有今天，我还要感谢恩师老舍

先生为我介绍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书呆子丈夫吴祖光，并为我们主婚，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认点字以至读书和写书。可惜老舍先生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含恨离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我领路的老师。

郭凤莲和她的先辈

杨永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她开始淡忘,只是偶尔提起她。新华社1991年11月16日向国内外发出通稿:“原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于11月15日重返大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并兼任中共昔阳县委常委。”该消息发出3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有幸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寨,踏上了虎头山,在村民委员会前的大槐树下见到了上任不久的支部书记。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情绪很好,又深沉了许多。

郭凤莲是1980年夏天从大寨卸任后,她曾在榆次的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任职,之后来到昔阳县公路段任党支部书记。她有两个男孩,丈夫也是大寨人,原是昔阳县武装部副部长,现在昔阳县公路段开车,享受干部待遇。

郭凤莲是武家坪人,两岁半还未断奶,母亲去世,被姥姥抱到大寨。姥姥是烈属、五保户,刚强,勤劳,乐善好施。谁有困难总爱帮一把。她就是在这样一位老人怀抱中长大的。1961年小学毕业后,她在大寨幼儿园当过两年幼儿教师;大寨遭灾后,姑娘们凑在一起成立了“铁姑娘队”,她是其中一位活跃分子。她聪明,爽朗,也能吃苦,还有一副好嗓子,被称为大寨的“刘三姐”。

村民委员会的大槐树下留着她的足迹,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洒下了她的汗水。但是,翻遍她的历史,恐怕难以发现她有什么超乎一般大寨人的杰出经历和贡献。她是随着一个被神化了的大寨,走上了后来人们都熟悉的那个高度——那个时代好象特别青睐这样的女孩子。

当她戴着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公社党委委员和县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直到中央候补委员……这样一顶顶举足轻重的头衔,走上讲坛时,她恐怕没想到过手里那一篇篇讲话中的一些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

先进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出类拔萃的英雄,没有与生俱来的美德和超群的智慧。可这一切都被那个时代颠倒了。树成为典型,就要封官晋爵,而且是身兼数职,却不注意培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工作能力和思想理论水平。这是一大悲剧。

“想起过去,我总觉得像一场梦。1973年组织上让当书记,我不想干,怕挑不起来。那时,支部一班人辛苦呀!可路线错了,劲也就反了。重新认识大寨时,有人给我写信,说有人在报纸上的照片上,给我画了副眼镜,便被说成是反大寨,被打成‘反革命’,怎么能这样搞呢?再这样,学大寨就更完了。现在大寨比过去好多了,特别是推行责任制后,有了自主权,生产搞活了。我哪年都回大寨,就是不回去,在昔阳,在榆次,走在街上,坐在车上,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比过去好。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大寨近10年来,全村的人



现任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均收入从1987年的不足200元上升到1990年的710元。过去大寨人说:‘站在虎头山,眺望天安门’,那不过是个理想,有的社员连省城也没去过。但近几年大寨有60多位农民走出虎头山,到北京自费旅游,喊了30年的‘眺望天安门’终于成为现实。”

谈到任职后的打算,她说,过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很关心,周总理来过3次,邓小平来过2次,很多首长经过这里还来看望。我们还是要发扬周总理倡导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大寨精神”,把这个传家宝攥住不放。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为群众办些实事。具体讲,就是要达到“双千”,即粮食亩产达到一千斤,人均收入上千元。还要建个草编厂和枣林。前面的路困难不少,但只要 we 解放思想,真抓实干,目标一定能实现。

郭凤莲很忙,我去的当日上午她刚接待了一批日本友人。我本想用我的车把她送回县城,她说晚上还有会,并嘱咐大寨乡人大常委会主任冯卷云同志陪我转一转。于是,我踏上虎头山,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又世人皆知的小山,在那里,安葬着陈永贵同志的骨灰。

二

陈永贵于1915年出生在大寨村的一个雇农家庭。他没有进过学校,文化程度不高。1955年,他以带领村民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出色成绩,被选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4年,毛泽东主席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陈永贵本人也随着“学大寨”运动,逐步登上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文革”中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至于他的官运,陈永贵曾说:“我当上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我这个大老粗,有时批文件都有困难,后来,我提出了‘三三制’,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大部分时间到基层毛

贾进才老人，今年83岁，体重不到一百斤，有点驼背，干巴瘦小，满脸皱纹。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那模样好像一阵风就能刮倒卷走。我握着他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感慨万千。有多少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他们的总统、总理凝视、握过这双手，已记不清了。在他记忆中珍藏着的，只是毛主席握过这双手，周总理握过这双手：“老贾呀，这是出大力的手，这是大寨人的铁手呀！”

贾进才，这位大寨党组织的奠基人，大寨老中青三辈党员近四分之一是由他介绍入党的。这位老党员，即使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里，和地上庄稼人一样，既没飞天，也没坠落。今天他退休养老了，每月村里给60元生活费。屋内陈设除一个土炕外，还有一台彩电，一个立柜和一张桌子，其余就是一排放满照片的镜框。交谈中，老人讲了一段大寨历史。

大寨是合作化后第二年冬天开始开沟的。先是驼沟，然后是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小北峪沟、狼窝掌。狼窝掌是大寨最大的一条沟，连开两次都失败了。大寨人没泄气，硬是和这“穷风水”上了。最惨的是1963年那场洪水，暴雨连着下了七天七夜，五六百斤的大石头冲到沟口，碗口粗的苹果树根朝天，吐着红缨的玉米倒挂在坨坎上，60%~70%的窑洞塌了。但是，大寨人还在，大寨人的志气还在！

“那时候，我们上下工都不空手，上山时挑粪；天黑了，先把牲口赶下山，再挑着石头回来建房。吃罢饭再干，先是用汽灯照明，后来有了电，就把电线拉上山，每天干到十一点多钟。到收工时，有人一头栽到地上就呼呼睡着了。外村人说：“大寨人比牲口还累呀！”

我知道贾进才讲这段话的真实意思，它也确实说明了一点：“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寨人只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责任编辑：仲文）



作者在陈永贵同志墓前的留影

主席听了很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他还多次对人说：“周总理可真是个好入，你心里有什么事找他一谈，就痛快多了。我在中央工作时，总理老是问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曾安慰他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他在党的十二大落选后，每月领取200元人民币生活费，房租，水电费全由国家报销，并配有专车。

赋闲的日子，陈永贵并不习惯。1983年春，他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搞点调查研究，重新进行学习。后来，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陈永贵有3个儿子，1个女儿，除小儿子在北京外，其余3个都在昔阳县工作。第一个老伴李虎妮“文革”中病逝了，后来的老伴也是昔阳人，庄稼院妇女，一直住在北京。我在大寨见到了陈永贵的住房，一栋座北朝南，东西开门，门窗紧闭的三间瓦房。西门框上钉着像大寨所有人家一样的合金铝制式门牌，号数是“088”，挂着一把“东升牌”锁头，东门是“089”号，挂把生满黄锈，怕是只有斧头才能对付得了的锁头。玻璃窗里面糊着纸，偶或绽开一角破洞，又露出里面挂满灰尘的白布窗帘。西门右屋檐下悬吊着一把锄头，锄板已磨得像用过一半的一块肥皂模样了，像锁头一样锈渍斑斑。

1985年9月12日，陈永贵因晚期肺癌住进北京医院。临终前，他对守护在身边的老伴说，我知道我不行了，今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到你身上了，你



作者(左)与老英雄贾进才等合影

把孩子们管好，让他们走正道。还对儿子明亮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国家出力。

1986年3月26日晚8点25分，陈永贵病逝。新华社随即发了消息，称陈永贵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说他“为改变山区的贫穷面貌，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他的“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更称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我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据了解，陈永贵逝世前曾交待过，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安葬在自己曾经开垦过的土地上。今天，他“生从大寨来，死回大寨去”的夙愿已经实现。我看到在他的墓上放着春节时献上的花圈，墓碑正面恰好将大寨全景尽收眼底：层层梯田、片片果林、幢幢“大寨楼”。顺着山坡下去，径直来到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老英雄贾进才的家。

1991年9月到12月，一位澳籍华人画家的巡回画展，再次在中国引起轰动。这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第四次巡回画展。

1985年4月，应《光明日报》邀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200 袋鼠图》首展式时，他的名字就为中国画迷们熟知。到了1987年，他应中国八大城市的邀请来参加巡回画展时，所到之处，均成为新闻热点人物。

姚迪雄，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然而，当这个名字被美国马基斯出版社收入权威性的《世界名人录》之后，当这个名字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之后，这个普通的中国名字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东南亚、在澳洲，这个名字仿佛成为某种象征，被成千上万个画迷簇拥着、追随着、崇拜着。它和它的主人，以及风格独特的《200 袋鼠图》，一次次在海外画坛激起强烈的冲击波。

当他在武汉举办画展时，笔者采访了他。姚迪雄43岁，身高1.80米，外表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逆境中拼搏出来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流露出一个个才情纵横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著和对生活的挚爱。

伟大的艺术家都是经历过苦难的，经历过苦难的画家不是用笔作画，而是用心作画，因而他们的画才有了灵魂。

姚迪雄就是这样在一个在苦难的磨砺下走向成功的艺术家。

1949年，他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疆伊宁市。他父亲是汉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因而他又叫谢尔盖·伊万诺夫。

伊犁是盛产中国名马的地方，李白的诗中曾赞美过伊犁马。童年的姚迪雄记忆最深的就是马。每天早晨他总是被马的嘶鸣声唤醒，起床后看到的第一幅画就是草原晨曦下奔驰的骏马。那雄姿勃发、威风凛凛的骏马，给童年姚迪雄的血液中注入了英气、豪气，也使他迷上了这种“天马”。没事的时候，他就一个人静静地观察、欣赏马的运动和结构，五、六岁时，他被父亲扶上了马背，到了12岁，他已经能大

走进

《世界名人录》的

流浪画家

姚迪雄

● 沈泓

胆地骑在马背上飞奔了。

在迷上马的同时，他还迷上了绘画。那时，他姐姐画小姐、丫环，他就画张飞、关公骑马飞驰，但更多地是画马。很快，他便成了伊宁农四机子弟小学的“画坛五杰”之一。12岁的时候，他临摹的一幅徐悲鸿《群马图》在学校的绘画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初中毕业时，姚迪雄立下当画家的宏愿，他报考了艺术学校。然而，政审却没有通过。父亲是个旧军人，母亲又被戴上“苏修特务”的帽子，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只配送到农垦连队去劳动改造。那年，他15岁。

厄运使他悲伤，但他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冷眼和训斥声中他发现了与命运抗衡的武器——画笔。他利用每天中午别人在田野上打盹的半小时画画。一本《动物画技法》被他在15年中临摹了几十遍，终于，在29岁那年，他的一幅版画作品《阿肯弹唱》被西北五省版画联展入选参展。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艺术潜能。小小的成功没有使他陶醉，他又将目光投向另一片遥远而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亚。他要到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土地上去开创崭新的事业。

二

1979年秋，每当夜幕降临，香港的一条小街上就会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行色匆匆地走过去，敲开一家富商的门。一小时后，他走出来，又行色匆匆地向另一条街走去，去敲开另一个家门。

这个人就是姚迪雄。在赴澳大利亚客居香港的几个月中，他萌生了在香港主办“新疆画家联展”的念头。但是，自办画展需要2万港币的经费，他

手头却只有3千。为此，他拚命工作。每天上午，为画商画画，下午为画展画国画，晚上还要去教学生。七、八个学生分住在城市的各个地段，为了省钱，他从不乘车，全靠两条腿走。三个月中，他穿坏了三双回力球鞋。

就在这时，他的母亲被诊断为晚期乳腺癌。他自己的左胸部也出现一个肿块。朋友劝他住院开刀，他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倒下呢？不办完画展，我绝不进医院！”他又拚命干了三个月，直到画展如期开幕。

在这艰苦卓绝的三个月里，他拿出在农垦连队劳动改造时挑大粪、根治盐碱地时的干劲，不仅坚持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还画出了三百多幅国画。他形销骨立，1.80米的个头，体重竟降到61公斤。

画展在香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香港人被他们那种完全陌生的、西域的粗犷豪放气势和神秘的气氛吸引了，征服了。当香港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沈殿霞女士采访他的实况，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后，各种报刊纷纷报道，称之为“香港美术界的一次地震”。

就在电视台播放沈殿霞女士采访姚迪雄的节目时，姚迪雄的母亲却倒下了。她是拖着病重的身体，强撑着走到走廊上，去看儿子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回来的成功的欢笑。她哭了，但是却满足了。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三

1980年，姚迪雄踏上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在澳大利亚，没有职业画家。为了生存，姚迪雄应该寻找一份职业，然而，对艺术充满热忱的献身精神，却使他放弃了一切舒适的世俗的享受，他

铤而走险、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当一名无职业画家的道路。

一到澳大利亚，他就被袋鼠吸引了，飞机机翼上、国徽上、大街上到处都绘有袋鼠的图案，更有趣的是：田野上、山丘上、丛林中、公路上竟到处都有袋鼠在奔跑跳跃。袋鼠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和图腾，然而却没有人去表现它。

姚迪雄发现，澳洲的美术界被西欧古典式的表现形式笼罩着，因此，对本土的东西不感兴趣。那好，既然你们都不愿画，那我就专门拣你们不愿画的东西来画，而且要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

他构思了一个气势宏大的图案。画幅长达20米，上面有100只袋鼠，背景是澳大利亚的美丽风光。要完成这样一幅巨画必须做一次环澳旅行，认真观察袋鼠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形态。可旅行需要一大笔资金，靠“救济金”度日的姚迪雄一无所有，他怎能实现这一宏愿呢？

机遇只为艺术事业勇敢献身的人敞开大门。1982年，在堪培拉当他与一位台湾画家和一位澳洲女画家举办“三画家联展”时，画展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他值班。下午，一位澳洲老太太蹒跚着走了进来，在他的《百马图》前久久凝望，久久徘徊，直到下午4点多钟，空荡荡的展厅里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了，这时，她径直向姚迪雄走来，问道：

“你为什么要画这么长呢？”

老太太一口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使姚迪雄听来分外亲切。他对老人说：“绘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发挥的艺术，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停。我心中涌动着广阔的激情，所以就画得长一些……”。

他们聊了起来，姚迪雄告诉老人，他还准备创作一幅20米的《百袋鼠图》，那场面将更宏大，只是苦于没有经费环澳旅行。想不到老太太说：

“你可以申请嘛！”

“申请？向谁申请？”

“你可以向我申请。”老太太微笑着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澳中理事会执行主任”。

1983年5月，姚迪雄得到了澳中理事会最高金额的资助5千澳币。他是第一个得到该理事会资助的华人画

家。

一个多月的环澳旅行，尽管一路上风雨兼程，险象环生，但是，姚迪雄带回了5千多张袋鼠的速写。

四

《200袋鼠图》姚迪雄整整画了一年。他发现，原来20米的创作构思已远远不能表现他丰富的体验，便一直画了下去，整整画了63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63米长的画没有草稿，他是一气呵成，一稿成功。

当人们看到这幅气势恢宏的巨画时，无不为之惊叹。然而，有几人知道姚迪雄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整整一年，他潜心作画，闭门谢客，朋友们将小车开到他们门前约他去郊游，他拒绝了；女友打电话来约他去舞厅跳舞、听歌，他也拒绝了；与他相爱的恋人因为他发狂般地作画而离开了他。他是带着失恋的痛苦进行创作的！

当画完成三分之二时，姚迪雄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手臂钻心般地疼痛，笔也握不紧了，他实在舍不得花时间去医院检查，只好在家里针灸、拔火罐，一条胳膊扎满了蜂窝似的针眼，皮肤变成了深紫色。但还是不管用，姚迪雄便用布条将手臂勒紧，凭着一股拚命的蛮劲强迫自己忘记疼痛，继续作画。

当《200袋鼠图》完成时，他已耗尽了全身的气力，一口气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起床后手臂的疼痛使他想到了去医院。医生看过他的手臂后遗憾地说：“你的细胞组织都坏死了，没法治了，早点来还有救，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姚迪雄笑笑诙谐地说：“我是画画的，不能没有手臂，如果你治不好，以后我就只能用脚画喽！”

他几乎付出了一条手臂的代价，然而他的《200袋鼠图》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1985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又在香港展出。接着，澳洲维多利亚省将该画作为庆祝建省150周年的特别节目，隆重展出。庆祝“太平洋区域旅游大会”和“澳马航空首航”，也将其作为特别节目展出，同时被澳洲政府作庆祝建国200周年的海外特别节目，赴海外隆重展出，每到一地都要激起一阵巨大的冲击波。

外国人被中国画神奇的魅力迷住

了。澳洲画家说：“我们感到惭愧，一个中国画家比我们对本土的了解还要多！”中国人则把姚迪雄看成是华人的骄傲，选他为“海外华人杰出代表”。

一颗新星在世界画坛上兴起，苦难的历程终于换来了成功的鲜花。

作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世界名人，姚迪雄特别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时时想着中华民族。交谈时，他讲得最多的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中国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表示要用自己的画充当一个小小的桥梁，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往来。”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多次将海峡两岸作为一体进行巡回画展。1991年，他应海峡两岸同时邀请穿梭办画展，在上海、潮州展出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台北，然后赴香港，又转道郑州、徐州、北京、天津、武汉、西安、青岛等地。在港台举办画展期间，正值中国大陆遭受洪水灾害。当姚迪雄得知这一讯息，立即找到一个能帮助筹款的地方，捐了一幅画作为义卖，以实际行动将爱心送到大陆。在香港，他又投入捐献的洪流，在香港美术研究会的赈灾义卖展览中捐了两幅骏马图，被李嘉诚和方润华以第一时间认购了，筹得善款6万8千元。8月16日，在香港十多个书画团体联合在新光酒楼举办的“书画筹赈灾雅集”活动中，姚迪雄作为份外人，即兴挥毫画了一幅《壮志凌云》，捐献给“雅集”义卖，支援大陆灾区。

姚迪雄还用他的画打破了阻隔中华文化传播的禁区。

印尼是禁用中文的，印尼政府在所有公开场合都排斥中国文化的传入，不准讲汉语，也不准写汉语。可是，当姚迪雄代表澳洲政府赴印尼举办画展时，在开幕的酒会上，堂而皇之地展出写着中文的中国画，这使姚迪雄十分开心。通过他的画展，印尼人民看到了中国艺术的神奇魅力，改变了对中华文化的轻视和排斥态度。姚迪雄说：“中国画至今还是未被世界人民真正认识的珍宝，我期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让她在世界上大放光彩。”为了更有效地树立起中国人在澳洲的形象，他不惜将宝贵的创作时间投入到大量的社会活动中，积极创办澳华土著艺术研究会，并当选为研究会主席。

他说：“澳洲土著艺术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我不遗余力地做这项工作，就是为了联络更多在澳洲的华人画家，更有效地开展这项富有开拓性质的工作，让以后澳洲美术史上给华人画家写上辉煌的一笔。”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身体力行，除了每到一地都要举办“澳洲土著艺术”演讲外，还着手创作一套规模宏大的系列巨画《澳洲魂》。他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这一系列，他自信这将是比《200袋鼠图》更轰动的大型作品。

尽管姚迪雄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物质上，他仍然一无所有，被香港记者戏称为“快乐乞丐”，始终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他不愿为物质和金钱所累，当朋友劝他说：“和你同机来澳洲的人已买了两栋小洋

楼，买了超豪华轿车，娶了老婆，而你还在穷折腾。”他却回答说：“他们追求的是物质生活，我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目标不同，即使我拥有了一切金钱和财富，精神上不能满足也是痛苦的。虽然现在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但精神上我是富翁，这就够了！”

今年42岁的姚迪雄为了艺术仍然没有结婚，他不愿因为自己对事业的追求而耽误了爱慕他的姑娘，他拒绝了很多十分优秀的女孩子，也是因为他害怕这些女孩子吃不了他那样的苦。为了画《澳洲魂》，他多次到深山老林，到悬崖峭壁上去看土人的艺术品。一次他从土人那里得知有一批原始岩画在一座山上，便兴冲冲地开车赶去，可到那一看，山上的路是刚炸出来的，

还没有清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很是危险。但是，追求艺术的勇气鼓舞着姚迪雄。为了看到那批岩画，他硬是在乱石丛中，在悬崖峭壁的边缘将车开了上去。其间几次车轮打滑，就要随着碎石块滑到万丈深渊的危急情况下，他把加力档挂到最高档，开到山顶，他终于找到了那批岩画。

伟大的艺术来自伟大的心灵，而伟大的心灵来自人格的力量。姚迪雄对艺术的征服首先是一种人格的征服。在这个人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艺术家为了世俗的东西而放弃了艺术的品位，而姚迪雄不慕虚荣，摒弃物欲、为艺术而崇尚苦难的献身精神正是这些人的一面镜子。他的成功不也正是对艺术的一种证明。

郑超麟先生的更正

《炎黄春秋》编辑部：

你刊第四期有叶永烈写的《郑超麟与中国托派》一文，不褒不贬，只叙事实，颇为得体。所叙事实有几处出人，虽无关大局，但恐后人误信为真，趁我未死，尚能用放大镜细看，我便边看边指出人之处，并加以订正。

叶文说：“3个月以前刚在上海获释。”——按我是1979年6月间获释的，11月间去武汉踏勘八七会议会址。应当说“5个多月前”。

叶文说：“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按邓希贤在橡胶厂做工，在我以前，不是在我以后。

叶文说：“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8人赴苏学习，周恩来同行。”按此次赴苏，从法、德二国去的学生只有12人，非18人；又周恩来，陪我们到柏林，他未去苏联。

叶文说：“1926年4月沈雁冰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郑超麟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出席指导。”——按这是1925年秋天的事，不是1926年4月。

叶文说：“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

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特别委员。特别委员会由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按我并非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只是这个委员会属下特别宣传委员会的委员。特别委员会是以陈独秀为主席的干部组成的。它领导了第三次胜利的暴动。到陈独秀去武汉，又经过“四·一二”反革命后，新从武汉来上海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才参加了特别委员会。

叶文引我的话：“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右派的政策”。——按“国民党右派”，是“国民党左派”之误。

叶文说：“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按审判我们这一案的，不是法院，而是龙华司令部军法处。不过此时实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龙华司令部军法处采取了陪审制形式，以军法处长为庭长，外加四个机关派来的陪审员，其中一个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来的。其余一切都同军法审判一样。犯人判刑后，也关在“军人监狱”（漕河泾模范监狱是暂

时寄押的）。

叶文说：“1945年3月12日，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秉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7岁。”——按不是3月12日，是3月13日。

叶文说：“妻子在1957年8月10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县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按此处有脱文。“获释”二字后，应当插入如下一段：

郑超麟至1972年9月28日才获释，但不能回家，被送往上海南汇县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受严密管

下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叶文说：“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预付一笔稿费。”

按维持我1944年下半年生活的，不是“一家出版社”，而是一个朋友；这钱也不是“预付稿费”，而是赠送。叶文后面又说：我1975年就已知道此稿尚在人间，也不确。我是1980年才知道的。

郑超麟



陈诚

军旅沧桑录

● 宅 逸 德 英

陈诚，民国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跻身军界，由排长、连长，位至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其军旅生涯，饱经沧桑，充满了传奇色彩……

投笔从戎

1918年暑假，20岁的陈诚，站在一生事业和命运的十字路口。他怀揣师范和体专两张毕业文凭，却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正心乱如麻，彷徨不定。

秀丽的西湖被微风拂起阵阵涟漪，陈诚觉得自己像湖面上的一叶孤舟，漂泊无定；前途如云雾中的亭台楼阁，虚无飘渺。

他来到长途汽车站，决定先返回家乡青田，再从长计议。

突然，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此人头戴豪华的礼帽，身着笔挺的西装，脚上的皮鞋铮铮发亮，手提文明棍。衣着显示了他的身份和地位。

“小兄弟，这几件行李请代为照看一下，可以吗？”绅士用青田官话对陈诚说。

“可以，可以，请尽管放心。”陈诚为对方的信赖所感动，用青田土话顺口回答。

“怎么，你也是青田人？家在青田什么地方？”绅士好奇地问。

“高市。”

“你可认识高市陈希文？”

“正是家父。”

“啊——”绅士惊奇地说，“希文是我的挚友。”

原来，这绅士打扮的人，名叫杜志远，是皖系军阀的一个师长，驻节福建。此次因当选为北京政府的议员，途经杭州，赶赴北京就任。

他们愈谈愈投机。当谈到陈诚将来的去向时，陈诚黯然失神。

作为前辈的杜志远，当然要为晚辈陈诚的前途操心。他是一个军人，只能在军队方面打主意。

“最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广告，你看到没有？”杜志远问。

“看到了，但是它要2名校级以上军官具保才能报名。”

“这不要紧，我负责举荐。”杜志远一口应承。“但是，军校规定要普中文凭才能报名，师范文凭是不行的。”杜志远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我可以回家借一张文凭来用。”陈诚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愿意一辈子做个军人。”长辈谆谆叮嘱。

“我是愿意的。不过，还要再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陈诚的回答，坚决而又得体。

这次意外的巧遇，决定了陈诚一生戎马，为中华民国造就了一名四星上将，参谋总长。

陈诚匆匆赶回青田，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借了本家陈德的普中毕业文凭，便又返回杭州，与杜志远将军同赴北京。

陈诚乘上北去的列车，犹如长上了翅膀。他的祖先曾经越过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由河南来到遥远的浙南安家；如今，陈诚重又越过江淮，到了更加遥远的北京。

在陈诚的眼里，北京是个更大、更新的世界。但他无心观赏北京的名胜古迹，首先到指定地点报名，领取体检单。检查身体的地点在旂坛寺。这里是袁世凯模范团的旧址。

陈诚因一向喜爱体育运动，身体壮实，除了身材偏矮，各项检查都合格。

接下来是学科考试，这对陈诚倒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读的是师范，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不完全相同。按照规定，要进行中外地理、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英文、国文、修身、代数、几何、三角的考试。他有些紧张。

考试期间，他每天一早就赶到旂坛寺考场门口。开考时先由考官逐个点名，核对相片，然后才发给试卷，让考生到指定的座位就座。上午考两场，下午考一场至两场。

陈诚是借用了陈德的文凭，顶着陈德的名字报考的，他必须牢牢记住，自己是“陈德”而不是陈诚。

考试紧张而天气炎热，加之考试

内容不很熟悉，每场考试前都要叫号，陈诚提心吊胆怕应错了名。三天犹如三年，感到疲惫不堪。

各门课程考完后，陆军部军学司长齐振林中将召集考生发表讲话。齐将军宣布，考生们一旦被录取，首先要到连队去当兵锻炼9个月。他引用了刚刚进行的英文考试中一条中译英的孟子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齐将军接着说：“不要怕当兵锻炼，不好好熟悉军队的生活，将来就带不好兵。”

2000年前孟夫子的警句，陈诚早就背熟，但惟经今天齐将军结合实际指点，更觉实在。

令人心焦的成绩终于出来了。遗憾的是，陈诚未能列入录取名单。杜志远先生连忙进行疏通，将陈诚列为备取第1名。这样，既不违背正式录取的分数规定，又有很大的机动性。后门在这里起了作用。

按照规定，备取生只有当正式录取生缺额时才能补上。陈诚渴望能得到递补，心急如焚。

一个意外的机缘，帮助陈诚踏上了戎马生涯。录取第一名的考生改变从戎的初衷，要去高等学府深造。

陈诚喜出望外，用“陈德”的名字，侥幸地跨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0月初，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门前的照壁上，贴出了第8期学员入伍的分配名单。陈诚被分配在京郊南苑的陆军第9师锻炼。

10月8日清晨，陈诚与其他约200名学生，从永定门外乘上火车，直驶南苑。

巧遇蒋介石

陈诚从保定军校毕业后，曾短期担任浙军排长，后来去广东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建国粤军的上尉副官、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夏，陈诚随邓演达来到刚刚创建的黄埔军校。由于这里已没有少校衔的职位，他接受了上尉特别官佐的衔职。

“辞修，你懊悔吗？”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问。

“报告副座，只要能能为革命贡献力

量，什么军衔都一样！”陈诚说。

邓演达欣赏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满意地点点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为陈诚打开了通天大门。

一天晚上，陈诚出外与旧友相见，天南海北交谈，真是千杯恨少。一谈谈到了半夜。待他赶回军校时，天已微明。他仍兴奋不已，加之多喝了两杯，一下子无法入睡，就取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读。

陈诚一向读书认真，且有在上书圈圈点点的习惯。《三民主义》只是一本小册子，他今天圈，明天点，已使书上圈点密密麻麻。此时，他又免不了再圈点一番。

破晓，陈诚踏破晨雾，手持《三民主义》书本，来到操场的单杠旁。他放下书，脱去军装，深呼吸和活动后，便

娴熟地在单杠上做技巧动作。

远远地有人向单杠走来。他瘦高的身材，着一身整齐的军服，迈着稳健的步伐，后面跟着卫兵。他就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每天清晨都到操场散步，随后就向参加早操的官兵训话。平时此刻，人们还漫游在甜蜜的梦乡。但是今天，他老远就看到已经有人在单杠上运动。是谁？竟起得比他还早。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命运之神，第一次把这未来的君臣引到了一起。

校长走近上尉，顺手拿起放在一边的《三民主义》。他见书上有很多圈圈点点，显然已经被认真地反复阅读。从所作标记来看，对三民主义的要义，似乎已经有所领悟。

这边，陈诚看到来人是校长，便立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女士结婚，时陈任第18军军长

即从单杠上下来，毕恭毕敬地挺立在校长身旁，当校长抬头看他时，慌忙报告。

“报告校长，上尉特别官佐陈诚正在锻炼身体，请校长指示。”

“稍息。”

“书上的记号都是你作的吗？”蒋介石端详着站在面前的上尉军官，发问。

“报告校长，都是卑职所划，今后还要认真学习总理的思想。”陈诚虔诚地表示。

“你对总理的书学得很仔细，很认真，这很好。总理的思想是每个革命军人的灵魂。首先要做总理的好学生，才能做一名好军人。”蒋介石以校长的身

两条人生的轨迹在这里相遇以后，再也没有分开。其中一条，始终顺从地随着另一条运转，时而辉煌，时而黯淡，它们的踪迹，深深地留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屈遭免职

陈诚在黄埔军校期间，曾参加两次东征，后来又在北伐军中，从团长晋升到师长。

1927年秋天，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被迫“引退”，东渡日本。

萧瑟的秋风，也刮到了第21师师长陈诚的身上。

何应钦命令后，连忙紧急集合两团部队，自己扶病上阵，直奔栖霞山。传说他曾坐轿子指挥战斗，并因此受到何应钦的指责。其实，若因病疾缠身，不得已坐着轿子上阵指挥，也算是尽职尽责了。

陈诚率部经过近3个小时的急行军赶抵栖霞山，这里枪炮声震荡着山谷，硝烟四起，一片紧张恐怖气氛。原来驻守栖霞山的第22师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到处奔跑，道路几被堵塞。警备师的一个营，已被孙传芳部包围在北象山，形势极为险恶。

陈诚部署所属部队阻止了第22师的溃退，指挥各部队奋力反攻，终于将敌军阵地冲开突破口，救出了被包围的警备3团第1营。

但是，栖霞山的两个制高点——南象山、北象山，仍为孙军所踞。原本景色宜人的山峰，成了不断喷射猛烈火力的大碉堡，阻止陈诚部队的前进。

激战持续到黄昏，陈诚仰望这两座高大的山影，27日下午2时，陈诚部队的阵前，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情况。

一群身材高大的敌方士兵，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波一波地冲杀过来。第21师的前沿部队，发扬了所有的步枪、机枪火力，只见敌人不顾大批倒下，仍然喊叫着猛扑过来，使21师部队伤亡剧增。这是一支特别顽强的部队。等他们走近时，大家才发现全是白皮肤黄胡须黄头发。原来是孙传芳军队中的白俄敢死队。

第21师部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他们开始后退，防线开始崩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然从21师阵地的后方，源源不断地涌来了整齐的、精神饱满的部队。这是南京方面的援军第7师、第3师赶到了。

刚刚赶到的第7师、第3师，自然地接受了陈诚的指挥。据南京政府军事当局的记载，“5个师之部队，均归第21师师长陈诚将军指挥”。

陈诚下令，任何部队全体军人不得后退一步，违者以军法处置。他组织5个师部队，三面包围南、北象山，战斗彻夜不息。这天正是农历8月初一，月牙斜挂，夜色朦胧。满山遍野闪烁着枪炮的火光。

次日清晨7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陈诚指挥的部队将栖霞山阵地全



1938年在武汉会战中，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

份作出了指示。

陈诚意识到，校长的指示中，包含了对自己的褒奖。他恭敬地说，“谢谢校长的鼓励。卑职一定牢记校长的指示。”

操场上的巧遇结束了。

事业上的结合开始了。

上尉军官的心情仍处于激动之中。他觉得校长的为人，比他原先的估计要谦和得多。他对校长由敬而远之转为敬而近之。

校长也心有所思。他觉得陈诚是个有出息的军人。他把陈诚的姓名、职务都记到了笔记本上，事后又找来总队长严重询问陈诚的情况。

严重是保定军校的5期生，在建国粤军中曾经担任陈诚的副团长。他在蒋介石面前把陈诚夸奖了一番。

8月中下旬，军阀孙传芳，挟徐州胜利之余威，趁南京政府内部纷争之危难，集中了11个师和6个混成旅的兵力，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兼程南下。

26日，孙传芳军分三路于栖霞山、龙潭一线强渡长江。一路由望江亭直逼乌龙山；一路由划子口攻击张家湾、高家村；一路由大河口指向龙潭车站。晨雾帮助了孙军，人潮趁雾涌向南岸。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孙军半天就占领了龙潭车站和栖霞山。

中午1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动了正在病中的陈诚。何应钦以他和李宗仁二人的名义，命令陈诚立刻率领第21师驻南京的两个团部队，驰援栖霞山。

此时陈诚任第21师师长，所辖61、62团驻南京，63团驻苏州。他接到

部攻克。

尽管满山是荷枪实弹的军人，秀丽的栖霞山恢复了昔日的平静。栖霞古寺里重新传出悠扬的钟鼓声和诵经声，缭绕的香烟代替了呛人的硝烟。

不过，与栖霞山仅隔10余里路程的龙潭镇，又开始告急。孙传芳军在这里顽强抵抗，时退时进。刚刚就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白崇禧进驻镇江指挥。他急调陈诚师驻苏州的第63团，配合第1军的第2师和独立第58团，共同增援龙潭。

29日拂晓，在晨曦中，孙传芳军第二次夺取龙潭，情势十分严重。何应钦、李宗仁命陈诚率第21师参加攻击龙潭镇。

30日，陈诚率两个团赶到龙潭镇南面的东阳镇，向黄龙山进攻。

国民革命军已从东、南、西三面将孙传芳军团团包围。位于龙潭以东的第21师第63团，由刘峙统一指挥。

上午8时，对龙潭的总攻击开始了。军号声、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枪炮声震动天地。陈诚指挥两个团奋勇冲击，下属一批一批地在敌火前倒下。

经过1小时又40分钟的战斗，第61、62团好不容易与友邻部队一起，占领了几处敌军阵地。敌军仍在据险以守。

忽然又冲出一支精锐的敌军。他们拼死冲击，几乎使陈诚部队动摇。陈诚知道这是敌人准备突围了。任何部队在绝境中总会表现出它最强或超强的战斗力。他严令所属部队，死守阵地，坚决顶住。

对峙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斜阳已渐落山，周围的山岭上，尸横遍野。一群群的孙部军人成了俘虏。

龙潭被克复了。陈诚的第21师和各支部队齐声欢呼胜利。

栖霞山与龙潭之战，陈诚抱病上阵，勇挑重担。可是，当胜利的号角吹响时，他得到的却是一只酸涩的苦果。

陈诚在龙潭之役中，曾将作战不力的第62团团长李树森撤换，引起了一批黄埔同学的不满。他们联名向何应钦告陈诚。这时陈诚的主要靠山蒋介石正因内订下野，东渡日本，无从庇护。陈诚遂遭何应钦的严厉斥责。他受不了无端的屈辱，愤而提出辞职。

10月，在第21师返驻苏州整训

期间，何应钦接受了他的辞呈，免去陈诚第21师师长的职务。

姑苏的秋夜，陈诚心潮起伏。就在这姑苏城边，他遇到了30年来的大起大落。半年前，是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来苏州，在全师官兵面前，宣布严重师长休息，由他代理师长；如今，又是这个何应钦，听信谗言，使其蒙冤去职。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陈诚卸职后，结算薪俸，领得500多元大洋。这相当于一名工人20个月的工资。他除分寄一部分回青田供养母亲、妻子外，便携带余款，与秘书张琢卿同赴上海，住进青田人赵志焄开在闸北青云路的信达利钱庄内。他不习惯过平民生活，犹如10年前不习惯

1928年秋天，北洋军阀大都被讨平，只剩下奉系一支。奉系头子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儿子张学良倾向于归顺中华民国。蒋介石着手整编十分混乱的国民革命军，将原有军、师，一律整编为师、旅。

陈诚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前此，他已在1927年春担任第21师师长，率3个团。1928年春“第二次北伐”时，指挥过3个警卫团、2个宪兵团、2个炮兵团，其实力已超过1个军。

整编中，以陈诚的2个警卫团与第17军军长曹万顺的4个步兵团，合并组成第11师。

谁任师长？曹万顺以军长之职，就



1945年10月，陈诚(右二)在重庆机场与毛泽东、张治中(右四)合影，时任军政部长

过军营生活一样。他的心情如黄浦江水似的无法平静。

“土木系”头领

不甘寂寞的陈诚，在短期闲住上海后，便又借助老上司严重的帮助返回军旅，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在重随蒋介石参加新军阀混战中，又为蒋立下赫赫战功，节节晋升为蒋介石嫡系第11师师长和第18军军长，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陈诚为代表的新的军事体系。人们借用中国字形的巧妙结构，习惯称这个新的军事体系为“土木系”。

“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暗喻陈诚军事集团的基干力量为第11师和第18军。

任整编师长，乃名正言顺；陈诚在军中的实际地位和已经指挥过的实力，则又为曹所不能匹敌。

蒋介石找主持整编工作的何应钦问道：“辞修担任第11师师长是否适宜？”

何应钦答：“墨三（顾祝同）、铭三（蒋鼎文）此次均只任师长，辞修若亦任师长，恐资历尚浅。”

“那好吧，辞修就担任副师长好了。”蒋介石不露声色。

陈诚得知将要出任副师长的消息，心中不快，认为是何应钦故意整他。便愤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蒋介石闻陈诚返回上海，洞察其故，特命随从副官赴沪将陈请回，允以副师长职暂时过渡，授以处理人事、经理的实权。陈诚答应了。

1927年7月,蒋介石借机将曹万顺调离,升任陈诚为师长。

自此,“土”为基础,“木”立于土。

10个月后,陈诚率领第11师参加了中原战场的厮杀。他随第2军团辗转在陇海线和津浦线上,连克马牧集、归德、宁陵等要地;又瓦解曲阜之围。再奉蒋命挥师指向晋军手中的济南。

闷热的7月,泉城周围战场的温度,也随气温的升高而升高。第2军团刘峙的总指挥部,从陇海线上转到了鲁南的滕县。蒋介石也直飞距离济南120公里的兖州。

7月底,蒋军布置好了三路进攻济南的阵势,陈诚的第11师沿津浦线正面主攻。

晋军在津浦线上,集中了张荫梧、傅作义的5个军。

津浦东西,汶河南北,将星云集,剑拔弩张。

蒋介石为首先攻克济南的部队,悬了重赏。

8月1日,蒋军的全线攻击开始了。

陈诚的部队首先在大汶口以南一线,击败晋军。第11师攻势凌厉,守军溃不成军。适逢大雨瓢泼,山洪暴发,人流水流交流。晋军人滚车翻,道途堵塞,秩序大乱。大炮丢了,辎重丢了,连高级将领的小汽车也丢了。

晋军遭到了双倍的失败。陈诚得到了双倍的胜利。

又是数日的阴雨。本来雨天对交战双方都不利。陈诚的部队却借着雨天乘胜前进,涌向济南。双方在临近济南的红庙、黄草岭一线对峙。

陈诚一面加强正面攻击;一面派出迂回部队,抢占白马寺等战略要地。敌军猛烈反扑。

第11师顶住了反扑。

陈部不顾重大伤亡,于8月13日,将济南南面的所有据点全部拔除。

15日,济南外围的据点,都被摧毁。蒋军在稀疏的枪声中收复这座名城。

右翼蒋光鼐第60师和蔡廷锴第61师,抢先从东面进入济南。陈诚挥师紧接着从南面入城。

晋军狼狈逃窜,连仅有的3架飞机,也没有来得及飞走。

蒋介石论功行赏:第60师、第61

师、第11师均按章发给重奖。蒋光鼐提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提第19军军长,陈诚擢升第18军军长,仍兼第11师师长。

33岁的陈诚,从军校毕业后,8年中自排长而官升军长。此后的10余年中,无论是在江西“围剿”红军,还是在抗日战争和全面内战中,陈诚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土木系”。

损兵折将

1933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在连续三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围剿”失败以后,又调集30多个师,以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下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苏区进攻。陈诚被任命为“进剿军”主力的中路军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共12个师。

陈诚率部到江西对红军作战,已有两年历史,但从未与红军的主力进行过正面较量。红军小部队,一遇国民党大军,即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的办法。这使陈诚部队认为红军似乎不堪一击,因而骄横不可一世。

在陈诚所率的3个纵队中,第1纵队包括了陈诚赖以起家的第18军中的3个主力师,第11师肖乾部、第52师李明部和第59师陈时骥部。对这3个纵队,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将其第1纵队作为“最骨干之一个纵队”,决心“迅速击破”“第1纵队3个师”。

2月26日拂晓,第52师、第59师两师,分沿大山两侧作同方向的移动,彼此相距10余华里,不能互通信息,实则正分别走向红军布下的两只口袋,等着他们的是红军名将林彪、聂荣臻的红1军团,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董振堂、朱瑞的红5军团,以及红21军、红22军等部。

27日、28日间,陈诚的第52师和第59师,分别在崇山峻岭中,被突然出现红军分割成数段。

天空阴暗,一会是蒙蒙细雨,一会是浓密的大雾;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地形不熟,情报不灵。陈部无还手之机,官兵非死即俘,连师长李明、陈时骥也被红军活捉。

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给陈诚发了“万急”电:第52师、第59师之被

歼,是“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接诵噩耗,悲愤填膺”。话语中自然包含了对陈诚的批评。

陈诚接电,百感交集,黯然写下8个字:“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他从军15年来,还没有遭遇过这么惨重的失败。

半个月后,陈诚又把他起家的第11师,送进了红军的伏击圈。

红军认准了第11师,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将其全歼,师长肖乾负伤,落荒而逃。

陈诚闻讯,惊愣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神情沮丧,几乎昏厥过去。此后数日,不时伤心泪下,羞愧不已。

陈诚所部在二三个月中,共被歼3个精锐师,被俘者万余,被缴枪万余支,损失新式机关枪300挺,大炮40门。红军打扫战场时,动员了大量民工,费时一周才扫清。许多武器装备还没有开箱,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素与陈诚有隙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抓住这一机会,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去电报,内称:

最近一月以来,有第59、第52、第11各师之挫败,一切情形想已洞察,计师长死伤4名、旅长6名、团长16名,步枪损失当以万计……此种情形因对日本及恐影响士气关系,从未尽情宣布,形势严重,外间或不尽知,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这揭到了陈诚的痛处。

熊式辉老谋深算,在关键的时候和关键的问题上,捅了陈诚一刀。更厉害的是,熊式辉向中央建议,撤销几个被歼师的番号。无疑要置陈诚于死地。

将领总以实力为基础,如果手中没有几支听命于自己的部队,那军事生命亦将完结。

陈诚得知熊式辉的告状电报,悔恨交加,却无法辩解。只得向蒋介石发电:辞去本兼各职。

他不等蒋介石的回电,便离开前线,回到南昌官邸。

陈诚懊丧,令夫人谭祥十分心痛。

谭祥一向不问政事,虽然心焦,却不便过问军务,只是劝慰丈夫“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保重身体。

此时,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蒋对陈的军事失败,虽有责备之意,但并未对他失去信任,且衡量手下诸将,下一阶段“围剿”红军的前方指挥,仍非陈诚莫属。但陈诚若不主动去谒蒋,蒋亦不便主动召见。而陈诚则觉得自己以戴罪之身,惟有听候惩处之一途,无颜再去晋见。他们虽同住南昌,且相距不远,但却无由见面。

谭祥虽知其中奥妙,但也别无良策。

一日,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参谋长贺国光前来看望陈诚,深感陈、蒋之间的僵局必须迅速打破。他想到了一条妙计:运用“夫人外交”法宝。

贺国光趁陈诚不在场的机会,低声问谭祥:“夫人,让薛修就这样闷在家里总不是事啊!”

“我也劝过他到委员长那里去谈谈,他总是不肯。”谭祥忧心忡忡地回答。

“你真呆,不能约他陪你去看望蒋夫人吗?”贺国光凝神注视着谭祥。

谭祥经过这一点拨,茅塞顿开,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明天就办!”

翌日,谭祥拉陈诚出去散步。

4月的南昌,大地已经返青。杨柳萌发新枝,野花争先开放。陈诚心中的郁闷,被春意融化了许多,情绪开始恢复正常。

谭祥有意向蒋介石官邸方向散步。

当快到蒋介石别墅的时候,谭祥突然提出:

“薛修,陪我去看看蒋夫人吧!”

陈诚措手不及。在犹豫了极短的时间后,便欣然应允。他虽然担心有见到蒋介石的可能,但是,如果连蒋夫人也不愿去看,未免要被自己的夫人讥笑不像个男子汉了。

宋美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完全不谈政治。可是,各人心中都有一本帐,这不谈政治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宋美龄同陈诚夫妇寒暄了几分钟,蒋介石便跟着出来接见。夫人的客人来了,丈夫当然应当礼貌接待。

这种形式的见面,非常自然,双方都不失体面。并且由于双方都有夫人在座,保证了会见亲切、友好的气氛。“夫人外交”获得成功。蒋、陈关系

在经过这次危机之后,更加紧密了。蒋介石向陈诚表明了继续重用的决心,陈诚也表示欣然受命。

万家岭大捷

抗日战争把陈诚推到戎马生涯中的一个辉煌阶段。

陈诚在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70万大军鏖战于淞沪战场后,在1938年的头7个月中,同时担任了武汉卫戍总司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武昌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大串显赫的头衔,显示了他在蒋介石面前所受到的特别宠信和他担负的繁重的军政事务。

1938年9月的武汉,赤日炎炎,“火盆”威势并没有因初秋而减弱。

日军集重兵于武汉外围,正力图北截平汉线,南阻粤汉线,对武汉实行迂回包围。长江两侧的枪炮声,竟夜不歇。形势使人更感炎热而沉闷。是时,“九·一八”事变7周年来临。

陈诚善于鼓动人们的激情。他决定利用纪念“九·一八”的机会,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来激励抗日军民。他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冲破最后的难关》。他在文章中说:

全体军民听着,此地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场所以,此时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时期,每个军民都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都要与武汉同生死共存亡,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

目前我们的责任,是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敌人再不能坚持了,那时我们才算度过了难关。

陈诚把武汉会战估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奋斗”的场所和时期,未免有失偏颇;但是他号召大家下决心作最后的斗争,坚持到最后,确是一片热心。

10月初,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11军,在赣北德安附近,发起了新的进攻。

冈村宁次指挥所部迂回攻到德安西南面的万家岭。他们骄横异常,不可一世,自以为攻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上“太阳旗”。

他们是骄兵,又是远离友邻部队

的孤军。

陈诚看准了这一有利形势,令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迅速调集部队,将这股敌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在万家岭。

参加包围日军的部队,都经历过淞沪血战,见过恶战场面。民族仇恨激励着每个官兵。

7日,敌人的退路被完全切断。他们成了瓮中之鳖。中国军队的数量,多于被围日军好几倍。

陈诚下令:抓住战机,勇猛出击,在3天内围歼全部敌军,纪念第27个“双十节”。同时宣布,对攻占万家岭的部队,犒赏5万元。

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日军,战斗力比平时更强。在绝望时相继举枪自杀,或剖腹而死,表示对天皇的忠诚。

敌机一批批地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狂轰滥炸。

厮杀了整整3天3夜。中国军队要收缩包围圈,往中心冲锋;日本军队要顽强固守,拼死反冲锋。杀声震天,火光熊熊。敌军陈尸遍野,我军伤亡惨重。

陈诚的电话直通薛岳的前线指挥所。他再次发出命令,万家岭必须在10日前完全占领。

9日晚,当200公里以外的武汉市,正在欢庆“双十节”的时候,数百名敢死队员从薛岳部队中选出。他们身背各种轻武器,携带了足够的子弹和手榴弹,背后插着锋利的大刀,举起战友们为他们斟满的酒碗,向祖国和人民庄严宣誓,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以行动来庆祝“双十节”。

瑟瑟的秋风,为壮士们送行。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可能是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但义无反顾倒在杀敌疆场,亦死而无憾。

勇士们呐喊着冲向敌阵,犹如天兵天将突然降临。

日军的防线最后崩溃了。

紧跟着敢死队,从四面八方涌来潮水般的中国士兵。

黑夜,日军看不清冲过来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也分不清该从哪里突围。

10日清晨,当朝霞映遍万家岭上空的时候,薛岳的部队占领了万家岭。顽抗的日军从北面冲开一条血路,逃掉了一部分,其余几乎全部被打死在

阵地上，侵略者的尸体和鲜血盈坑塞谷。

中国军队缴获了重机枪 50 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百余匹，弹药、辎重不计其数。

当然，山岭上也洒下了不少中华男儿的鲜血。

万家岭获胜的当天中午，陈诚以“限一小时到”的急电，飞报汉口蒋介石：

敌 106 及 101 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齐日（8 日）被我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激战两昼夜。经我各军勇猛进攻，卒于本拂晓全部解决。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枪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狽。

蒋介石显然被陈诚的捷报激动了。他宣布：对攻占万家岭的部队，除陈诚犒赏的 5 万元外，“本委员长另赏 5 万元，以资鼓励”。他在接陈诚电后 4 小时，就给前线各部队长官发去电报。电报说：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

电报中虽没有列出具体指挥官的姓名，但陈诚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当然倍受青睐。

他昔日在与红军作战中丢失的面子，如今在共同抗御民族敌人之战中，得到了体面的挽回。

内战总指挥

1946 年春，全国人民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蒋党已在阴谋挑动内战。蒋介石需要物色一个内战的总指挥。他的目光，最后停在了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身上。

5 月 31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命令：

“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

同时被任命的高层军职还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次长刘斐、郭忏、范汉杰，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历史把陈诚推上了一个反人民战争总指挥的位置。也是他戎马生涯中处于军界巅峰的一个位置。

阶级的偏见使这位 48 岁的青团

籍将军，不可能看到：他正在步入一生中黑暗的一段历程。

陈诚来不及正式宣誓就职，便开始履行蒋介石授予他的职权，指挥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 5、第 6 两绥靖区共 10 个整编师、30 万人，去围攻只有 6 万人的中原解放区部队。

6 月 26 日，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向宣化店地区发动了进攻。历时 3 年多的内战战火就此点燃。中国人民又一次被卷入战争灾难之中。

陈诚失算了。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分 3 路突围成功。

七、八月间，陈诚又把注意力放到江苏北部地区。他调集大军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盛气凌人地说：苏北问题，“上策，共军退出；中策，国府迁都；下策，武力决赛。”“上策共军不愿履行，中策国府由于五五迁都，未便再迁”，所以，只有进行“武力决赛”一途。他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

陈诚的预言，很快就被粉碎了。

苏中解放区部队，7 战 7 捷，歼灭了国民党军 50000 余人。国民党军只夺得了海安、如皋两座空城。他们以巨大的代价，占领了苏中、苏北地区的点、线，却始终不能全部占领广大的农村。解放区军民在艰苦地坚持斗争。

九、十月间，陈诚又奉蒋命策划了塞外的战事。

10 月 11 日，傅作义部攻占了塞外重镇张家口。

陈诚偕夫人谭祥，于当天飞抵北平。他让夫人去北平观光，自己忙于策划长城一线的军事部署，频繁地飞往北方各地巡视，并故意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展示其“胜利者”的姿态。

不过，蒋介石、陈诚不切实际的指挥，遭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坚决抵制。在北京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上，陈诚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在 3 周内打通平汉线的手令。读毕，大家面面相觑。

“李主任，请你先谈谈，怎样实现最高统帅的命令。”陈诚打破沉寂，点了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名。

“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李宗仁接着说：“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

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 3 个星期内打通，实在是梦想。”

李宗仁显然激动了。

“德公，您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照我看，依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只好退一步问：“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李宗仁：“辞修兄，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德公，你是老前辈，能否用您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李宗仁：“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

李宗仁当即命一参谋起草电稿，向蒋介石报告。陈诚见李宗仁肯于承担责任，如释重负。

蒋介石只好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

1947 年一、二月间，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坐镇徐州，指挥 53 个旅、31 万人，向临沂、莱芜等地发动进攻，发起了“鲁南会战”。他向参战部队宣布：

“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中共中央军委于 2 月 3 日，专门向陈毅等鲁南前线将领发出了《关于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几点指示》。陈诚的名字被列入中共中央军委的文件，这是陈诚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奉军委指示，主力作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莱芜、临沂。陈诚错认为这是解放军的败退，连忙致电第 2 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需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地区歼灭之。”

在陈诚严令下，第 2 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第 73、第 46 军主力，钻进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吐丝口间预设的袋形阵地，并被全歼，共损失 7 个师、5.6 万人，李本人亦被俘。

在鲁南损兵折将的同时，陈诚又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困境而苦恼。

3 月，陈诚调集了 34 个旅、23 万人向延安地区的中共主力部队 2.7 万

人发起进攻。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力部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

延安人民坚壁清野，在道路、房前、室内，到处放置了土雷、炸药。国民党军疑神见鬼，心惊肉跳。

为了制造舆论，陈诚对于占领延安空城一事，大吹大擂。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显然报告了虚假的数字。他说：

“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被俘万余人。”

记者问：“延安攻下影响共军军心否？”

陈诚大言不惭地说：“自然，若南京陷落亦必影响国军军心。”

记者又问：“政府如无外国军事装备，可否击败共军？”

“政府不需要外国帮助，共军离开了民众故败北，并非国军武器较好。”陈诚的回答颠倒了事实。

记者终于提出了令他痛苦不堪的问题：“把全部共军打败需要多少时候？”

陈诚在10个月前，曾经允诺过“3个月内击败共军”，此时只能尴尬地承认：“从前说过3个月内可以击破共军主力。”他回避了提问者问题的实质，不敢再预言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将中共主力“击败”。

一年来的惨痛失败，使陈诚焦头烂额。他深深感到，在这一场战争中，担任总指挥太困难了。但是，他不可能理解：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败阵东北

1947年8月，中国在血与火中跨进内战中第二个秋天。长城内外，黄河南北，到处是战斗的硝烟。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满耳是隆隆的炮声。

解放军已经在各个战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漫长而庞大的堤坝，正在崩塌。

29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对于陈诚的这一任职，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蒋对陈的贬抑，使他由全军的参谋总长，实际局处东北一

隅。有的说这是蒋对陈的信任，让心胸胜利干将去坐镇事关大局的东北。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有道理，他的任职，正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

蒋介石的任命，使得在东北执政两年的熊式辉略显尴尬。熊式辉与陈诚素来不和，江西“围剿”时即互相埋怨，抗战爆发后所持战略观点又相径庭。冤家路狭，他们又在东北相逢。

9月1日下午2时，一架追云号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的跑道上。四星上将陈诚神情严峻地走下舷梯。熊式辉率行辕主要官员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拉着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员摄影留念。

熊式辉拍照后，不无狼狈和难堪地离开了行辕。

陈诚就任时，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国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从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各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

接着就扩充部队，以增强实力。他把东北原有东北部队扩编，手中共握有14个军21个骑兵师。他的嫡系将领潘裕昆由第50师师长提升为新1军军长，龙天武由第14师师长提升为新3军军长。

“土木系”又活跃在东北战场上。10月10日，他在《国庆献词》中针对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狂妄地表示：

要趁此机会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的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万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他的部队，经过50余日交战，陆续损失了6.9万人，丢了15座城市。东北蒋军被压缩到长春、沈阳、营口、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陈诚的“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成了空话。

1948年元旦，在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隆隆炮声中来临。

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了。陈诚已没有喘息的时间。

为了稳住军心，他故作镇静。又虚

张声势地说：危机已过，战备完成，国民党军即将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扫荡”。

他集中了十几个师兵力，沿运河两岸，从近100公里的正面向沈阳西北出击。新3军、新6军主力为其右翼，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5军为左翼，由新民向北推进；第71军、新1军主力居中，由沈阳向西北推进。

1月30日，比较突出的左翼新5军推进到距新民25公里的公主屯，突然遭到了解放军4个纵队及3个炮兵团的合围。

新5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陈诚发去急电，请求退守有坚固设防的辽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此却举棋不定。

解放军的包围在逐步完成。新5军的退路愈来愈窄。

1天以后，陈诚才决定撤回新5军，命令陈林达立即率部向辽河转移。

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陈诚的命令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公主屯，他在公主屯的部队却一兵一卒也出不来了。

5日，解放军开始发起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3天3夜。

新5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军部和两个完整的师共2万余人被全歼。大队俘虏垂头丧气地被押向解放军的后方，他们中有新5军军长陈林达。

左翼失利，使陈诚忙指挥其中路、右路退回沈阳和铁岭。

他痛苦地向蒋介石报告新5军全军覆没的消息，老蒋极为震惊。

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要追究新5军惨败的责任。将领们你一言他一语，都在强调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责任。作为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陈诚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指挥无方，愿意接受党国的惩罚。

陈诚虽自请处分，蒋介石却不忍下手。但是陈诚声望急剧下降，却是确凿事实。难堪处境加恶劣心境，使他的胃病严重发作。

1月17日，蒋介石签发了一条命令：

“特派卫立煌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这实际上宣告了陈诚指挥东北战事的结束。

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又一次巧合。抗日战争中陈诚曾因胃病离开远征军,正是卫立煌接替了他的职务。此次竟又是在陈诚胃病发作时,由卫将军再次取代。蒋介石好像总是让卫立煌随时准备接替陈诚,虽然他们一直互相戒备,并不是一对友好的合作者。

“杀陈诚以谢国人”

陈诚离开东北后,在南京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

2月27日上午8时,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到达上海。他们虽乘坐的是可以睡觉的软席包厢,陈诚却显得十分疲倦,脸色苍白,无精打彩。军用轿车把他们接到了法租界的陈诚私人住宅。他将在上海作胃部手术。

经过江湾国防医学院的详细检查和会诊,决定陈诚先静养一段时间,等天气暖和时再动手术。

自此,陈诚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心休养,等待手术。尽管这时他仍戴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两顶桂冠,但是在报纸上已找不到他的消息。往日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如今向社会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陈诚本人不想再抛头露面,南京“行宪国大”的一场风波,却使他的大名很不光彩地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4月12日下午,“国大代表”就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作自由发言。

山东“代表”赵庸夫第一个在发言中点了陈诚的名。他情绪激动地说:“政府应该明是非,信赏罚。检讨目前军事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一步?其原因是由于参谋总长陈诚的三大政策:1.肃清游杂。现在共产党在东北的60万军队,就有这批被肃清出去的游杂;2.整编军队。把一军编成一师,一师编成一旅,有的不知道编到哪里去了;3.调整人事。说是整编军队国家化,把张三的军队交给李四带,李四的军队又交给赵五带。这样的调整人事,究竟有什么用?”

一名叫吴叔观的“代表”呼应台上的发言,要求陈诚到上台来报告他的工作。另一名“代表”王会文叫嚷,熊式

辉、陈诚都要向代表报告东北军事。

赵庸夫见台下有人支持他的讲话,越发慷慨激昂。他提高嗓门说:

“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军队还不很好,后来杀了一个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现在军事当局要明赏罚,才能收拾人心!”

会场上,人心激动。有些“代表”听到传闻,说陈诚将去美国动手术,更加感到激愤。

“代表”张崧贤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喊道:“由大会发电给上海市府,不要陈诚走!”

东北籍“代表”张振鹭的建议更具有煽动性:“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赵庸夫更操着典型的山东口音大喊:“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对于这样的局面,1000多名“代表”中,各人心态也不尽相同。有把刀锋直指陈诚的,有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也有为陈诚鸣不平的。

最感到难堪和难过的是蒋介石。有些“代表”对陈诚的抨击,实质是针对蒋介石的,只是不便直说而已。幕后的蒋介石很是着急,连忙向大会主席团发话:“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他下令大会秘书处,加速对军事报告讨论进程,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

“圣旨”像符咒一样,镇住了纷乱,保住了陈诚。

但是,这一发生在“国民大会”上的闹剧,有1000余名代表和上百名记者在场,何能封锁得住?第二天,各大报纸上都登出了“代表”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消息。它对于正在上海静养的陈诚,无异于一声惊雷。陈诚因此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和绝无仅有的。

他穿着长袍,坐在那稍显陈旧的寓所房间内,手捧《中央日报》,脸色蜡黄,目光迟滞,感到羞愧和委屈。

“辞修,那些起哄的都是些小人,恐怕还有的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你可千万别多想,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夫人谭祥以一种女性的温柔,劝解丈夫。

“小人!小人!”陈诚愤愤地说。他虽说赞同了夫人的观点,但怒气难消,仍使谭祥不安。

“蒋主席了解你,他会为你主持公道的。”谭祥捧出了最高权威。

“对,只要领袖了解我,再大的委屈我也能忍受。”陈诚不得不以此自慰。

5月13日,在陈诚宣告离职休养3个月和在“国民大会”上遭到抨击1个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免去了他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等本兼各职。至此,他只留下了一个四星上将的空衔,其身份则成了一介平民。

6月,陈诚赶在盛夏来到之前,带着抑郁的心情,在国防医学院成功地把胃部切除了3/4。

这年10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泉城济南,并稳操辽沈战役胜券的时候,陈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离开了喧闹的大陆,去到台湾岛的草山(即阳明山)休养。

深秋的龙华机场,微风中夹带着几分寒意。陈诚穿一件淡灰色的旧夹袍,戴一顶旧呢帽,由夫人陪同,慢步登上飞往台湾的专机。机场上只有几位旧日部属为他们送行。往日前呼后拥的热烈、隆重场面,竟成历史。一种凄凉和冷落的感觉,在陈诚的心中油然而生。

飞机在台北松山军用机场降落后,前往欢迎的人,连新闻记者在内,一共不到20人。唯一高官阶的官员,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緝。陈诚勉作微笑,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新闻记者们当然都想从陈诚口中打听些内幕消息。但是,陈诚只是淡淡地对他们说,“奉总统之命,来台养病”,其他都无可奉告。

陈诚在草山住下后,远离了大陆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逼人气势,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生活。

这当然绝非陈诚军政生涯的终结。1948年底,他复出担任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职。此后,他更作为蒋介石的副手,先后或同时担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成为台湾岛上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责任编辑:卢弘)

陈立夫先生惠书大陆丹阳

● 朱 亮

最近,92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听说大陆弘扬正则绣,非常高兴,欣然写信给吕凤子先生长子、丹阳正则画院名誉院长吕去疾先生,高度赞扬正则绣,信中说:“刺绣,为我国所发明,为女子技艺之一,成为工艺品后,以苏绣湘绣为最著称,惟均依正规画刺成之,乱针绣之问世,乃由吕凤子先生创始,其时余掌教育部,遂助吕先生成立正则专科学校,俾能弘扬此一新发明之艺术。最近消息由大陆来,始悉正则绣已得社会之肯定,可知真正之美,为人所共赏。……”

吕凤子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艺术教育家、著名书画家,1912年在家乡江苏省丹阳创办正则女校,并执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上海美专、国立中央大学等院校。抗战军兴,吕凤子逃难入川,在璧山复办正则蜀校。此时,国立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并为一校,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双方不合,风潮迭起,林风眠先生愤而去职,由滕固接任校长,筹备了两年,并未正式上课。后来,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面请吕凤子先生任国立艺专校长。

这天,陈立夫来到正则蜀校校长室,跨进门槛,见吕凤子正埋头看书,笑眯眯地说:“先生真是用功不辍啊。”

吕凤子抬头一看教育部长大驾光临,亦起身招呼。泡茶坐定后,吕凤子说道:“呵,不知部长先生有何见教?”

“岂敢见教,只是有一事同先生来商量商量。”陈立夫呷了一口茶说:“教育部欲请吕先生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不知您有何想法?”

吕凤子沉吟片刻:“我有五个条件,不答应,即不就聘。”

“先生说说看。”陈立夫点头道。

吕凤子慢条斯理:“一、请部长先生给我兼任聘书,不要发委任状,不要



陈立夫像(乱针绣)存给简任官。”

给简任官。”

陈答:“好。”

“二、学校要从昆明迁到璧山附近,因为我办的正则蜀校在蜀山。”

“可以。”

“三、学校用人和教书,教育部不要干涉。”

“那当然。”

“四、学校经费由我开支,教育部不要管。”

陈立夫笑道:“你当校长,当然有权处理。”

“五、我不是国民党党员,赌咒许愿的事我不想做!”

那时,每星期一第一堂课是总理纪念周,全校师生集中礼堂,校长主持仪式,全体起立,读孙中山遗嘱,默哀,讲话。

陈立夫不解地问:“不知先生指的是什么?”

吕凤子直言相告:“总理纪念周。”

陈立夫先一愣,尔后笑道:“好吧,

我派专人负责,就这样说定了。”随后,陈立夫派了国民党员俞汝朋先生任训育主任。

吕凤子振奋精神,迅速确定校址建筑在距璧山县城30余里的青木关西部半山上,并接任国立艺专校长。抗战大后方,师生们生活都很艰苦,但吕凤子节衣缩食,个人设立“吕凤子奖学金”,以对清寒优秀学生多做鼓励。

194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又正式成立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吕凤子兼任校长。这样,正则学校形成从幼稚园到大专完整的美育体系,吕凤子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教育部长陈立夫对吕凤子的书画、为人颇为敬佩,对正则艺专曾给予多方支持,他通过批办公费支持学校,解决正则艺专办学经费问题。为表示谢意,吕凤子特赠送一幅杨守玉的乱绣《陈立夫像》。抗日复员后,吕凤子在家乡丹阳重建正则学校,又赠送陈立夫一幅《薛涛像》,写唐代女诗人薛涛(字洪度),秀美端庄,端坐抚琴。衣纹劲秀洒脱而整体和谐,绚烂典雅。上部题集薛涛七绝诗两首:“感君识我枕流意,强为公歌蜀国弦,老大不能收拾得,飘花散蕊媚青天。凄凉逝水颓波远,蜚在荒芜月在天,唱到白蘋洲畔曲,幽声遥写十丝弦。丁亥造薛洪度并缀其诗句两首,立夫先生鉴之,凤先生丹阳。”铃“丙戌归后”、“凤先生”、“老凤六十以后作”三章。

正因为陈立夫与吕凤子有过这段交往,所以当正则艺友、台湾著名画家张杰先生准备印行《吕凤子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书画册》时,陈立夫不但将自己珍藏的乱针绣《陈立夫像》和《薛涛像》交张杰收入画册中,还欣然为之题签并作序:

“吕凤子先生为中国近代著名画家及美术教育家。对日抗战时,曾任重

庆青木关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与余相友善。明年12月，为吕先生逝世30周年，其在台校友张杰画家，拟为其印行书画册，以资纪念，而请余为之序。余对于吕先生之艺术思想、办学精神及其高尚品格，夙所钦佩，自不能无一言。其画擅长人物、山水、花鸟，早岁研究西洋画理论及画法，使其国画兼收水彩画、油画之风格，所作《庐山云》曾获世界博览会中国画一等奖。一生作画近千幅，其精心构思之《四阿罗汉》、《十六罗汉》、《千古愚》等珍品，构思谨严、意境高深，倍受世人推崇。所著《中国画法研究》一书，阐述中国画之独特风格，为研究国画理论之重要典籍。其书法则熔篆隶正行草于一炉，刚健凝炼，亦独具一格。至其办学精神，捐产兴学，可称为美术教育家。初则创办“正则女校”，使其故乡丹阳女子有受教育之机会，继改为“女子职业学校”，设刺绣、蚕桑等科，开职业教育之先声。抗战期间，日军占领丹阳，复在重庆璧山创办“正则艺专”、“正则职业学校”及“正则中学”，皆赖其卖画募捐而成，历尽艰辛。从此春风广被，桃李遍四海，现其校友正计划编印“艺友录”，再进而组织“凤先生学术研究会”。余以推进美术教育，增益美术创作，对于艺术教育之贡献，以资阐扬，亦聊表怀念故友之忱云尔。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吴兴陈立夫于台北时年八十九”

此画册于1989年6月6日由吕凤子学术研究会台湾分会和台湾丹阳同乡会出版，画册选入凤先生60多件书画金石作品，著述《中国画法研究》和10多篇评述、回忆文章，印刷精美，装饰考究。

陈立夫通过正则校友张杰回大陆探亲时，捎带了一张自己的半身照片，请丹阳正则绣研究室绣制正则绣像。吕凤子裔孙吕存精通油画，又得正则绣技法精髓，精心绣制成的正则绣《陈立夫像》，栩栩如生，千针万缕的绵密细丛化作一片绵簇，宛如油画，或似艺术摄影，光色配合，自然得巧。陈立夫见到自己的绣像，爱不释手，对正则绣艺术推崇备至。吕凤子长子、丹阳正则画院名誉院长吕去疾先生，通过台湾著名画家张杰请陈立夫题写画展名，90高龄的陈立夫欣然为将在大陆和台湾展出的正则艺友画展题写“海峡两岸正则艺友书画联展”，签名下盖有朱红名章，于1989年5月从台湾寄给

他之獨是愛國畫家及美術教育
家，他在美術方面有獨特的風格，
在刺繡方面，發明了亂針繡，他是
有創造能力的藝術家！

許之文題



呂鳳子

許之文敬題



愛國畫家美術教育家

了丹阳正则画院的吕去疾先生。

1990年夏，陈立夫又将三帖墨宝赠送丹阳有关单位，为丹阳市吕凤子纪念馆书写横幅“当代师表”，为正则绣研究室题写了“弘扬中华文化”六字，为正则画院题词以弘德而无止境，惟有德者能久享其名”，表达了他对大陆故人的怀念和正则艺术的推崇。继后，陈立夫先生闻说丹阳市有关方面将出版《吕凤子传》一书，不顾年事已高，再次挥毫题词书赠丹阳，一幅题词写道：“爱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另一幅题词写道：“吕凤子先生与余在抗战期间，同在重庆市青木关服务于教育界，他不独是爱国画家及美术教育家，他在美术方面，有独特的风格，在刺绣方面，发明了乱针绣，他是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高度赞扬了吕凤子的一生美德。

陈立夫先生多次为大陆丹阳题词惠书，这么推崇大陆的一名爱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十分难得，也并不多见。特撰此小文，昭著于世。

(责任编辑：刘文)

温州三灯

叶大宾

珠灯

在温州市龙湾区蒲州中埠的玄坛里，保存了一架全国目前最大的珠灯。此灯重 800 余斤，4 米多高，灯围 12.3 米。灯架（包括图案装饰）用釉彩瓷或玻璃珠串制而成。当上下里外同时点燃时，灯和灯交叠，珠光闪烁，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四周珠带垂拂，宛如一尊圆形的神秘灯网。

整个灯体由近 70 盏形式各异的珠灯组成。其中，“刘海金钱纹”珠灯 80 只，六角下面挂着三幅对联，共分三层，第一层的中间是一盏最大的八角灯，画有山水花鸟丝绸画。第二层中间是盏六角灯，有用珠穿成的三幅山水画和三首诗句，其文字分别为：“宝炬春焰，歌声夜落”；“干城月朗，万家灯辉”；“天降美景，人闹良宵”。最下层中间是珠球灯和莲花灯。

珠灯的六个挑角是六盏花篮灯，并悬挂着六条用珠穿成的大对联。对联四周嵌着梅花等表示吉祥的图案。中间的对联是：“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取自明代诗人唐伯虎写元宵之夜的诗句。其他二联分别为：“窗上梅花瘦影横，归来紫鸿余三如”，“千乘宝本珠箔卷，万条银烛碧纱笼”。字体遒劲有力，穿制清晰精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珠灯每层的周围还有 6 盏灯，其中第一层有两盏多角灯，灯上分别用彩珠穿成“龙飞凤舞”和“莺啼燕语”。这 18 盏灯的周围又都有网篮、飘带、珠球等装饰物形成的环灯。

现存的这盏珠灯，是清康熙年间当地玄坛庙重建时留下来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逢元宵来临，该庙就把此灯搭配、装饰，以供群众欣赏。

首饰龙灯

温州乐清县，盛行着一种叫“首饰

龙”的专供观赏的龙灯。灯长 13 米、宽 12 米、高 3 米左右，前有龙头，后有龙尾，中间是五到七层的龙身，每层贴着五颜六色的细纹刻纸；当龙腹内灯点亮时，灯光映得四周刻纸奇彩纷呈，耀眼夺目。整只龙灯饰有 70 多个制作精巧的亭台楼阁，各个亭台楼阁中又配饰着近 300 个精彩的绸绢人，组成 80 多出戏目，内容大都取材于《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此外，龙灯还装有木制齿轮传动装置，通过一个摇手，由一人操作，可牵引全部绸绢人，各自表演不同的动作，妙趣横生，逗人喜爱。

每年元宵佳节，这种首饰龙便和其他龙灯一起出来活动。一只首饰龙要在节前雇艺人花两个月时间才能制作成功；其经费是由一个村或数村群众自愿筹集；活动时间一般从夏历正月初十开始，至十六为止，共七昼夜。人们扛着首饰龙，到各村各家巡游，并敲着大锣大鼓，演唱着吉祥颂词。到第七夜，各村的首饰龙照例集中在附近庙宇，先在一起演唱玩耍，然后让广大群众评议各自的艺术品味工艺水准，特别是对灯尾部的一张细纹刻纸花——“龙尾花”，进行仔细的比较和严格的审评。谁的评上第一，谁就被称为“龙船哥”，这是很大的荣誉。

首饰龙的习俗，源于明代戚继光平定倭寇时，乐清县的人民为了庆贺胜利，就制作了这种龙船灯。初时的灯形体较小，制作工艺也较为简单，人称“平龙”，只由一个人举着游行，后经历代艺人继承、改革、充实，才发展成为别具一格的乐清首饰龙。明姜淮《歧海琐谈》已有记载。到清光绪年间，在瑞安也有此灯。据《杜隐园日记》中记载：（光绪十四年正月廿七日）元宵梅岗灯会，“最后一灯，约二丈高，纵横十尺，其中扮演杂剧、鱼龙等，尤足眩人目。”又（同年二月廿二日）温州市三港庙迎灯，更有用纸造成龙舟一支，数十人抬抬游街市，其中亭台人物宛转如

生。”今天每逢元宵，乐清永嘉等地乡村，首饰龙到处巡游；有些老人，对龙灯燃香礼拜，祈求保佑；并且在第七夜，一定要把灯烧掉，说是“送龙上天”，俗称“收殇”。

木质龙灯

木质龙灯，又叫灯板龙、档龙。在乐清县柳市镇的吕岳村至今还保存着一条光绪年间制作的灯板笼。这条木龙是乐清已故著名木雕艺人叶卓如为首创作的。龙身共十八节，每节之间用一条板连接起来，名叫“灯板”。龙头、龙尾全部用樟木之类的优质木料精心雕刻而成，并且在头、尾和每节上都刻有楼台、亭阁和许多小型圆雕的戏曲人物，如《牛郎织女》、《白蛇传》、《西游记》以及鱼翁、牧童等等，刻工精巧，并且描金上色，全部为彩木雕。

老艺人说，灯板龙上的这些彩木雕，就是现在驰名全球的黄杨木雕的雏型。这种龙灯的身子必须选用上等的樟木、泥木等较坚硬的木头制作。档板上的人物圆木雕，有的选用樟木或龙眼木雕刻，有的则选用黄杨木雕。因为黄杨木色彩庄重，木质光洁，所刻的人物亦显得更加风采逼人。开始，这些圆木雕大都是小佛像，以后有些艺人不断改进技术，致力于塑造人物，创造了表现生活的各种群像，如“牧童骑牛”、“捉迷藏”、“济公”、“弥勒佛”以及各种戏曲人物，灯板龙上的人物彩像亦随之更加丰富多彩了。现在每逢元宵节，灯板龙都要出动到各村巡游表演，并在每节灯板上都装上灯笼。入夜之后，将灯点燃，远远望去，就象一条矫健的火龙在村落中飞翔。龙身虽然沉重，但在 20 多个壮汉举舞下，也能蟠屈起伏，平地回旋，别有一番情趣。

（责任编辑：仲文）

「国宝」和它的保护者

● 李青松



秦岭。冬长。

雪，主宰了一切。

山道上，一辆架子车艰难地行进。由于是上坡，拉车人弓着腰，牙关紧咬，大汗淋漓。笨重的大头鞋啃住积雪的路面，结实而有力。

后边的推车人似乎更用力。厚厚的镜片里是一双美丽的女性的眼睛。她叫吕植，中国第一位专门研究大熊猫的博士生。前边的拉车人便是她的导师，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文石。

此刻，他们正在转移监测大熊猫的营地，从柏杨坪到桑树坪。山道两旁是起伏的群山和汹涌的森林。

偶尔，几只锦鸡和毛冠鹿穿过山道，钻进远处的树丛。

翻过一座山梁，潘文石和吕植停下来，以动物学家特有的细心辨认雪地上的踪迹，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那是一只大熊猫刚刚走过的脚印。在冬季，大熊猫可不像黑熊那样躺在树洞里酣睡，它们喜欢四处走走，或许在积雪下能找到鲜嫩的笋芽和其它食物。

1980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与中国联合研究野生大熊猫，潘文石作为中方专家与另外3名学者一起开赴

西南林区。从此，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大熊猫的研究工作。

在秦岭野外大熊猫研究过程中，潘文石和他的同事们获得了两个重要发现。一个是他们发现秦岭南坡的一些山谷在百余年前一度繁荣，人烟散布，大熊猫退向高山。后来，人们纷纷离去，这里又成为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场所。于是他提出，如果在这些地区科学地控制生态平衡，可以争取大熊猫和人类在共同的环境中一起生存下去。第二个重要发现是，1985年3月26日，他和吕植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一只棕白毛色相间的大熊猫，并且成功地把它从患病状态中解救出来。这一重大发现，为现代大熊猫种群可能存在二态性提供了依据。

他们收起笔记本，继续赶路。足迹和架子车的辙印沿着崎岖的积雪覆盖的山道顽强地延伸……

1980年12月22日。雪，纷纷扬扬。

潘文石正在追踪一只大熊猫，照相机挎在胸前，他随时准备拍下动物世界里那些意外的瞬间。

不过，这时的潘文石有些沮丧，因为半天的追踪几乎又成徒劳。

雪停了。累、饿、困合伙向他袭来。他的抗拒是有限的，他将羽绒服的拉锁拉严，摇落草丛上的雪，然后躺在松软的茅草上睡去。

他疲惫极了。

“咔！”一声脆响，他被惊醒了。雪将一棵松树的枝压断了。那断枝落在离他约5米远的地方，溅起的雪块，弹片一样四面八方乱撞。好险。

这时，前边的竹林里哗哗啦啦响个不停，声音向他走来。“熊猫！”他心里一喜。

熊猫走出竹林，完全暴露在他的视野之内。他瞪大眼睛，呆住了。原来，那东西不是熊猫，而是金钱豹。

豹子继续向前，距潘文石6米左右的地方，停下，嘴龇动着，只要一扑，中国就会失去一位大熊猫专家。

潘文石没有动，豹子没有动。眼睛盯着眼睛。

双方僵持约十几秒钟，豹子转身走了。

潘文石长长喘了口气。

有人说，潘文石的命硬，连豹子对

他都奈何不得。潘文石则轻轻一笑：“我是属于大自然的。”

秦岭的3月，干冷干冷。

无线电信号微弱极了，一定是对面的大山阻隔了信号。潘文石背着仪器爬上这座海拔3200米的大山。山顶的风刀子似的，直往身上割。他用军用雨衣搭了一个窝棚就开始工作，直到东方微明。

他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走，穿大头鞋的脚抬起来是那么吃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

“啪！”潘文石被竹根绊了一跤，站立未稳跌下悬崖。他只觉得自己连同世界都在向下垂，一准要死了。刹那间，他的手本能地抓住了崖壁上一株斜生的杜鹃树。树没能救他，断了。

潘文石跌落下来。当他就要与地面撞击的一瞬间，怀里的杜鹃树却将他弹到一边，反弹力改变了方向。

潘文石没有死，但血糊糊的，无论如何谁都不会把他与教授联系起来。

当然，潘文石的传奇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听说潘文石和吕植从秦岭回到北京作短暂的休整，我立即赶往北京大学。在守门人的指点下，我叩开了潘文石教授办公室的门。

我隐隐感到室内有股霉味。潘文石见状解释说：“这里原是清理工存放墩布和扫帚的仓库，被我改造成了办公室。”

只见室内堆满了器材和资料，潘文石的办公桌就立在一个角落里，在这里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和论文。

这间办公室虽然不怎么讲究，却挺实用，至少安静，少有干扰。

“潘老师，您为什么选择秦岭南坡作为野外研究大熊猫的基地？”

“秦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大自然的造化使得这里成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给我们研究野生大熊猫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潘文石从抽屉里取出一卷地图，摊开，指给我，“秦岭的北缘是太白山巨大高耸的山体，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北方南侵的寒流，因而，南坡的气候适宜，林木繁盛，并生活着包括大熊猫在内的许多珍稀动物。”

“秦岭地区现有多少只大熊猫？”

“220——240只左右。这个数字是以实地统计和数学模型估算出来的密度为基础而求出的。”

“人类进步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与自然对抗的过程。而您提出一种观点，如果人类的开发活动控制在一定极限之内，人类与野生动物可以共存共荣。怎样理解呢？”

“嗯——，问题比较大。不过，我可以试着回答。”他说，“人类最初向森林的推进活动，并不是以开发森林资源为目的，那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仅能解决其生存危机，于是盲目地烧毁森林，开垦耕地，捕猎野生动物。森林的消退，一方面使人类获得了更多的耕地和居住地，另一方面使大量的野生动物失去了生存之地而遭灭顶之灾。

“然而，秦岭南坡的一些地区，人类的开发活动目前尚限制在一定的山地高度之下，随着山地的升高，人类活动渐减，这给生活在这里的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留下了一席之地，社会区域与森林区域的相互渗透，出现了人类——森林——野生动物共存的局面。”

在秦岭，地处大熊猫分布区腹地的长青林业局，在开采森林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了对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采取择伐的形式，保留幼树和母树，伐后的森林仍保持一定的郁闭度，并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生产活动结束后，工人全部撤出作业区，山林重归寂静，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又出没其中。

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野生动物完全由大自然安排也是不可能的。

迄今，地球上已很难找到人类没有介入过的地方。

潘文石说：“森林的开发过程就是人类与野生动物争夺栖息地的过程。但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并不完全是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存共荣的交叉地带。”

“您的研究要达到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想通过对大熊猫的野外研究，专门为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共存共荣勾画一个蓝图。现在，我还不敢说完全画好，但至少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

从潘文石的办公室出来，我径直朝 25 号楼走去，找吕植。

346 室蔚蓝色的门敞开着。吕植的世界是用大熊猫构筑的，床头、墙壁和书架上到处都是大熊猫的照片和画稿。

这位现年 25 岁的博士生是在书堆中长大的。还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就读各种各样的书，识的字有限就猜着读。她最喜欢读的是那些探险的书，《格兰特号船长的儿女》、《萨尼克夫发现地》、《一个生物学家的环球旅行》等，几乎快被她读烂了。

她老爱幻想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爱动物，小猫小狗之类都是她的好朋友。于是她就报考了北京大学生物系，她如愿以偿了。

1985 年 3 月 8 日，对于吕植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和另外两名同学跟随潘文石老师一起来到秦岭。这一天，她在野外亲眼看到了大熊猫。

那天，爬山爬得很累，吕植便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只听潘文石轻轻说了声：“熊猫。”

“在哪儿？”吕植兴奋地问。

“在那株树后。”潘文石用手指着远处一株松树。吕植定睛一看：“啊！熊猫！”

吕植偷儿似的慢慢向熊猫接近，刚走几步，一块石头后面突然又出现另一只大熊猫，离得是那么近。

吕植瞪大眼睛，什么都忘了。

写吕植不能不写“洋河”。“洋河”的故事为我的采访增添了许多轻松有趣的内容。还是让吕植讲吧——

“洋河”是一只熊猫的名字。1989 年 2 月 10 日，我们捕到“洋河”后，戴上颈圈就把它放掉了每天用无线电定位，注意它的活动。后来，我们发现“洋河”病了，就立即送到山下的营地治疗。给它吃了两片“肠虫清”，打出 400 多条蛔虫。喂它好吃的，馒头、蜂王浆、维生素 E 什么的，这家伙吃得挺来劲。几天就恢复了健康。

一天傍晚，民工们正在看录像，只觉得后边的一位呼吸很粗，仔细一看是“洋河”，民工们没有理它。一个小孩给了它一点吃的东西，它很高兴，便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拨弄放相机，做怪状，搅得好不热闹。

几个小伙子大声喝着把它赶走了。

民工们看完录像，就回房间休息了，门关得结实。第二天早晨一看，所有的门上都有它抓的爪子印。约 6 时左右，有人来敲门，说“洋河”在民工的厨房里坐着呢！我赶紧跑去看，一麻袋面被它弄到地上，它满脸是面粉，花椒、大料、葱花及各种佐料弄了一爪子。看人来了，它还得意地舔着自己的爪子。大家敲盘，用竹竿拍它的屁股，它很懒，一点都不动。民工着急，要做饭，上山干活。没有办法，我就给“洋河”打了一针麻醉剂，“洋河”醉了过去，我们就用架子车把它推到很远很远的竹林里，放掉了。

讲到这里，吕植递给我一本相册，翻到其中的一页：“瞧，这就是‘洋河’。”

果然，“洋河”的样子既幽默，又滑稽。

1990 年春，在廖家沟吕植用无线电给大熊猫定位时，遇到长青林局的森调队正在那里搞采伐设计。吕植明白，为了保证用材林更好地生长，营林时是要将一些杂灌木和竹子清除掉的。吕植请森调队长打开地图，一看营林范围正是大熊猫经常活动的地方。那里是联系 8 个大熊猫栖息地的通道。

吕植请求说：“能不能保留这块地方？”

“这是局里的决定。”森调队长也很为难。工人已经上山，用不了两日，那些竹子就会被清除掉。事不迟疑，吕植当即给长青林局局长高郑生写了一封“鸡毛信”，力陈保留这块地方的意义。托人十万火急送到局里。

“鸡毛信”改变了局里的决定。得到消息后，吕植高兴得半天合不拢嘴。从山上下来，吕植特意去局里致谢。

高郑生局长乐呵呵地说：“大熊猫的竹子，我们当然不敢砍啦。不然，小吕植哭着鼻子告到中央，我们吃罪不起哩！”

吕植只是笑。

野外考察大熊猫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每天凌晨出发，晚上很晚才回来。从山上下到公路已是漆黑一片，用潘文石的话说：“看见石头都像野兽”。挨饿是常有的事，“都饿成习惯了。”

最难熬的是每个月连续 5 昼夜的

监听。人手少的时候，有时一个人要坚持监听两三天。坐在接收机旁一天到晚不能睡觉，听不到信号就得爬到高山顶上去听。夜晚野兽出没无常，随时有可能遇到猛兽。

我问吕植：“你害怕吗？”

“怎么不害怕。不过，我相信一切对我都是友好的。”吕植正了正眼镜。

告辞的时候，我发现吕植床头的一个纸袋里插着几枚野鸟的羽毛。一定是大自然馈赠。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即便博士也不例外。

1988 年 7 月，潘文石和吕植及他们的合作者发表了专著《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对秦岭大熊猫的取食习性，移动规律以及大熊猫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新的适应性作了详尽的论述。论著出版后，立即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著名鸟类学家郑光美撰文说：“潘文石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所里，使我们能在更高、更广的视野上了解秦岭大熊猫的栖息地的全貌，它的过去、现在以及发展前途。他们注意从社会学角度，现实地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大熊猫保护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些生态学方面的解决途径。”

郑光美写道：“我于 1960 年曾在秦岭考察，并首次报道了秦岭有大熊猫分布，深知该地野外工作的艰巨性，时隔 20 余年，得见这一系统全面的论著，欣喜万分。”

1990 年 7 月 6 日，来华讲学的美国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京伦饭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潘文石先生和他的学生吕植在秦岭的野外大熊猫研究工作，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中最灿烂的一页。近几年来，在中国潘一直是高举保护大熊猫火炬的人。”

潘文石和吕植的研究工作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国务委员宋健在读过一篇有关他们的报道后致信林业部：

大熊猫不仅是国宝，也是人类一项宝贵的生物资源。如果它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下灭绝，那将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将在科学上负有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我觉得，应该决心更大些，不惜搬迁人群，移护种群。当然，最

大陆记游诗抄

张渊量

文化交流

(记西湖诗人大会)

年年午节忆菖蒲，文化交流道倡儒；
景翠苏堤人荟萃，一舟韻彻满西湖。

参加安阳周易讨论会

文化根深在易经，安阳发迹道流形；
精湛博大通今古，浊世愚蒙着唤醒。

黄昏过两室山

大室端庄少室贤，夕阳无限映霞天；
千秋大业禹王绩，佳话频传两座妍。

嵩山

巍巍耸汉矗华嵩，磐石磷磷壮碧空；
峰连七二乾坤老，屹立天心万古中。

安阳殷商文化节志庆

辉煌盛会在安阳，四海嘉宾汇帝乡；
甲骨阐扬光易学，殷商文化永流芳。

游开封

开封游胜地，寻菊学渊明；
三径篱迎笑，九秋蕊正荣。
古都文物盛，落叶冷风清；
两岸茱萸共，天涯载酒行。

登楼

大梁游罢上髻楼，人事全非画阁秋；
帝伯欢教千客醉，娥眉笑尽几多愁。
七朝烂史歌扬绝，一望神州怨已休；
自古风流今洗净，开来气象待从头。

包拯庙

爱民护国包青天，公正廉明第一先；
铁面无私尊法治，功垂竹帛万年传。

大河村遗址

先民文化五千秋，道远根长岁月流；
古塚房基留印证，归藏考易好探求。

根本的是教育现存地区的人民，永世与大熊猫为亲邻，爱护、保护这可爱的动物。

既然全世界人民都关注大熊猫的命运，我建议林业部每年发布关于大熊猫保护的公报，如实公布现状，不要怕“泄密”，更重要的是保护物种。

目前，林业部正在抓紧各方面的工作，一项宏伟的《大熊猫保护抢救工程》即将实施。

潘文石和吕植的研究价值不仅仅在于出版了多少本书，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向决策者提供了人与野生动物怎样共存共荣的科学思路。

前不久，潘文石和吕植共同起草

了一份《拯救秦岭大熊猫及其他自然遗产》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建议把地处秦岭大熊猫分布的高密度中心区域的长青林业局改建为国家公园。利用长青局现有的一些设施和条件，把这个国家公园办成一个企事业相结合的实体，并逐步实现对外开放，既经营适当的林业生产和开办旅游业，又是一个进行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动物保护的基地。

他们提出，建立一个企事业结合的国家公园的优点在于，不仅保证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而且解决了长青局一部分人的生计。企业经济效益将使动物保护和科学研究事业得到活

力，并促进其发展。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可望带动山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报告是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的。

这，也许就是潘文石和吕植为秦岭未来勾画的蓝图。

我国现有野外大熊猫 1000 余只，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人类和大熊猫能共存共荣吗？

全世界正向秦岭投来关注的目光……

(责任编辑:晓渡)



陆卓鼐卡的农会委员在阿古登巴房前

舅”。在江孜地区，他又叫江拉姆开。在日喀则地区有人又叫他江拉，其意义也还是“聪明的导师”、“聪明人”。而在后藏农村，人们则亲切地把阿古登巴简称为阿登，并说，阿登的家乡就在拉孜县城与日喀则市区之间的陆卓鼐卡。（“鼐卡”为庄园之意），他的主人就是庄园主陆卓代瓦。（“代瓦”，藏语“领主”之意）

我们到西藏采风，一到拉萨、日喀则就听到不少阿古登巴和陆卓领主的笑话。到后藏粮仓拉孜县采风时，听到的这类阿登笑话更多，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传奇人物。在西藏，奴主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农奴没有任何人权，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棍击甚至处死，或被剥皮，或被奔马拖死，或割去舌头、挖去双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阿古登巴却可以凭自己的智慧愚弄领主，把那些威严的老爷们整治得狼狽不堪，一败涂地。这简直不可思议！正是怀着对这位滑稽叔叔的崇敬之情，我们去他的家乡采风、朝拜。这是1960年5月27日的事，已30年有余了，可是那热烈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们到了陆卓鼐卡，吃了晚饭就请女农会主任召集了一个故事晚会，想尽快听听阿古登巴故乡的阿登故事。

不一会儿，劳动了一天的翻身农奴们陆续来到我们的住处。男女老少都有，把我们围在中间，寒暄两句，就迫不及待地讲起阿登的故事来。

人们说，我们下榻的这座高大的房子就是陆卓代瓦的住宅，石砌的三层建筑：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供神像和住活佛。我们被安排住在三层。阿登的屋子在旁边，是用石块搭起的。他后来到外地流浪去了，这屋子没人住，倒塌了。有人说阿登死了，就用这些石块在路中间砌了一座石塔。这佛塔很灵，人们绕着它走一个来回就等于转了一遭经，能消灾避祸，得到幸福。贵族、坏人碰了它就会心痛。有人说阿登没死，他走遍广大藏区就会回来，所以把他平常用的东西都保存在陆卓代瓦楼下的小屋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农会委员们一起来到放置阿登用物的小屋门前。小龛很矮，没有窗户，外边用泥砖堵得很严实。人们把泥砖搬开，打开了门。

在阿古登巴的故乡 听阿古登巴的故事

段宝林

藏族有个阿古登巴，是个家喻户晓的神奇人物，简直可以同格萨尔大王齐名。

有人却把他说成是宣传佛法的智者的化身，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智慧之神、欢乐之神。

阿古，是藏语“叔叔”之意，是对长辈的尊称。登巴，有“滑稽”的意思。按藏文原意，阿古登巴就是“滑稽的叔叔！”

也有人认为，是“顿巴”不是“登巴”，“顿巴”是“导师”、“聪明人”。

其实，这两种含义并不矛盾，都符合阿古登巴的性格特点。阿古登巴实际上是一个既滑稽幽默又聪明智慧的人物，是人们尊敬的导师。

在广大的藏区，人们多叫他阿古登巴。而在四川康巴地区，有些地方却叫他“登巴俄勇”，意思是，“滑稽的舅



阿古登巴的遗物

屋里很暗，农会委员们取出尘封已久的木碗、盛青棵酒的酒坛、破铜锅、破铜壶、破斧和破锹以及破旧的蓑蓑衣服等等阿登用过的东西，我们当即拍了照。然后人们又怀着十分恭敬的心情把这些神物按原样放进屋去，把木门关上上了锁，再用泥砖封了门。

阿登还会回来吗？也许在别处安家落户了。其实，或许他只是一个人现实幻想的艺术创造，不过，他的故事却在流传着，下面是我们听到的三个故事：

让领主学狗叫

阿古登巴是陆卓代瓦的堆穷（农奴的一种，是家奴），对领主的脾气很了解，常常捉弄他。农奴们对阿古登巴说：“你的本领很大，可以让老爷吃屎、挨揍，你能让他学狗叫吗？”

阿古登巴想了一下，说：“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听着吧！”

于是，他跑到领主家去，大家也跟着去看热闹。陆卓领主对阿古登巴说：“你急急忙忙来干什么，还跟来这么多人。”

“老爷，您是喜欢狗的，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卖狗的，牵着一大条大黄狗，毛色光亮，叫声也很好听，所以就急忙回来向老爷报告，请您快去看看吧。”

“你说他叫声好听，它是怎样叫的？”

“这大黄狗的叫声是很特别的，我一听就知道是好狗，你听，它是‘喔喔喔’的叫。”

领主对狗是很有研究的，他忙说：“‘喔喔喔’叫不是好狗，好狗是‘汪汪汪’地叫呀！”

阿古登巴说：“好狗怎么叫？”

“汪汪汪地叫呀！你看见的不是好狗，汪汪汪叫的狗才是好狗。……”

领主又叫了两次，大家满意地大笑而去。

阿古登巴吃鸡蛋

阿古登巴养了两只好鸡。领主陆卓代瓦却派他交四个鸡蛋的差。

只有两个蛋，怎么办呢？阿登有办法，他连这两个蛋也没交给领主。

他拿起两个鸡蛋去见陆卓代瓦，说：

“给老爷交差来了。这是两个鸡

蛋！”

“混蛋！我要你交四个鸡蛋，你怎么只交两个？”

“还有一个给我吃了。”

领主听了火冒三丈，说：

“你怎么吃了？”

阿登不慌不忙地又吃了一个鸡蛋，说：

“回老爷的话，我就是这么吃的。”

领主干着急，只好自认倒霉，自己是这么问的嘛。不过还应该有一个呀，问道：

“还有一个呢？”

“我老婆吃了。”

领主更生气了，气势汹汹地责问道：

“她怎么把鸡蛋吃了？”

阿登仰起头来，用牙咬破蛋壳，使劲一吸，一个鸡蛋又下了肚，说：

“老爷您看，她就是这么吃的，就是这么吃的呀！”

裁头发

一天早晨，登巴叔叔发现糌粑袋子瘪得像老太婆的脸一样，用手伸进去一摸，什么也没有了。

登巴叔叔拿了一块牦牛毛织的粗

布片子，一个锥子，到一家财主的门口大声叫喊道：“谁裁头发？谁裁头发？”这家主人是个连半根毛也没有的秃子，常为自己的秃头发愁。听到喊声，立即把登巴叔叔请进家去，问裁头发要多少钱。登巴说：一大袋糌粑就行。财主听了很高兴，马上打发人把一袋糌粑送到登巴叔叔家里。

于是，登巴叔叔开始动手为财主裁起头发来，先用又粗又硬的牦牛毛布在光头上用力而飞快地擦了一遍，又把锥子对准财主的头作出要扎的样子。财主刚才痛得已经快忍受不住了，看到这般情景，心里更加害怕，就问：“你给多少人裁过头发？”

登巴叔叔说：“给五个人裁过。”

财主又问：“有没有死人？”

登巴叔叔答：“三个死啦！”

财主又问：“其余两个呢？”

登巴叔叔说：“每人给我五克酥油告饶了。”

财主赶紧请求：“那么，我也送你五克酥油吧！”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民俗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张蕾）



阿古登巴的经塔

俯仰从容的留侯张良

● 徐庆全

汉业存亡俯仰中，
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议韩彭地，
复道方图雍齿封。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留侯”，是指张良。张良的一生，不但富于传奇色彩，而且他在军事、政治以及处世为人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研究借鉴之处。

一

张良，字子房，出身于韩国贵族，先辈历任韩国宰相。公元前230年，秦始皇灭韩之时，虽然张良并未在朝为官，亡国之恨亦刻骨铭心。张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杀掉秦始皇。为此，他倾家资，在东夷君长沧海君那里募到两名刺客，备好两个铁椎，准备在秦始皇巡游时下手。他和两名刺客化装成逃难百姓，暗中查访秦始皇巡游的路线。公元前218年，终于探听到秦始皇巡游的确切路线。张良经过细致考察，将行刺地点定在人烟稀少的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他和两名刺客提前埋伏在博浪沙官道旁的沙丘后面。两天以后，秦始皇的辇车在一队卫兵的簇拥下，由东南方缓缓前来。张良命令两名刺客将120斤重的铁椎顺山坡推向辇车。可是，铁椎只击中了副车。张良和两名刺客在卫兵的追杀声中逃之夭夭。秦始皇非常恼火，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刺客。张良只得隐姓埋名，逃到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南），在下邳一住就是十年。

下邳城北，有一条清澈的沂水河，河上有一座石拱桥，桥周围草木苍翠，风景宜人。张良时常到这里来读书散步。有一天，一位身着粗布衣衫的老者蹒跚地来到桥上，见到张良，故意将一只鞋子扔到桥下，毫不客气地说：“年轻人，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感到十分诧异，但想到对方是位老人，便忍气走到桥下，把鞋捡来交给老人。老人把脚一伸，又让张良给他穿上，张良于是跪在地上给老人穿上鞋子。老人大

笑几声，转身走了。张良怔怔地望着老人的背影。老人走出不远，又折回来对他说：“你还是可以教诲的孩子，5天以后天亮时，你到这里来等我。”5天以后，天还没亮时，张良就来到了桥头，可是，老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老人很生气，指责他不该迟到。张良只好在5天以后，再提前来这里等候老人。谁知老人又先到了。张良又挨了一顿批评。又过了5天，张良唯恐再晚了，在半夜就来到了桥头。不一会儿，老人也慢慢走来，从怀里掏出一部书给张良，并说：“你认真地读完这本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10年以后，你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13年以后，你到济北的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色石头，那就是我。”说完，老人飘然而去。历史上称这位老人为黄石公。

天亮以后，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这部书是久不传世的《太公兵法》。他十分高兴，每天阅读，爱不释手，细细记诵书中的作战兵法，从中领略了作战的文韬武略，日后成为刘邦夺取天下的得力谋臣。张良得黄石公赠书的传说，或许是史家们为他抹上的一笔传奇色彩，恐怕不大可信。倒是张良椎秦博浪沙的壮举，引起了后人的扼腕浩叹。一千多年以后，唐朝大诗人李白漫步沂水桥上时，曾怅然吟哦道：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两千多年后的1914年，天津南开中学一位名叫周恩来的中学生，读到这段历史时，也为张良的壮举所震动，奋笔题诗曰：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蹙相踪。

二

公元前202年5月，已经当上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刘邦总结了诸将在征战中的功劳，称张良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



张良像

千里之外”的将军。可是，七年前，张良与刘邦初次相遇时，刘邦却没什么看重这个纤弱的书生。

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六国旧贵族也乘机反秦，纷纷割据称王。张良在下邳集合起一百多人的队伍，投奔到拥有几千兵马的刘邦麾下，成了刘邦手下掌管军马的小官。他第一次展露军事谋略才华，是在公元前 207 年的宛城之战。这年 6 月，刘邦率军来到了宛城城下。宛城是通往关中的第一道关卡，有秦朝重兵把守，刘邦的军队久攻不下。刘邦非常急躁，便想放弃宛城，绕道向关中进军。而张良却认为，如果放弃宛城，前往关中，就会陷入腹背受敌、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兵家用兵大忌。他向刘邦提出了进攻宛城的用兵计划：让军队撤离宛城，给秦兵造成一种假象，然后连夜调遣军队包围宛城，乘敌无备时发起攻击。刘邦依计而行。7 月，宛城秦兵不战而降。

刘邦乘胜而进，8 月，部队来到了武关（今陕西省商县东）。武关以西的*关，是河南南阳通往关中的孔道，也是拱卫秦朝都城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刘邦计划用兵二万，攻打峽关。张良在对守关的秦兵数目掌握以后，认为以二万兵力不足对付强大的秦军，与其强攻，不如智取。他建议刘邦一方面派出一部分部队先行，让士兵在附近的各个山头张挂旗帜，虚张声势，作疑兵之计；另一方面派人持财宝收买那些多是屠户出身的贪图钱财的秦将，以瓦解秦军。刘邦依计而行，果然，秦将纷纷背叛秦朝，要求与刘邦讲和。刘邦十分高兴，准备派将领前去谈判。这时，张良又提出：“即使秦将反叛，士兵中也有不服从命令而进行抵抗的，形势对我方仍然不利。我们不如乘秦军懈怠时出兵奇袭，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就会万无一失。”于是，刘邦亲自带兵攻占了峽关。公元前 206 年 10 月，刘邦率军攻入咸阳，刚刚做了 40 天皇帝的秦王子婴手捧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至此，历时 15 年的秦朝统治彻底崩溃。

秦朝灭亡后，当时起义军的两大主力是项羽和刘邦。项羽拥有兵力 40 万人，号称百万，刘邦只有 10 万兵力，号称 20 万。项羽得知刘邦已率军进入关中后，便率领大军连夜赶到涵谷关，

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念及张良于他曾有救命之恩。为了报答张良，他连夜驰马来到刘邦军驻地，找到张良，并告知项羽的灭刘计划，并奉劝他赶快逃命。张良听了项伯的话后，面不改色地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刘邦在沛县起义，故有此称）入关，现在沛公大难临头，我偷生怕死，未免不够义气，还是应当把这一情况向他汇报。”项伯无奈，只好答应。刘邦听后大吃一惊，一时竟束手无策。张良认为，现在项羽兵力强大，而我方兵力弱小，一旦交战，我方将不堪一击。现在只有实行缓兵之计，让项伯转告项羽，我方并无背叛之意。然后，在明天亲自到项羽军中谢罪。

第二天清晨，刘邦便带张良、樊哙及百余骑来到鸿门，亲自向项羽谢罪。项羽见刘邦态度诚恳，加之夜间又听了项伯的劝说，便打消了兴师问罪的念头，请刘邦一行赴宴。宴席间，虽然觥筹交错，却时时隐藏着杀机。项羽的谋士范增频频向项羽示意，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可是，项羽毫无反应，依旧饮酒。这一切，张良看在眼里，暗思脱险之计。而范增却命大将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欲乘机杀掉刘邦。项伯看穿了项庄的意图，也拔剑起舞，并用身体时时掩护刘邦，使项庄无法得手。张良见形势危急，忙立即找到勇士樊哙，命他怒闯酒席，斥责项羽。刘邦这才得以离开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估计刘邦已回到军中，张良便从容不迫地回到宴席上，对项羽说：“沛公不胜酒力，已回军中。并奉他的命令，献给将军一双白璧，献给亚父（范增）一双玉斗，代为辞行。”范增见自己的计谋失败，把玉斗扔在地上，用宝剑击得粉碎，仰天长叹：“竖子（指项羽）不足与谋，将来和你争夺天下的必定是刘邦。我们就等着做他的俘虏吧！”

以后的局势确实让范增不幸而言中。由于张良的计谋，使刘邦赢得了时间以重整军队。不久，双方即进行了长达 4 年的楚汉战争。

三

前引王安石褒扬张良的诗中，王安石特地点出了张良的两项功勋：即在固陵战役中对韩信、彭越的分封；在汉朝建立后对雍齿的封赏。如果说固

陵对韩、彭的分封，扭转了楚、汉相争中汉军的劣势的话，那么，对雍齿的分封则避免了汉朝开国后的一次变乱。

“鸿门宴”结束后，项羽带兵攻入咸阳。他自恃兵力强大，成功最大，便以诸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发号施令，分割天下。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同时还分封灭秦有功的各军将领、六国的后裔和投降的秦将等共十八人为王。项羽满以为经他这样安排，十八个王就会俯首帖耳地各就封国，他本人也可衣锦荣归了。谁知事与愿违。项羽的分封恢复了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违背了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同时他专凭自己的喜恶行事，分封也很不公平。刘邦首先进入关中，理应封为“关中王”，但是，项羽却把他改封为汉王，封地在僻远的巴、蜀、汉中（今四川北部及陕西南部），这一举动，激怒了刘邦。

刘邦因势力与项羽相差悬殊，只能暂时容忍，等待时机。为了打败项羽，刘邦非常注意招揽人才。在萧何的推荐下，他拜韩信为大将，并接受韩信的建 议，出兵袭击了被项羽封在关中的三个亡秦降将，夺取了物产丰富、地势险要的关中，以此作东进的根据地。与此同时，没有得的分封的齐将田荣，也起兵反对项羽，杀掉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自立为齐王。项羽得知后，率大军北征田荣。这就给刘邦乘虚东进提供了机会。同时，原来与田荣联合，反对项羽的彭越，也率领 3 万人归属刘邦，刘邦封他为魏相国，转战梁地，自己亲率大军直取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项羽得知彭城失守，立刻率领 3 万精兵从齐地赶回，出其不意地猛攻汉军。刘邦仓促应战，汉军大败，他只带领数十名骑兵，突出重围，狼狽逃命。这时已经被刘邦任命为成信侯的张良，建议刘邦移军荥阳。荥阳北据黄河，西通关中，它的东南是开阔的平原，境内的敖山上，有秦朝留下的粮仓。张良让刘邦下令在荥阳和敖仓之间修筑通道，以便充分占有敖仓的军粮。张良还建议刘邦招募勇将。他指出：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彭越在梁地势力强大，必须对这两人加以笼络，以加强对项羽右翼和左翼的压力。同时，应当委韩信以重任，以期他能领兵独当一面，应当把关东之地分封给

这三个人，这样形势才能转危为安。

刘邦虽然重视张良的建议，却没有认真实行。当项羽大军四面围住荥阳时，却采纳了酈食其分封六国后代的错误主张。张良得知此事后，力劝刘邦改变这一主张。他分析道：与其把天下分封给六国后代，不如分封给随你征战南北的将士。这样可以笼络军心。而且，现在势力强大的是楚国，即使分封六国后代，由于他们势单力孤，也只能归顺项羽，而不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刘邦听了张良的分析后，恍然大悟，急忙命令销毁实行分封的印信。

张良的这番话，确实表现了一个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陈胜起兵反秦时，利用六国贵族的反秦行动，分封其后代，顺应了他们诛秦而自立的愿望，起到了联络力量，孤立秦朝的作用。但是，就刘邦眼下所面临的局面而言，楚、汉争霸，汉处于劣势，六国诸侯依附楚者多，如果刘邦把占领的土地分封给六国后代，无疑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帮助了敌人。况且，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诸侯，结果兵戈迭起，已是前车之鉴。张良虽然反对刘邦列地分封六国之后，却依然坚持将领地分封给手下的大将，以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应有的成效。

公元前203年11月，韩信率军平定了齐国后，自恃功高，派人送信给刘邦讨封。信中表示：希望能被封为代理齐王；否则，权位太轻，不足以慑齐国。刘邦读信后，气得破口大骂：“我在这被围困，指望他来解围，他倒要自立为王。”在场的张良深知，如果韩信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很可能为项羽所利用。于是，他赶忙用脚尖踢刘邦，示意他不要当着使者的面再骂下去，并附在刘邦耳边说：“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你不可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就势做个人情，封他为齐王，使他安心驻守齐国。否则，恐生变乱。”刘邦幡然醒悟，立刻冷静下来。但是刚才骂出的话又不能改口，于是顺着刚才的语气骂骂咧咧道：“大丈夫能平定诸侯，就可以封为王，何必要暂时代理呢？”于是，命令张良携带印信到韩信军中，封韩信为齐王，并抽调他的兵马对付楚军。

事实证明，张良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随着局势的发展，项羽为了孤立

刘邦，两次派人挑拨韩信和刘邦的关系，劝韩信三分天下，独霸一方，都遭到韩信拒绝。这表明，张良确有高瞻远瞩的才智。此后，楚、汉两军又相持9个月，由于稳住了韩信，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刘邦。项羽出于无奈，只好与刘邦议和，双方约定以鸿沟（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9月，项羽将捕获的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放回，拔营东归。

刘邦自起兵以来，鞍马劳顿数年，对取得中分天下的结局颇沾沾自喜，也打算撤兵西移。这时，具有远见卓识的张良却又提出了对局势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刘邦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江山，各路诸侯也都慕名而归，这正是消灭楚军的绝好机会。如果听任项羽撤兵东归，就会养虎貽患。因此，力主刘邦乘胜追击，夺取天下。刘邦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西撤的主张，继续向东进攻。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命韩信、彭越率军在固陵（今河南泰康县南）会师，共同围攻项羽。但是，韩信、彭越却没有率兵前来。项羽乘刘邦孤军深入，把汉军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得坚壁自守。他向张良征求良策。张良认为，现在楚兵将破，韩信、彭越却没有划定封地，当然不会前来助战。前次韩信虽然被封为齐王，但并非您的本意，所以他至今将信将疑，彭越本来有平定梁地的功劳，应该受封，您却只封他为相国。如果现在把陈（今河南淮阳）以东直至东海封给韩信；把淮阳（今河南商丘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南）封给彭越，他们必定会来助战。刘邦赶忙派遣使者，封韩信、彭越为王。果然，他们俩立刻率兵前来会师。刘邦几路大军将项羽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项羽兵败突围，退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镇），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刘邦登上了汉代开国皇帝的宝座。

公元前201年，天下已定，刘邦分封二十余名将士为功臣，没有得到分封的将士却日夜争功，这使刘邦左右为难。张良也时刻关注着这件事情。一天，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宫内相坐闲谈，从走廊上看见将领们在宫外席地而坐，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便问张良诸将在议论什么。张良危言耸听地说：“他们有可能正在策划谋反。”刘邦大

惊失色，问道：“现在天下初定，他们为什么又要反叛呢？”张良答道：“陛下是普通百姓出身，诸将之所以追随您夺取天下，目的是为了封官晋爵。现在，获得封赏的人都是您的老部下，被问罪的人又都是您的仇人。即使拿出整个天下也不可能每个将领分得一份。这样，他们既担心得不到封赏，又更害怕因为有过失而被您问罪，所以聚集在一起预谋反叛。”刘邦十分担心地问：“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呢？”张良问：“您平生最忌恨而大家又都知道的人是谁？”刘邦答道：“是曾经背叛过我的雍齿，我念他有功，所以没有杀他。”张良胸有成竹地替刘邦出谋划策：“您赶快下令封赏雍齿。诸将见与您有仇的雍齿都被封赏，他们也就可以安心了。”于是，刘邦立刻设宴招待群臣，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宴毕，诸将议论道：“与陛下有怨的雍齿都被分封，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由于张良的计谋，使诸将相安无事，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宫廷内乱。

北宋史家司马光追述这段历史时，评论道：“张良的这一计谋，使刘邦避免了恩怨失国的危险，也使群臣们消除了因互相猜忌而谋叛的可能性。”进而由衷地赞叹道：“像张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进谏的谋士啊！”

四

在诸将为争功而日夜吵闹不休的时候，被刘邦列为开国头号功臣的张良，却默默无闻，采取了功成身退的做法。当刘邦要把齐国三万户作为封邑，分封给他时，他却辞谢说：“当初我在下邳举义时，与陛下在留城相遇，这是天意让我成为陛下的军中卒。以后蒙您信任，我的计谋还很管用。您给我三万户封邑，我是受之有愧的。只求陛下将留城一地分封给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刘邦无奈，只好封他为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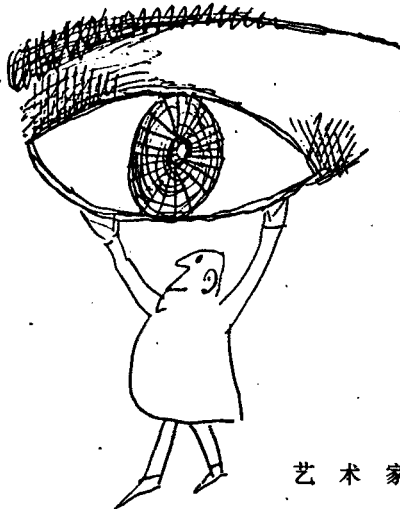
此后，张良“等功名于物外，量荣利于不顾”。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他经常对人说：“我家世代相韩，韩国被灭后，我倾家资财，为韩王报仇。现在在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辅佐皇帝，又得万户侯之封爵，已经是很满足。我情愿游离于人间纷乱之外，跟随仙人赤松子去游历天下。”张良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展现了一个封建时代政治家少有



功力

外国幽默漫画精粹

芳菲 选辑



艺术家

的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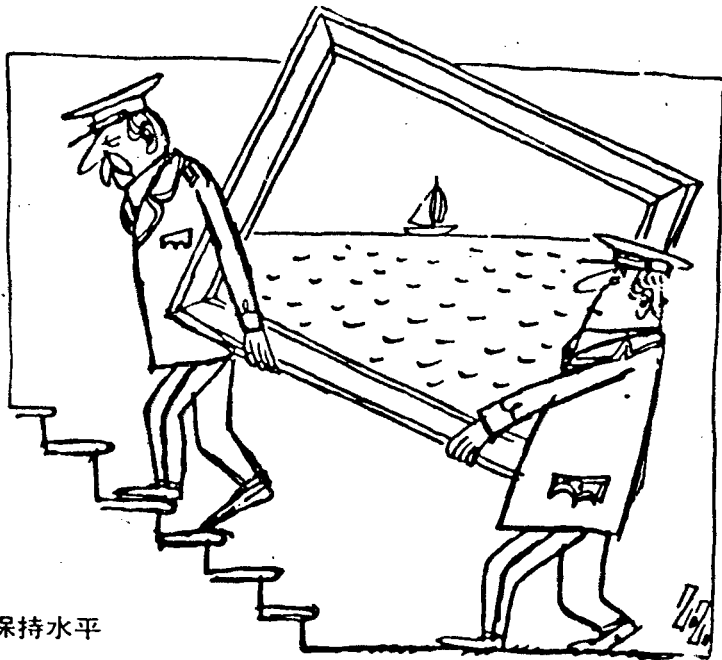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同是开国功臣的韩信,有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的指挥才能,但因唯功利是图,最终落得个“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被斩于长乐钟室。萧何的结局要比韩信要好一些,但在刘邦的猜忌目光下,落得个惶惶不可终日的结局。而不居功自傲的张良,却在纷乱的事外,安享晚年,最后寿终正寝。可惜,张良这种“等功名于物外,置荣利于不顾”的政治家风范,并没有引起后世为官人的沉思。因此,官场倾轧、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的史实,充斥在史书的卷帙之中。正因为如此,张良在后世史家笔下的形象,就愈显得高大。

公元前 189 年,张良飘然仙逝后,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他与黄石公的巧遇,将他安葬在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岗。又由于他曾熟读太公兵法,所以又将他与太公联系在一起。唐开元年间,设置太公尚父庙,以他为配祭;唐肃宗时,又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并选历代良将十人,称为“十哲”,张良也是其中之一。一直到今天,每当人们用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成语时,依然会想起这位胸有雄兵百万,而俯仰从容的留侯。

(责任编辑:尚弓)



旅行写生



保持水平

石达开

出走

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石达开年纪最轻,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太平军从广西向金陵进军,途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石达开均为开路先锋,攻城夺镇,所向无敌,号称“石敢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石达开和杨秀清、韦昌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后来又在西征战场上,大败湘军于湖口、九江等地,迫使曾国藩投水自杀(遇救)。在天京事变中,他兴师靖难,支持洪秀全平定韦、秦、陈的叛乱,被朝野尊为义王,并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但就在这之后不久,担任如此重要显赫职位,集声望功劳卓著于一身的石达开,却径自率部 20 万出走天京,与洪秀全分袂,最后全军溃灭于大渡河,石达开自己也惨遭清军凌迟而死,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败亡,添上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说是历史上遗留的又一大憾事,令人深思。

石达开为什么非离京不可

1857 年 6 月 2 日,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城南的雨花台,由苏、皖交界的铜井镇渡江向安庆进军,正式脱离天京。至于这次出走的原因,石达开在他沿途遍贴的布告中表达他对太平天国“矢志贞志”,“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出走的原因,是“圣君”(指洪秀全)不明,责怪洪秀全用频繁的谕旨,来掣肘他的行动,并对他“重重生疑忌”,这才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天京,脱离洪秀全的控制。

洪秀全为什么会石达开生“疑忌”呢?从历史上看,在诸王的关系中,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一直很好。1853 年 9 月,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推行“按亩输钱米”的政策,得到杨秀清的赞许。石达开在安庆出布告时,明确提出“敬天识主,实认东王”,明确表达了对杨秀清十分敬重的意思。而石达开对杨秀清则是“深信不疑”,“尊若神

明”。杨秀清对石达开也非常信任,“屡委以军事重任”。在诸王中,石达开是唯一没有受到天父杖责的首义之王。受杖一事,连洪秀全都不能幸免,而石达开却可幸免。可见,杨、石关系不是一般。因此,石达开对洪秀全纵容韦昌辉杀害杨秀清是极为不满的,洪秀全对此也难免有畏惧之心,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韦昌辉曾经以洪秀全的名义悬赏捉拿石达开,对此,洪秀全也不免心有负疚。如今石达开大权在握,洪秀全心怕有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是采取宽容大度的胸怀,对石达开给予充分信任,而是重用洪仁发、洪仁达来掣肘石达开,从而加剧了矛盾。而朝中大臣对洪秀全重用洪氏兄弟也不以为然,而是倾顺于石达开。正如清将李续宾在《李忠武公遗书》中所记:“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并发展到有加害于石达开之意,这就使矛盾出现了白热化。

怎样才能解决洪、石之间的矛盾呢?对于石达开来说,无非采取:一是委屈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团结,或者像李秀成一样,对洪秀全犯颜直谏,借以“消释洪秀全的疑虑”。然而,石达开毕竟不是李秀成,李秀成当时羽毛未丰,洪秀全可以对他撤职复职任意剪裁。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之王,金田起义时和洪秀全一起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加上朝野上下人心归向,又拥有雄厚的实力,洪秀全对他表面上至少也要礼让三分,石达开如果采取犯颜直谏,会被看成对洪秀全的逼篡。二是主动解印弃官,以自己的坦诚和愚忠来消除洪秀全对他的疑惧。但这也

是行不通的,石达开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在险境之中,性命难保。解职之后,失去部将的卫护,处境将更加艰险。而且,解职之后洪氏兄弟也不会放过他。三是诛洪自代。石达开的谋士张遂谋曾经提出,要石达开吸取刘邦诛韩信的历史教训,说石达开“身负震主之威,体兼商人之德,而势在人臣之位”,则“虽欲效股肱之力,竭忠贞之节,其可得乎?”所以,张遂谋认为石达开可以“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列朝,然后请旨上帝……南面称制”,以取代天王。但石达开是讲仁义的人,他绝不会同意这样做,所以他坚定地回答:“予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在石达开看来,只有率部出走是最可取的方案。这样既可以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但石达开采取这种回避矛盾的办法实非上策,既大大削弱了天京政权的实力,又使自己脱离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心,步履艰辛,很难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来。

出走之后怎么办

石达开出走天京之后,率领 20 多万精兵驻扎在安庆。下一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天京政权却由于精锐部队被石达开带走,许多重要的军事据点处在清廷的兵锋之下。八、九月间,江苏句容被清军攻占,镇江重镇被清军包围。镇江是天京咽喉,对天京的安危至关重要。洪秀全为救镇江,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负气拒救镇江。洪秀全为了表示诚意,下令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位,并镌刻义王金牌,由朝中文武大臣签名,要求石达开回京佐政,石达开仍不加理睬。应该说,洪秀全的这些努力,不论是出于理智,还是迫于形势所然,都使洪秀全争取了群臣的向心力,而石达开却因过于固执和不顾大局,给天京军民带来了失望,断绝了合朝文武对他的同情和希望。

石达开出走

● 苏双碧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选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出来助国，使天京政权进入一段短暂的中兴时期，而石达开在驻扎安庆期间，军事上、政治上却没有任何进取。

本来，石达开出走之后，可以把安庆作为大本营，向周围扩充势力范围，在鄂、皖、赣打出一个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少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对石达开来说是可以做到的，又不失体面。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不顾大局，决心和洪秀全划分泾、渭，进入福建偏安的决策。石达开率部入闽两个月，士兵死散很多，一无所得，最后，在清军的包抄下只好匆匆离开福建。

石达开入闽决策的错误主要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分裂行为。石达开邀陈玉成、李秀成一起行动，被他们拒绝了；石达开亲自到彭泽召赖桂英，赖桂英也不从其计；湖口守将黄文金，九江守将林启容也都不从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军事上政治上都缺乏勇气。他想用不易帜来维系他对太平天国的忠心，但他没有想到出走本身就是最大的离心行为。对于石达开来说，独树一帜，不算为奸，不另立旗帜，也不算为忠。如果在组织上独树一帜，在行动上互相声援，彼此牵制清军，或许对太平天国共同的事业未尝不无好处。

石达开为了维护他“忠义”的形象，他不分帜、不降清、不倒戈，洪秀全也顺水推舟，把石达开出走说成是“远征”，天王诏旨总加“达胞”二字。甚至在石达开出走之后还对石达开追加封号，如加封“九门御林开朝公忠军师殿左翼王”、“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忠公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这样，表明洪秀全仍然是天国的中心，是旗帜。当石达开行动顺利的

时候，这种对洪秀全的向心力，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当石达开军事形势不利时，部将便可以此为借口，反旗回归洪秀全麾下。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石达开出走后的“地位与行动，既非叛逆，又非忠顺，不君不臣，不分不合，亦可谓奇极怪极。”这种不伦不类的处境，决定了石达开分裂后不可能有广阔的前程。

革命本色和仁义之师

石达开远征达6年之久，历经12个省，震撼半个南中国。但从总体上看，一支拥有20万精兵的部队，又有“谋略甚深”的统帅石达开率领，但远征军几乎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构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根据地“以为粮台”，常年流动作战，“自疲于山谷之间”。在军事上处处遭到挫折。但是，即使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的爱民思想和推翻清王朝的目标并没有变。一直到大渡河败亡前，他都是打着反清的旗号，把清封建王朝当作革命的对象。

石达开自广西兴师以来，部队纪律严明，号称仁义之师。他在经略江西时，清人邹树荣在《葛青草诗》中说，石达开的部队“仁慈义勇”，“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石达开攻进吉安重镇时，不杀一名无辜，不拿百姓一草一木，于是颂声大起，称石达开部是“仁义”之师，“慈爱”之勇。在远征途中，石达开保持了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作风，尽管部队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但所到之处仍然受到百姓的欢迎和支持。在他的文告中一再重申要“约束士兵，秋毫无犯。”在涪州的诰谕中恳切地说：“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远征以来，前途虽经曲折坎坷，但宽厚仁义之心尚存。至今在广西还流传着许多歌颂石达开的民谣。如“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翼王来坐镇，天下享太平。”“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心欢畅”，等等。正是由于石

达开爱民爱部众，当他远征处在最艰苦的时刻，虽然部将纷纷离散，却没有发生过一件加害于翼王的事，这和历代农民战争领袖在衰亡时相互残杀的情况迥然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和石达开为人、治军的仁义慈和所致。

悲壮的结局

石达开入桂两年，军事上没有进展，而且惨遭失败，几乎破灭。此时，留在石达开身边的部队和将领已不多，为了生存，石达开在广西进行了许多努力，他和部将赖裕新、张遂谋等进攻南宁，没有成功，又转战在家乡贵县、桂平一带，收编了一些小股农民武装，使他能够勉强立足。但是，由于清军的进逼，远征军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心摆脱困境，于1861年10月率部自广西进入湖南。部队离开广西这个死胡同之后，形势便为之一变，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是一种振作。从湖南到湖北，许多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在湖北来凤县境内，遇贵州农民起义军首领李洪

率部来归附。李洪所部有一定的战斗力，刚在来凤大破清军，斩清总兵惠春，这样一支部队，诚心诚意加入石达开部，使石达开部得到充实。同时，由于李洪熟悉四川地形，愿为石达开军当先锋，使石达开部迅速由川东进入四川涪州境内，随后在綦江、叙永一带转战，兵力所及到贵州、云南等地。但始终没有能够找到立足之地。而且清廷迅速从陕西、湖南、湖北调兵入川，石达开防守都很困难。

1862年冬，石达开在滇北转战，派中旗赖裕新率兵沿川、康边界北走，想策应石达开部再次入川，但这支部队在1863年3月兵到中州坝县一带，已被清同知周歧源、参将杨应刚以及土司岭承恩等联合堵击，赖裕新阵亡，所部全军覆灭。由于山河阻隔，石达开不知道赖裕新牺牲，他按原计划取道川、康边界，想强渡大渡河后挥师东向，进入成都平原。1863年2月，石达开自滇北昭通府境内，经米粮坝渡过金沙江。4月中到达宁远府（今西昌县）的白果湾。5月初由冕宁、越西抄小路直趋大渡河畔的紫打地。由于赖裕新先遣部队也在这一带被击败，清军早有防备。大渡河自安庆县到万工汛，长达200里，只有13个渡口，此时大多已有清军驻守。

紫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松林地王千户辖下的7场48堡，尽是西番族。石达开事先没有做好争取王千户和48堡的工作，就只想到这里地势险要，清军防守薄弱，可以抢渡大渡河，直入川中。没有想到，5月14日到达紫打地后，即陷入包围圈中。薛福成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中说，石达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鸦漩河。”江北有清军拦截，西有土司王应元拦阻，东有土司岭承恩拦堵，南有游击王松林的兵勇据守，形势对石达开部极为不利。

5月21日，石达开正面抢渡大渡河，由于武器不如清军，加上水流很急，船筏多被冲毁和击中，抢渡没有成功。随后于6月3日和6月9日，先后组织两次抢渡松林河都没有成功。石达开处境十分困难，军中宰马为食，尤不能供将士一饱，覆军险境举目可见，石达开已经作好了困死溯江的思想准备，他在绝望之余写下了“大军乏食气谁余，纵死溯江定不降”

的诗句。在绝境中，石达开作了许多努力，他两次致书土司王应元要求让路或罢战通商，都被王应元拒绝。此时，清军谢国太及土司王应元两军已越过松林河。土司岭承恩占领马鞍山，居高临下，监视石达开军的行动。南面王松林部也在逐步北移。石达开军的地盘越来越小，粮食来路几乎断绝。

在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谋士曹卧虎献策，由石达开亲率部队东行，到海棠大道突围南行。在当时处境下，这个计策恐怕是唯一可行之路，但石达开犹豫不决，到第3天，即6月11日中午，石达开才率余部东走，取道岩扁。王应元一面派兵尾随追击，一面亲自率兵在山上用乱石、树干袭击石达开军。隔河北岸的清军周歧源部用长枪射击。石军走了20多里，到达小河村庄时，部队已损失十之五六，前后左右均无退路，士兵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至此，石达开部抢渡不成，突围无望，陷入了无法坚持的最后阶段。

石达开部被困在利济堡时，谋士曹卧虎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即到洗马姑清营诈降，等到部队过河之后再劫粮反戈，突出敌围。在当时形势下，诈降和真降是没有界限的，因而曹卧虎大不以为然。但石达开却接受了曾仕和的诈降计，并令曹卧虎书写降表。曹卧虎写完降表就投水自杀了。

石达开率军诈降后，清军在洗马姑石达开军营附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动摇石部军心。同时，又派清将杨应刚、王松林到石军营，要石达开作出进一步的投降表示。石达开“不得已”，才“释兵表降”。但又让“妻妾五人携其二子沉于河”。

石达开接受诈降一策，还有个思想，是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部众的安全。但石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将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战士分开。这一举动，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阴自悔恨。其实，这正是石达开的弱点。他一贯讲仁慈、信义，自他用兵以来，从没有屠

杀过受降的敌众。他以为以信义待敌，敌人也能以信义待他和部众。但他却全然不知，清廷为了消灭石达开及其所部，不择手段，费尽心机，更何况，石达开受降后，已经失去任何价值。此时天京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李鸿章及外国侵略军，已足以制洪秀全于死地，自不必再借石达开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了。一般农民起义将领，在发展阶段，敌方总是多方分化，重用降将；而到了衰败时期，敌方对降将总是杀戮不留，以免后患。李鸿章杀苏州8个叛将，曾国藩杀李秀成，都是例证，因此，骆秉章也必然是要杀石达开的。

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破灭。此后，他言辞谈吐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的迹象。在被押解到成都途中，清将刘蓉、黄彭年曾经提讯过石达开，在场的黄彭年在记述此事时说：石达开在谈及他南北征战时，“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石达开是6月25日被押解到成都的，骆秉章曾会同成都将军对石达开进行会审，开初骆秉章对石达开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随后被骆秉章杀于成都，时年仅33岁。其部众两千余人，也尽被杀戮于大渡河畔。

石达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慷慨陈词，英勇不屈。骆秉章对石达开施以凌迟，其状十分残酷，时人周洵著文对此作了惊心动魄的描述：“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刺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刺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指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剑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终刑，气早绝矣。”周洵盛赞石达开，说他“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周洵所得材料来自参与处死石达开的人提供，是可信的。石达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绝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所能有的。但石达开的分裂和战略上的错误，这段太平天国历史却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责任编辑：仲文）

李立三轶事

王榕

建国初期，李立三同志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陈云同志兼任主席）兼全总工资部部长，同时任劳动部部长兼工资司司长。那时，他精力充沛，重视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在组建工会和恢复生产以及建立新中国工资制度方面，他是重大贡献的。但是，在1951年12月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扣上“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两顶大帽子，会后调离了全总。立三同志负责主持全总和劳动部工作期间，我曾在他直接领导下，任全总工资部和劳动部工资司的副职，同他接触较多，深感这位革命长者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很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他离开全总以后，同他交往少了，但有两件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初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后，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各级干部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译者是谁？书上没有署名，读者无从得知。我告诉大家，这本书最初译者就是李立三同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立三同志的电话，他问我眼下工作忙不忙，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有件事情想请我帮帮忙。我当时满口答应下来。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去到立三同志家，他和他的夫人李莎热情接待了我。立三同志说：“今年2月至5月，斯大林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几篇重要论文和

书信，已刊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想看看这些文章，要我尽快地翻译出来。可是，我一个人翻译进度太慢，所以想请你来帮下忙。

我当即回答说，我不懂俄文，怎么能帮上这个忙？立三同志说：不要紧，只要你帮我作记录就行。说着就领我到了他的书房，让我坐到他的办公桌旁。桌子上已经摆好一摞稿纸。

立三同志拿着一本俄文杂志对我说：斯大林文章的题目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已译完了第一节，现在就从第二节开始。说着，他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口授译文。我与立三同志工作相处两年，对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很熟悉的，几乎一字不漏的记录了下来。

就这样，一个上午就译完了该书第二、三、四、五节。立三同志看了看记录稿，连声说：“很好，很好。”

中午，李莎邀请我和她全家人共进午餐。饭后，立三同志陪我在庭院散步。他饶有兴趣地指点着他喜爱的花草，谈笑风生，毫无倦意。记得陈云同志曾把立三同志比作“坦克车”，他的确是个不知疲倦的人。言谈中，他对半年前在全总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却一字不提，使我油然而增加了对他的敬佩之情。

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继续工作。立三同志不停地口授译文，我不停地记录。他眼睛看着俄文杂志上的原文，口中流畅地读出文词严密的中文，犹如同步翻译。足见他中、俄文功底之厚，更可感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之深。

到了下午4点多钟，已经译到第十节，这样，全书的主体部分已经译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我到立三同志家。他一见面就高兴地鼓励我说：昨晚我看了你的记录稿，除了改动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外，基本未动，完全合格。又说，王榕同志，如果有你帮助记录，我几天内就可以翻译出一部书。这一天上午，仍然采取头一天的工作方式，开始翻译斯大林《答A. N. 诺特京同志》和《关于N. N. 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两篇文章。午饭后继续工作了两个多小时，译稿便全部出来了。

这本书于1952年11月由北京人

建国初期，李立三（右一）和工会、工商界同志在一起



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最后一部分即斯大林于1952年9月《答A. B. 萨宁娜和B. r. 温什尔同志》一文，是立三同志后来自己动笔译出的。这本书第一版发行了30万册，当时还是竖排本。

这本书出版以后，党中央极为重视，曾通知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论点，诸如：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它，而只能利用和限制其发生破坏作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斯大林在这里承认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要认识并及时地克服这种矛盾，等等。这些论点，对于我国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来说，从这本书里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教育。李立三同志受命及时译出了这本书，这是他对党的一个默默的贡献。

在苏联的遭遇

1959年8、9月间，我和立三同志在一次闲谈中，他讲述了由苏联回国前的遭遇和回国后的心情，也是令人难忘的。

那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全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座谈会期间。李立三同志当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总理请他主持并指定刘子久、宋平、庄启东、许明和我参加，把会议讨论结果起草一个报告。这就是后来周总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立三同志对总理交给的任务非常认真负责，在他家里连续五天主持讨论修改报告稿。有一天下午，宋平同志和我按时到立三同志家，其他同志有的未到，我们就和立三同志随便交谈起来。我们谈到了他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很好，我们都受到教育。宋平同志还说：立三同志的发言也受到国外兄弟党的好评，有的在他们的党报上全文刊载，有的还发表了评论，认为这个发言反映出立三同志胸怀坦荡，

严于自我解剖，表现了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优良品德。

这些话引起了立三同志的回忆。他向我们讲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他在苏联的一段遭遇。他说，三十年代苏联进行“肃反”时，他正在共产国际工作。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苏联同志甚至外国党的同志，都人人自危，早上上班，晚上不知能否回家，几乎每天都要抓去几个。他自己也作了准备，早晨上班时，皮包里装着毛巾、牙刷和衬衣，告诉家人，晚上几点钟不回来，就是回不来了。果不出所料，有一天他也被捕了。

立三同志说，当时苏共对中国党有怀疑，审问他时，要他交代广州起义中有哪些国民党特务和美国特务参加，要他按这个调子写材料。他拒绝了，并据实加以驳斥。苏联内务部还写好了“供词”，软硬兼施，要立三同志照稿抄写，也被严词拒绝。每天都要他写交代。为了应付他们，他把中国党的历史从建党开始，不厌其详地写了又写。他说，他当时只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无论如何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胡说八道。因此，备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过了近两年的铁窗生活。他的夫人李莎找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也找不到他的下落。半年后，才得知李明（立三同志在苏联的化名）关在郊区一个监狱里，但不准探监。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立三同志才被释放出来。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立三同志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置他于死地。幸亏周恩来同志正巧在苏联，为立三同志说了话，才留在莫斯科。这时他没有职务，靠写文章、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封锁中国抗战和中共活动的消息。我们党的“七大”已经开过半年多了，立三同志还不知道。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夜饭，一直吃到天亮。当晚9点多钟，突然来了一部小汽车到立三同志家，不作说明就把他拉走了。家里人异常惊慌，以为他又被捕了。立三同志说，他也作了第二次被捕甚至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汽车把立三同志拉到苏共中央联

络部，一位部长过来接见他。这位部长开门见山地向立三同志说：接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回国？立三同志对我们说，当时事出意外，我以为我听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我惊呆了，一时万感交集。我象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象断线的珍珠一样，怎样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当时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到现在也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在这位部长一再催问下，我只连声地说：“我要回国！”这位部长又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在苏联还是保密的，他能送给我看，这是表示信任。我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汽车送我回到家，家人都喜出望外。这一夜，我顾不得吃年夜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了。书中的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吸引着我，引起我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和崇敬的感情。

立三同志讲述这段经历时，眼里不时闪着泪光。宋平同志和我都深受感动，我是一直流着泪听下去的。

立三同志还谈到他回国后的心情。他在国外16年，是“半个外国人”，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决心在毛主席、少奇同志领导下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中央要他实际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怕再犯错误，处处谨慎小心，但还是犯了错误，一个革命者的自我改造真不容易呵！

听了立三同志的这次谈话，更使我深深感到，立三同志确是一位对党赤胆忠心，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对毛主席非常崇敬的真诚无私的共产党人。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竟被指控为“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等人遭到残酷批斗，以致被迫害致死，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1980年，党中央为李立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放着他的骨灰盒，里面却只装着他生前戴过的一副老花眼镜，原来他的骨灰早已被造反派们扔掉了！然而，他的革命风范却是永存的，人们对他的景仰和怀念是抹不掉的。

《炎黄春秋》创刊一周年

(1—5期要目)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少帅美国行
百颗脏官头 一桩奇贪案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共和国定都北京初记
京城大厦的白领小姐

延安谜案：王实味平反
首次披露：汪东兴日记
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我所知道的康生
还是冯玉祥将军的性格
从京沪密谋到川南起义

《炎黄春秋》
杂志
欢迎订阅

《炎黄春秋》双月刊，逢单月11日出版，每册订价：2.8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本刊邮发代号：36-138。邮购另收邮费0.28元。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邮局汇款地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师院附中院内)《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电话：8414411-2903。邮编：100037。联系人：邱毓舫。无论银行或邮局汇款，都请函告您的详细通信地址、单位、姓名、邮编。





炎

黃

春

秋

邓小平与

和平解放西藏

李立三轶事

毛泽东结交绿林

流浪画家姚迪雄

郭凤莲和她的先辈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阿古登巴的故事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定价: 2.80 元